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扩展版
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

ISSN 1001-5973

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7

6

人文社会科学版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期刊影响力指数列高校文科学报第74名



编号: CST-JIFR 2017 SDSS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版)

期刊名称: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主办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学科类目: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

CN/ISSN: CN 37-1066/C ISSN 1001-5973

计量指标统计表

一、影响力指数(CI)									
他引TC			他引JIF			CI值	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序		
本刊数值	学科最大值	学科最小值	本刊数值	学科最大值	学科最小值				
475	10664	18	0.282	5.236	0.006	67.651	127/617		
二、载文量、可被引文献量(篇)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101	86	0.85	95	84	0.88	90	79	0.88	
三、被引频次(本刊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2016年度的被引频次)									
本刊发表文献 被各种来源文献引用频次		2016年发表文献		2015年发表文献		2014年发表文献		历年发表文献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	
复合引用		3	3	40	38	42	42	1810	
1、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引用		3	3	35	33	27	27	491	
2、博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1	1	2	2	147	
3、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4	4	11	11	1141	
4、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2	2	31	
人文社会科学统计源期刊引用		3	3	33	31	26	26	462	
四、影响因子(JIF)									
影响因子种类	当年指标	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子	5年影响因子	他引5年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复合JIF	0.035	0.503	0.491	0.569	0.566	167/617			
期刊综合JIF	0.035	0.380	0.368	0.250	0.246	115/617			
人文社科JIF	0.035	0.362	0.350	0.230	0.226	111/617			
五、其他参考指标									
基金论文比	平均引文数	引用半衰期	引用期刊数	被引半衰期	被引期刊数	他引总引比	互引指数	WEB即年下载率	WEB下载量/万次
0.50	29	>20	240	10.1	633	1.00	41/42	37	13.36
								3.086	

注: 1、各项指标定义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指标体系。

2、中国知网“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可核查各项统计数据。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7年9月28日

通讯地址: 清华大学84-48信箱评价中心 邮编: 100084 E-mail: aspt@cnki.net 电话: 010-82719660 联系人: 任海英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 (双月刊)

2017年第6期 (总第275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安作璋 朱德发

主任: 商志晓

副主任: 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 (常务)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宏 王玮 王卓

王志民 毛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唐汉卫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建

主编: 李宗刚

副主编: 时晓红

□ 本刊特稿:党的十九大精神阐释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几点体会	马永庆(1)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诂问历史:《死水微澜》为什么会被漠视?	宋剑华(9)
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董 燕 郑家建(21)

□ 文艺学研究	
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李衍柱(31)

□ 历史学研究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季桂起(49)
汉代列侯爵溯源考	秦铁柱(57)

□ 经济学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日本的应对	中村宗悦著 李光贞译(68)
基于《时事新报》初期社论看福泽谕吉的中国贸易观	
..... 堀 和孝著 孙守峰译	(79)

□ 心理学研究

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关系: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 张 莉 赵景欣 张文新(87)

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姜言霞 卢 巍 毕华林 卢姗姗(94)

□ 美学研究

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 兰希秀(105)

□ 传播学研究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山东疫苗案”为例 张 贝(114)

□ 语言学研究

“一言不合就 XY”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孟祥英(121)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孙书平(131)

2017 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总目录 (151)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Vol.62 No.6 (Serial No.275)

MAIN CONTENTS

Logic Approach to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ome thought after studying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Ma Yongqing(1)
Heckling the history: Why has the novel <i>Stagnant Water in Ripple</i> been ignored?	Song Jianhua(9)
Concept evolution and stylistic innovation:the value and limitation of avant-garde novels	Dong Yan,Zheng Jiajian(21)
Wang Yangming: the Pioneer of Chinese Renaissance	Li Yanzhu(31)
Why Sima Qian sidestepped Dong Zhongshu's <i>Proposals</i> <i>by the Able and Virtuous</i> recorded in history	Ji Guiqi(49)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Marquis of Han Dynasty	Qin Tiezhu(57)
Response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to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akamura Muneyoshi,Translator: Li Guangzhen(68)
How Fukuzawa Yukichi argued about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Jijishinpou</i>	Hori, Kazutaka,Translator: Sun Shoufeng(79)
Positive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 of Juvenile Offenders: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Zhang Li,Zhao Jingxin,Zhang Wenxin(87)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re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iang Yanxia,Lu Wei,Bi Hualin,Lu Shanshan(94)
Poems Are the Expression of Life: a Study on the Poetic Thoughts of Fang Dongmei	Lan Xixiu(105)
Synergy Mechanism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Major Contingencies ——Based on the Shandong Vaccine Case	Zhang Bei(114)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 XY”: from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Rhetoric Structure	Meng Xiangying(121)
On the Chronicle of Yan Guangmin's Life and the Creative Years of His Poems and Articles	Sun Shuping(131)

英文校译:李玉麟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几点体会^{*①}

马永庆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道德建设以新的历史使命。道德建设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思想基础和道义支撑。新时期道德建设需要建构与新时代现实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集体主义教育。在实践的层面上,要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发挥不同道德主体的作用,在道德建设的真抓实干上下功夫。

关键词: 新时代;道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01-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从伦理视角解读新的历史方位的伟大使命,关注道德在其中的地位、价值、承担的责任和未来展望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求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探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

一、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地位和价值

新的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在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道德建设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道德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素之一。全面小康具体需要包括哪些内容,道德能否小康,或道德在全面小康社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对此,十九大报告中已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②可以说,全面小康包括着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增强等道德要素。

小康,在社会的层面上既可以指社会的一种态势,或达到的一种水平,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一种景象。如《诗经》的《大雅·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句子。《礼记》中说:“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③这种小康在社会治理、道德层面的寓意更多一些,某种意义上为我们了解全面小康中的道

* 收稿日期:2017-11-10

作者简介:马永庆(1957—),男,山东胶州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13BKS011)、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SDYY13008)、山东省高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高师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的整合与创新建设研究”(2012394)的阶段性成果。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③陈成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院,2004年,第154页。

德要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全面小康已经被提到战略的高度。社会层面上的小康有一个总体的衡量标准,这里既有着道德的评价也有着社会实际运转的要求。小康寓意的多样性,给人们认识小康中的道德要素提供了一定的发挥和想象空间。但是,由于道德的性质以及小康的特定要求,人们对道德要素的把握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从道德思维的视角进行把握。这主要在于道德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在中国的古籍中,德就是得道,德化。道德就是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人伦之理,把握做人的基本标准,使外在的道德要求成为居于心中的道德法则,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是通过舆论、习俗及个人信念对特定社会关系,更确切一点说,是对一定伦理关系的反映。相较于其他意识形态,道德在反映的性质、力度及范围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其深藏于人们的德性之中,体现于人们的言行,实际上最终落脚于人们的内在良心。道德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导向标。道德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其作用在于扬善抑恶,为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和行为的方向。道德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显示了人们在利益关系处理方面达到的水平,以及社会风尚的好坏。道德代表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规范或实践精神,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境界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道德的性质、作用充分彰显了其社会价值,它是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力量。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包含道德建设。

从全面小康的视角看,道德要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由道德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或在“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中的作用所决定的。道德是小康社会实现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保证并规定着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习近平在近期讲话中也多次强调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有力道德支撑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需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从思想道德抓起”^①。如果说没有道德建设,全面小康就只是一种可见的外在的小康,而缺乏一种内在的或是软实力的小康,那么小康的维持就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也会后劲乏力,没有可持续性,自然,有缺失的小康社会就会失去发展活力。由此可见,小康社会中的道德建设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和建设的问题。

道德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特殊的作用。《管子》曾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②。道德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规范要求,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道德与其他规范制度相互作用,保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道德作为规范具有柔性的特点,其产生是非制度性的,只是依靠一定的舆论、宣传教育和信念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完成使命。道德的特点决定了在当下治国理政中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辅助的力量。尤其是当前面临着“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③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情况下,更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的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这并不是否定道德的作用。实际上,其他管理形式作用的发挥,社会规范的实现还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得以最终完成。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社会共同意识向个体内在信念的转化。无论是法律、政治规范,还是道德规范的实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②管子撰,梁运华校点:《管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现,对其认知和把握,总会有一个由个别人或少数人了解到多数人明白、再由多数人的共同意识到个体人的意识,直至形成社会统一的价值理念的过程。代表社会共同意志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不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了解人们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基础形成的。但是要真正落实到位,还要经过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认识到认同的发展阶段。只有人们自觉把自己作为规范主体时,把守法、遵德当成自己的责任,或者是当成一种自我需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其二,从法律政治规范到道德要求的转化。法律政治规范具有强制性,也是一种刚性要求,对于社会成员具有较强的威慑力,有着必须之意。但要完全发挥这种刚性要求的作用,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则需要使刚性规范逐步转化为柔性要求,潜移默化,浸润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中。“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①当然,这里不是要道德取代法律政治力量,失去法律应有的规范力度,而应使法律政治规范在达到刚性约制的同时,转化为一种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且能够成为其个人行为惯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良好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的,这种生活交往不是作为规定的教导手段,而是作为社会需要进行的”。^②

其三,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即由外在要求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对个体来讲,道德首先是处于他律阶段,它是作为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出现在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是一种外在的约制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还只是遵循对规范的服从,有时甚至是迫不得已、违背意愿对义务的履行。当然,“对权威表示尊敬和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正确的行为”^③。但是,道德规范还是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等方式缓慢地渗透,以引发个体的情感认同。人们发自内心地把道德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而自觉自愿地选择并加以认同、接受,纳入自己道德信念结构中,成为制控自己的内在道德力量。道德的真正实现在于完全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自律性就是任何人和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④

二、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是全方位的。面对新的历史使命,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道德建设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中担负起哪些职责?这是当下道德建设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道德文化体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万众一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⑥就此,需要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起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用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衡量人们行为的善恶价值,提升全社会的正能量,提高人民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努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

①班固:《汉书》,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478页。

②[美]杜威:《道德教育原理》,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③[美]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魏贤超、柯森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④[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40页。

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①当下,既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断地完善道德体系,形成新的规范要求,又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②每个社会成员应该懂得,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财富多少,要有一个做人的基本方向和道德尺度,明确我们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基本条件,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的道德要求,并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道德文化体系的重构需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相适应。“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④。新的历史方位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体系建构的出发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诸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人民整体主体的利益需求与个体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同利益主体间需求满足程度的关系等。这些利益关系的处理,既涉及到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及满足,更关系到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满足利益的实现问题。当前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尚未树立起一种道德精神,缺少做人的道德底线,对人际和谐的人伦之理搞不清楚。有些人甚至做出了有失国格、人格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社会生活中价值观混乱,道德失范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宁,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因而,按照现实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次,在全社会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2001年,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努力,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任务。公民道德建设不仅要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而且还要从公民总体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提升和创建。一是要培育公民意识。公民不只是一个人,公民是享有国家给予的权利和义务的人。作为公民个体是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公民也是共同体的一员”,“整个共同体的公民安全则是所有公民合力谋求的目标”^⑤。在这种意义上,公民不同于一般人,作为社会公民,要认识到自己的公民主体地位,自觉地把握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赋予人们以公民的头衔,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称谓,而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也是一种荣誉。公民,要符合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在其位要谋其政,积极履行公民的职责。公民要有担当意识,主动地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道德的视阈下,每一个公民需要从国家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出发、遵守社会公共生活准则、职业道德要求和家庭行为规范,进行个体道德修身,强化自身的公民素质和品格。以公民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审视自己的行为,厘清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使公民个体融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潮流中。

二是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①在社会生活中,公民承担着多方面的责任,既有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也有着对职业对社会中其他人的规定,更有着对家人对自己不可或缺的义务要求。作为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炎黄子孙,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注国家的发展,有义务为民族复兴做出努力,要倡导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奉献意识;作为社会人,公民需要参与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敬业乐业,关爱他人,团结友善,服务社会;作为家庭人,要尊老爱幼,忠诚婚姻,互爱互谅,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对自己,要保证身心健康,使自己的言行“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不致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和疏于其职守”^②。

三是培育规则意识。新的时代必然要有新要求。“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依据一定的条件,在某种法则支配下存在的。”^③在道德领域,实际上就是旗帜鲜明地宣告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要求人们应该确立正确的善恶观、是非观、荣辱观,在全社会弘扬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贬斥什么的问题上,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不能让非社会主义文化混淆我们的视线,更不能让腐朽没落文化占领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对个人来说,要始终把自己的言行规范在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内,不能主观随性,各行其是。对社会规则的不尊重和破坏,就是蔑视社会秩序,而且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因为所有道德纪律都是为个体制定的规则,个体必须循此而行,不得损害集体利益,只有这样,才不会破坏他本人也参与构成的社会。”^④

再次,弘扬主旋律,加强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始终。当前,集体主义教育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集体主义价值的科学认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最大化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不必在乎实施的手段;也有的观点提出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已经不需要了,由此产生了否定集体主义的虚无思想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需要不需要集体主义原则,这一点已无需确认。集体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道德建构同样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从历史使命、历史坐标、历史变革来看,新时代坚持集体主义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也就是集体主义所要维护的集体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在保障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各种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进而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在此意义上,集体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当然,集体主义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得以完善的。

二是正确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新时代,集体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当前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其中重要的方面是个人与国家、与民族荣辱与共的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民族的繁荣,不仅涉及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关乎着每一个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而,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新时代道德建构的重要任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一对矛盾体。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把二者相等同,甚至相互取代,也不能将其截然分开。集体和个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要看到集体和个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等性,更要分清二者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不是独自生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29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7页。

③[意]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页。

④[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行动的能力只能在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形式中得到实现”。^①在这方面,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甚至要做出自我牺牲。同时,我们也必须时刻把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放在心上,让每一个人的需求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三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认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本质区别。个人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范畴。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行为指南和归宿的一种伦理思潮。个人主义不能从和谐、友善的视角,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往往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个人主义的危害是极大的。新时代道德建设必须认识到个人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它或以维护个人权利为由,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力图使私利最大化,对自己有利的就做,无利或利小就不做,抱着贪欲获利的心态待人对事;他们或以满足美好生活需求为前提,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没有顾及到社会、他人需求的实现。甚至为了个人的点滴利益,患得患失,向党向人民索要回报;也有人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钱权交易,不惜以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代价。个人主义混淆了是非界限,国家利益、多数人的个人利益无法满足,仅仅是实现了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好生活并不属于个体,而是属于紧密依靠国家的人”。^②个人主义冲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割裂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

最后,新时代道德建设是全方位的,需要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融汇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推进到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其中,既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又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打造生态伦理体系,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道德保障。针对不同的道德主体,实施不同层面的道德要求,把道德的先进性与共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道德建设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道德泛化,一切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道德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不能要求道德建设把一切任务都担当起来。二是把道德边缘化,认为道德是“软”的东西,不能对社会产生有效的价值。道德不是刚性规范,但是道德可以通过自己的作用力,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三、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几点对策

新时代道德建设是多种社会因素的有机结合,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这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社会制度的维护、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与人们个体的相互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新时代道德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③,因而,要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中华文化绵延亘古五千年,给中华民族的发展留下了值得传承和弘扬的优秀道德思想。如仁爱贵和、自强不息、廉洁奉公、尊老敬贤、克己慎独、贵义尚志、谦敬礼让、笃实宽恕、持节知耻等道德品质,充满着中国力量,经过历史的荡涤至今仍然熠熠闪光,成为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道德智慧。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繁,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梳理道德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较好地使传统美德与

①[美]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②[法]迪蒙:《论个体主义》,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时代精神相结合。“当我们进行一切变革时,我们绝不全然守旧,也不全然图新——要有足够的旧东西以保存先人的原则和政策”,“不致传统的链条因之断裂”。^①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文化的支撑与润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

在新时代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认真地分析丰富的中华思想道德资源,对其历史影响作一定性和定量的甄别,以新时代的标准对传统道德文化加以衡量,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实现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把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加以改造并纳入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传统道德文化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生命延续和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目的,弘扬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道德中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便是一些在历史上有过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在现实中难免也会有些过时的东西。因而需要在改造的基础上提升传统道德文化的品质,使其有新的时代内涵,让具有永恒性质的道德文化得以流传、发扬。对待传统道德文化采取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其次,新时代道德建设中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需要兼行并进,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从主体的角度来说,道德分为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个人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是不同质的两个实体。作为不同层面的道德主体,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社会道德是在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当然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与个人的道德认识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从道德的实现来说,社会道德需要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外显于人们的道德行为。人只有把道德作为自己的内在需要,自觉地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当道德达到自律阶段时其作用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在此意义上来说,个体道德是对社会道德的内化。只有达到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双方的和谐才能使道德得以实现,而且双方的和谐需要他们的共同付出和维护。

就社会主体而言,社会或国家需要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道德的实现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中要增强社会对个人的道德影响力。这既是道德发展的要求,也是道德实现必不可少的途径和环节。道德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舆论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其他人文环境等。其中包括社会道德制度的完善程度,社会道德关系的和谐如何,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高度,道德典范的树立等;在具体的道德操作中,有社会道德运行机制的良好状况,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程度以及道德规范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等;还有社会舆论的导向等要素,道德建设需要舆论的宣传和引导,形成良好的道德培育环境,使人们接受到道德的正能量,并形成扬善抑恶的社会风尚。国家、社会也需要为个人履行道德责任铺路搭桥,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对个人主体而言,人们需要提高道德认知水平、道德判断能力、接受能力、驾驭能力和道德转化能力、发展能力,使道德实现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由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道德建设是每一个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组织或某些人的事情,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在道德建设的实践操作中需要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关心其道德需要,充分发挥其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

最后,新时代道德建设重在实践,重在实实在在地奋发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①[英]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王瑞昌、王天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1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8页。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①新时代道德建设同样需要不断地拼搏进取,扫清障碍,开拓创新。新时代道德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上,而且还要内化于行动中,要让人们在行动中自觉地践行它,要建立道德实践平台。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新时代道德建设需要经常开展讲文明、知荣辱的群众性的实践活动,在社会性的实践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实现向上向善的理想追求。在特定的区域中,有针对性地建立道德讲坛等活动平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常态化、规范化。新时代的道德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真正把新时代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连接,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道德水平出发,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

道德建设要树标立杆。任何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及强化,都需要通过树立典范人物,对社会产生“标杆”和“榜样”作用,进而引领社会风尚。要充分地发现和挖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德守礼的先进典型。典范人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榜样。开展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就是要彰显社会主义道德的生命力,使人们在认识和学习典范人物的活动中,在先进榜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下,感受到社会主义道德的真实存在,享受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果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满足,从而不断形成道德共识。总之,社会主义道德的实现关键在于真抓实干,必须使先进的价值观念能够真正地融化在我们的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任何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需要避免的。同时,实践平台的建构要注意形式多样,增加实用性、趣味性,使活动既严肃认真,又能吸引人。让人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明荣辨辱,弃恶扬善,彰显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Logic Approach to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ome thought after studying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Ma Yongq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ndows moral construction with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Mo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in building an all-around affluent socie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moral support.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construct a moral and cultural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reality of the new era,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morality and promote education in collectivism. In practice, we should combine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with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the era,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ifferent moral subjects,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and work real hard at mo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new era; moral construc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诘问历史:《死水微澜》为什么会被漠视?*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632)

摘要:《死水微澜》是李劫人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区域文化品格的长篇小说。但是长期以来,《死水微澜》一直被学界所冷落;而冷落它的主要原因,又无非是环境、人物和事件都不够“典型”。由于现实主义的“典型论”,过于强调文学审美的共性原则,如果我们不彻底打破这种僵化思维模式,重新去正视文学审美的特殊性,像《死水微澜》之类的优秀作品,是很难进入到文学经典之列的。

关键词:《死水微澜》;典型化;地域性;批评标准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09-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2

《死水微澜》是李劫人“大河三部曲”中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其巴蜀人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一个又麻又辣的成都故事,惹得那些远离故乡的川籍作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大呼过瘾。郭沫若不仅称之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更认为《死水微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作品”。^①巴金也赞叹不已地说,“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历史绝无理由,去忽略“这样一位大作家”。^②

按理说,有郭沫若、巴金等文坛巨匠的鼎力推荐,《死水微澜》早就应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研究者所热烈追捧的经典文本;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对于这部优秀作品,一直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从1936年《死水微澜》问世一直到1981年,总共就出现过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郭沫若的《中国左拉之待望》,另一篇则是羊路由的《谈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对此,许多人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新时期以来,有识之士从文学自身的审美角度,发现了《死水微澜》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以及李劫人书写川西风俗民情的文化意义;所以,力主恢复《死水微澜》的经典地位,重估李劫人文学史地位的社会呼声,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比如,刘再复便曾忿忿不平地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③而刘心武更是仗义执言道:“李劫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是时候捡起来了,他不能再被埋没了!”^④但主流学术界却无视这种社会呼声,他们对《死水微澜》仍旧是不冷

* 收稿日期:2017-10-05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5—),男,山东招远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1937年第2期。

②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③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④许雯:《刘心武:李劫人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了》,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4月5日。

不热、漠不关心。这绝不是我在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仅以中国知网所统计的数字为例,研究李劫人作品的全部文章,迄今为止只有400篇左右。这个数字,不仅与郭沫若、巴金研究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是同沙汀和艾芜研究相比较,也不过是研究他们文章的一个零头(研究沙汀的文章有1345篇,研究艾芜的文章有1300余篇)。如此看来,李劫人及其作品的被忽视,一定有其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只不过是学界不愿道破罢了。

一、《死水微澜》空间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死水微澜》的空间叙事是描写成都,而巴金《家》的空间叙事也是成都,可为什么《家》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死水微澜》却一直都被研究者所漠视了呢?若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如何看待环境背景的典型化问题,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一个障碍。

长期以来,空间叙事作为一种背景场域,始终都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优劣好坏的前提条件;因为评论家们坚信,空间叙事的场景设计,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一个事关“典型环境”的重大命题。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一直都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又被集中概括为“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两大要素,没有“典型环境”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人物”。所以,运用“启蒙”或“革命”的话语标准,去衡量《死水微澜》的空间叙事,它显然缺乏宏大叙事的“典型环境”,故这部优秀作品备受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死水微澜》的故事叙事,究竟是要展示一种什么样的空间环境呢?我觉得巴金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他说李劫人是一个“成都的历史家”,而《死水微澜》也是一部“成都的风俗志”。^①凡是读过《死水微澜》的人,几乎都认同巴金的这种说法。小说情节的空间叙事,是从天回镇到成都府,即通过一个“大成都”的文化写意,去表现巴蜀人那种真实而自然的人生态度。作品正文的开端曾交待说:“在成都与新都之间,刚好二十里处,在锦田绣错的广野中,位置了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镇市”^②——天回镇。我们注意到,作者特别强调天回镇是“在成都与新都之间”,且先去描写天回镇,然后再去描写成都府,这恰是李劫人的过人之处。因为作者于无意之中,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现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无疑是从城市化开始的;而中国城市化的渐变过程,又与小城镇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史上,小城镇既是大都市的最初原型,又是连接城乡文化的重要纽带,它集中记载着中国现代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始终都保持着异常鲜明的乡土特色。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那样,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小城镇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③费孝通先生主张将“城镇”的文化属性“归到乡的一边”,那是因为他非常清楚,20世纪中国社会由“镇”到“城”的演进脉络,虽然具有西方经验的外来因素,但其本质上仍保留着农耕文明的历史痕迹。李劫人只是一个作家,他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去阐述中国小城镇的文化意义,但却在《死水微澜》中,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叙事,表达了同费孝通完全一致的思想看法。比如小说

①《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98页。

②李劫人:《死水微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③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8-49页。

的第二章，作者对于天回镇的外景勾勒，就是大有深意的。他不露声色地信笔写道：

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驼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①

这段描写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你说天回镇是“城”吧，可是它却保留着“乡”的原始状态：满街的“驼畜的粪”，以及“秽草猪粪，狗矢人便”，其“脏、乱、差”的程度，与中国农村社会的自然场景并无二样。如果你说天回镇是“乡”吧，可是它又有着“城”的繁荣和热闹：“外国来的竹布，洋布”应有尽有，“男子戴的瓜皮帽，女子戴的苏缎帽条”也一样不缺，成都市场上流行的“香肥皂，白胰子，桃园粉，朱红头绳，胭脂片”更是一应俱全，大老表罗歪嘴的鼻梁上，甚至于还架着一副颇为时髦的“大墨晶眼镜”；成百上千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到镇上赶场，“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声音，完全是人的，虽然家禽家畜，也会发声，但在赶场时，你们却一点听不见，所能到耳的，全是人声”。

然而，与天回镇相比较，李劫人笔下的成都府，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从蔡大嫂和招弟进城后的视角去观察，成都府无非是比天回镇的街面更大、人口更多而已：青羊宫的赶庙会，“四乡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乡下人买“农具”和“竹器”等实用之物，城里人买“字画”或“玉器”等小玩意儿，“三清殿上，黑压压全是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与天回镇上的“赶场”，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大街上也是石板铺路，人们出行也是靠“轿子”和“鸡公车”；马匹穿城而过，一路上尘土飞扬；“活猪市”设在城里面，同样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房屋建筑古老而压抑，丝毫没有现代感，比如赫赫有名的郝公馆，里面不过“到处都是房子，四面全是几丈高的砖墙；算来只有从二门到轿厅一个天井，有两株不大的玉兰花树；从轿厅进来到堂屋，有一个大院坝，地下全铺的大方石板，——从堂屋的倒坐厅到后面围房，也只有一个光天井，没有草而有青苔。”在招弟看来，郝公馆虽然很大，但却不如天回镇上的“云集栈”气派，“门口是一片连三开间的饭铺，进去是一片空坝，全铺的大石板，两边是很大的马房。再进去，一片广大的轿厅，可以架上十几乘大轿。穿过轿厅，东厢六大间客房，西厢六大间客房，上面是五开间的上官房。”成都府唯一比天回镇“现代”或“洋气”的地方，就是那些有钱人，已经用上了“一般人尚少用的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等日常小东西”，以及钟表、八音琴等洋玩意儿。曾经受韩二奶奶的深刻影响，“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的蔡大嫂，去了一趟成都之后，也没有觉得成都有多么好；而招弟更是认为成都不如天回镇，“乡下的天多宽，地多大，树木多茂，草多长，气息多清”。李劫人之所以如此去描写成都的城市面貌，绝不是旨在建构“成都想象”，更不是为了要去表现“‘成都’作为‘都市’空间和乡村、小镇所构成的空间分割”，或者“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分配”。^②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无非是在告诉读者，天回镇其实就是成都的前世缩影，而成都也只不过是放大版的天回镇，中国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足迹，都摆脱不了由“乡”到“镇”再到“城”的基本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里，中国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建设，必然会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明显特征，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也就在所难免了。比如，《死水微澜》所描写的“城乡一体

①李劫人：《死水微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吴雪丽：《“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劫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化”,除了天回镇与成都府房屋街道的外形相似性,还有“乡民”同“市民”身份的自由转换,即“乡民”可以转变成现代“市民”,“市民”也可以转变成现代“乡民”。社会人群如此频繁的流动和迁徙,又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中国城乡文化的错综复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者在《死水微澜》中,正是通过招弟和韩二奶奶的身份互换,深刻地揭示了“乡”与“城”之间的微妙关系。因逛庙会而“走失”的招弟,无论多么不喜欢成都这个地方,她都必须尽快地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成为一个未来的成都人;韩二奶奶虽然曾是成都府上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即便她嫁到天回镇四年仍“过不惯乡下生活”,可是她心里却十分明白,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通过天回镇与成都府这两个空间背景的反复切换,李劫人隐喻性地表达了《死水微澜》的创作主题:“死水”即是指由“城乡一体化”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结构,而“微澜”则是指这种文化超稳定性结构对于一切不稳定性因素的消解能量。这无疑是一种大胆而又睿智的艺术构图。

从纯粹文学审美的切入角度去阅读《死水微澜》,其空间叙事应该是极具艺术欣赏价值的。李劫人凭借着他“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死水微澜·前记》)的情绪记忆,把一个古老的成都描写得活灵活现,所以沙汀才会无比感叹地说,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将永远为他的读者津津乐道”^①。但从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原则出发,《死水微澜》中的天回镇与成都府,确又明显背离了宏大叙事的“典型环境”,人们对其冷眼相观也就不足为奇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话语,是要求作家“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其“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③如果我们按照“揭出病苦”与“唤醒民众”的评价标准,去比较《死水微澜》和巴金的《家》,两者的空间叙事虽然都是描写成都,但《家》中的环境背景,明显要比《死水微澜》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典型”意义。阅读小说《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巴金将“高公馆”置放于成都这一空间背景,但他着力描写的是“高家”而不是“成都”,故“成都”这一区域性文化符号,其实并没有空间叙事的实际意义;而“高家”的亭台楼阁、高墙深院,在江南一带比比皆是,你就是把它放在苏州或杭州,读者都会认可与接受。正是由于封建大家庭在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故《家》也因其“放之四海而皆准”,被启蒙精英赋予了反封建的神圣使命。《死水微澜》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天回镇还是“郝公馆”,李劫人的创作宗旨,是要去描写大成都的文化氛围:“袍哥”人家与四川“辣女”,增添了天回镇故事的无穷魅力;青羊宫和科甲巷的全力衬托,更突显着巴蜀人“逛庙会”时的幽默感。“郝公馆”并非是《死水微澜》的叙事中心,如果去除了从人到物的浓浓川味,它将成为另一个“高公馆”,同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张扬区域文化而不是批判封建家庭为重心,这与启蒙精英对于新文学的思想预期相去甚远,故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视《家》而轻视《死水微澜》,也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和自己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话语,要求新文学从思想启蒙,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描写地主资本家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社会,等等”,并敢于对旧世界敲响丧钟,为中国人指明“人类新社会的实现即在目前”^④。如果我们以昭示“人类新社会的实现”为评价标准,去比较《死水微澜》和茅盾的《子夜》,《子夜》的政治社会学意义,更是远大于《死水微澜》的文化民俗学意义。《子夜》虽然

①沙汀:《怀念李劫老》,《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页。

③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1923年12月31日第103期。

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1931年第8期。

也把大都市上海作为空间叙事的环境背景，且从全视角去艺术化地再现了它的畸形繁荣，然而茅盾本人的主观用意，却不是赞美大上海的现代与时髦，而是要“以大都市做中心”，去辐射“中国的全社会”，进而通过揭示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去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必然性。^①《死水微澜》则完全不同，李劫人笔下的成都，无非是老街道、古建筑、杀猪巷、鸡公车，除了一种厚重历史的沧桑感之外，城市建设没有丝毫的现代气息，更不要说什么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新观念了。对此，郭沫若曾认为李劫人的笔调“稍嫌旧式”，似乎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相脱节。^②也许被郭沫若不幸而言中，正是因为笔调的“稍嫌旧式”，《死水微澜》的成都叙事才不被革命话语所待见。

对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理论，我个人始终存有一个疑问：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是否就一定要具有典型性？恐怕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就拿学界所无限敬仰的鲁迅来说，他早年曾赞同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普遍性意义，但是到了晚年，他却更加推崇文学创作个性化原则的特殊性意义。比如他在写给陈烟桥的信中就明确地说过，文学创作“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只可惜中国年轻的文学艺术家们，却对此“大抵不以为然”。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个“地方色彩”就是“各地的风俗，街头风景”^③，即空间叙事的基本范畴。如果我们以此去推论，《死水微澜》的“地方色彩”，虽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没有使其“成为世界的”，然而将它视为文学经典，并问鼎中国现代文坛，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死水微澜》人物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罗歪嘴和蔡大嫂是《死水微澜》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他们一个是放荡不羁的“袍哥”人家，一个是随意任性的四川“辣女”。如果没有他们在天回镇上演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恐怕《死水微澜》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学看点和艺术魅力了。李劫人之所以要塑造罗歪嘴和蔡大嫂这两个人物形象，其用意并不是要表现巴蜀人因“地处僻陋不遵礼法”所养成的叛逆精神^④，更不是“借天回镇的芸芸众生”去“竭力描绘‘东亚病夫’的整体形象”^⑤，而只不过是“以他对巴蜀人习性的透彻理解，去表现他们那种豁然达观的人生态度”。故正确评价《死水微澜》的经典意义，如何看待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问题，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二个障碍。

若要准确地解析罗歪嘴和蔡大嫂这两个人物，我们首先必须去打破这样一种传统而教条的思想偏见，即“‘成都’因地处中国西南而交通不便，且因距离政治中心遥远而信息闭塞，生活在这里的也是一群‘老中国’的儿女们”^⑥。成都虽然居于中国西南腹地且远离政治中心，但它却既不封闭也不保守，相反巴蜀文化又因其多元性的构成因素，表现出了包容与开明的内在特征。许多研究者由于并不真正了解近代成都历史，往往把成都人看作是世代相传的“川蛮子”。清人傅崇短在其《成都通览》一书中，早已对此谬误作出过纠正。他说：“现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明末张献忠入川，已屠戮殆尽。国初乱定，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余皆从军入川，及游幕、游宦入川，置田宅

①乐雯：《〈子夜〉和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②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1937年第2期。

③《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1页。

④邓经武：《论李劫人创作的巴蜀文化因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⑤杨亦军：《〈死水微澜〉的历史“反叙述”——对作品“历史真实”的思考》，《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⑥吴雪丽：《“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劫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而为土著者。”^①而在《死水微澜》的第5章第11节,李劫人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至于成都府属十六县的人民,顶早都是康熙雍正时代,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处,招募而来。其后凡到四川来做官的,行商的,日子一久,有了钱,陆行有褒斜之险,水行有三峡之阻,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而又因成都平原,寒燥适中,风物清华,彼此都是外籍,又无聚族而居的积习,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加之,锦城荣乐,且住为佳,只要你买有田地,建有居宅,坟墓再一封树于此,自然就算你是某一县的本籍。^②

李劫人说得十分清楚,由于成都人“彼此都是外籍”,他们相互不问“家世出身”,所以也就不存在“嫉视异乡”的社会现象,故形成于康熙雍正以后的巴蜀文化,呈现出了为中国其他地域所没有的巨大包容性。四川所特有的“袍哥”文化,也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帮派组织。虽然它最早源于“咽喉”,但到了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因川江航运迅速发展,上水船用人多而下水船用人少,两湖等地大量纤夫和水手滞留川地,“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三四千人,月积万余员”。其生计匮乏时,“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咽喉伙党”。“袍哥”将自己的地盘称之为“码头”,正是由此而得名。^③外地游民的大量加入,使“袍哥”组织呈现出了两大特色:一是它的文化包容性,即“普天下皆兄弟也”,只要加入“袍哥”组织信奉江湖道义,无论你是哪里人都会得到他者的帮助与照应;二是它的文化特殊性,正是由于“袍哥”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必须要形成一种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文化秩序,去替代成员间各自不同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包容性使巴蜀之人相敬如宾,特殊性则又使“袍哥”人家独立不群,只有了解了巴蜀文化的这一特性,我们才能读懂罗歪嘴、蔡大嫂这两人的川人秉性。

对于罗歪嘴这一人物形象,研究者的评价几近一致:“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匪气和霸气,又有着江湖人特有的义气、豪侠”^④,虽然身染帮派社会的各种恶习,但“他毕竟是一个不受现存秩序拘束的人,不认为洋人、皇帝和官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也就是带着民主因素的人”^⑤。其实,这些堂而皇之的学术话语,都过于形而上学、微言大义。李劫人笔下的罗歪嘴,既“匪气”又“邪性”,用四川方言来讲,他就是一个“歪人”。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地描写成一个“袍哥”人家,而是将他与巴蜀文化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进而真实地反映了地处大西南、追求自由惬意的人生价值观的四川人。罗歪嘴是“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纵横四五十里,只要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至于本码头天回镇,更勿庸说了”。《死水微澜》开篇对于罗歪嘴身份的这一交待,客观上揭示了晚清与民初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乡镇一级并不设官府机构,“袍哥”顺势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不仅直接干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天回镇的社会风气。由于四川“袍哥”的势力异常强大,甚至渗透到了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军政部门,因此“川人”习性与“袍哥”文化之间,也便具有了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李劫人在《死水微澜》中所要告诉读者的,无非就是近现代巴蜀文化的这一特征。罗歪嘴虽然是一个“袍哥”人家,但却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他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外在约束,更不把“袍哥”帮规当回事儿。比如“帮规”规定,“同人学得修身法”,“宣淫好色要握刀”^⑥,罗歪嘴却对此视而不见。他包养妓女刘

①符碧矩:《成都通览》(上),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09、271页。

②李劫人:《死水微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③王纯五:《袍哥探秘》,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2页。

④罗维:《论李劫人小说中的民国蜀地匪盗想象》,《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⑤李仕文:《李劫人的生平与创作》,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49、102-103、154页。

⑥刘师亮:《汉留全书》,重庆:重庆新生印刷厂,1946年,第125页。

三金，除了供自己去宣淫泄欲外，还非常大度地对她说，“你仍可以做零碎生意的，只是夜里不准离开我”。罗歪嘴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大气”，很有点“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豪爽气概，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切身体验，人们是很难去理解这一奇特现象的。又如“帮规”规定，“若逢弟媳与兄嫂，俯首潜身莫乱瞧”^①，罗歪嘴也全然不去理会。他公开与表弟媳蔡大嫂私通，“不再作假，有人问着，他竟老实承认他爱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的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蔡傻子知趣地躲开之后，罗歪嘴又感到有些愧疚：“你放心，她还是你的人，我断不把她抢走的！”像如此荒唐之事，除了李劫人笔下的巴蜀之地，读者恐怕从新文学作品，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范本来。再如“帮规”规定，“暗箭伤人斩为要，丢人卖客罪不饶”^②，就是要求“袍哥”人家应诚实守信，可罗歪嘴更是背道而驰。经营赌场是“袍哥”组织的生财之道，尽管罗歪嘴“平日自持，都很谨飭”，但一见到土财主顾天成那装满银子的“鞞马”，便完全忘记了江湖道义——他同张占魁和刘三金联手作弊，耍奸使诈把顾天成搞得倾家荡产，结果迫使他去“入教”复仇，罗歪嘴本人也被官府通缉外逃他乡。实际上，《死水微澜》中的主要人物，都同罗歪嘴一样自我放纵。不是“袍哥”的顾天成，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却与罗歪嘴的看法一致，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人伦道德或贞操观念。蔡大嫂更是一个“奇葩”，为了救蔡傻子出狱，虽然她既有丈夫又有情人，但还是爽快地答应带着儿子嫁给顾天成。问题是面对因“入教”而得势的顾天成，她竟敢开出这样的苛刻条件：“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像娶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也许，只有四川的“辣女”，才能如此地放肆；也只有四川的耙耳朵男人，才会如此地顺从。一部《死水微澜》，把川人描写得活灵活现，却又丝毫没有贬斥之意，读罢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因为在李劫人看来，四川人在骨子里就具有一种叛逆性；而这种叛逆天性，又于无意识之中，解脱了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对他们的思想束缚。

《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无疑是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人们对于她那种敢想敢做的鲜明个性，也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去加以解读。有学者说她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比如“蔡大嫂同蔡兴顺的婚事，无须多说是封建秩序造成的悲剧”，那么她与罗歪嘴的婚外恋情，也应被视为对儒家礼教的一种“特殊反抗形式”。^③还有学者说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完美化身，“当其为拯救遭遇危难的丈夫和情人，不惜再嫁为他人妇成为顾太太（顾天成之妻）时，侠义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使得她的形象伟岸光辉起来”^④。从反封建的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侠义精神，似乎都不能准确解读这一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故又有学者认为蔡大嫂对于婚姻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并不源于个性解放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在她身上还是不曾有的，这种追求只是源于‘川辣子’气质的遗传因子——巴蜀古风”^⑤。后一种见解表面观之无不道理，但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常识性错误：《死水微澜》描写的是近代成都，即重新组合而成的社会文化，与移民以前的“巴蜀古风”，没有必然的血缘关系。蔡大嫂作为近代巴蜀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象征符号，她和罗歪嘴一道共同负载着李劫人川人写意的创作意图。除了性别差异之外，蔡大嫂的“野性”与罗歪嘴的“邪性”气质同构，他们都是以自己张扬而强悍的独立人格，去

①刘师亮：《汉留全书》，重庆新生印刷厂，1946年，第125页。

②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

③李仕文：《李劫人的生平与创作》，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49、102-103、154页。

④彭超：《从不同视野下的“蔡大嫂”们看女性意识变迁》，《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⑤索晓海：《浅析蔡大嫂的“川辣子”气质》，《江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向世人诉说着近代巴蜀人的我行我素、卓尔不群。如何从蔡大嫂这一艺术形象,去看待川人思想的开放性特征呢?我个人以为,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蔡大嫂绝不安于现状的躁动心态。蔡大嫂出嫁之前叫邓幺姑,“母亲自然是爱的,后父也爱如己出”。她从小就听韩二奶奶讲成都,“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所以邓幺姑对于成都的想象,始终被韩二奶奶支配着。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并在大户人家去住,尝一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也算不枉生一世。”后来韩二奶奶死了,邓幺姑成了天回镇上的蔡大嫂,可她从未放弃进城之梦,不仅跟着罗歪嘴去了一回成都府,最终还嫁给了顾天成,住进了“大户人家”。其次,是蔡大嫂绝不恪守传统的人生态度。嫁给蔡傻子,她始终都不甘心。遇到大老表罗歪嘴之后,她更是心猿意马,魂不守舍。与蔡傻子相比较,她觉得罗歪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到底是个男子汉,有出息的人”。所以,当罗歪嘴表达爱意时,“她不但不躲闪”,并且还主动地去投怀送抱,甚至发誓要“带起金娃子,同罗歪嘴一起逃走,逃到外州府县恩恩爱爱的去过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再者,是蔡大嫂绝不委屈自己的务实性格。蔡傻子被抓、罗歪嘴逃走,她没有像中国传统的女性那样,去苦苦等待着自己的男人回来,而是选择了再嫁他人、另谋生存。面对父母的埋怨和质疑,她语出惊人地回答道:“你两位老人家真老糊涂了!——难道愿意你们的女儿受穷受困,拖衣落薄吗?难道愿意你们的外孙儿一辈子当放牛娃儿,当长年吗?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为啥子不嫁?”我相信蔡大嫂的“再嫁”,有为了救蔡傻子的因素,然而后面那几句话,才应是她的真实心声。蔡大嫂与罗歪嘴一道,尽情演绎着四川人的自我个性:他们率性而为、蔑视一切,他们敢爱敢恨、逍遥快活。近代巴蜀文化这种未经启蒙便具有的“现代性”,足以令那些大谈启蒙的知识精英们大跌眼镜、唏嘘不已了。

读者喜欢罗歪嘴和蔡大嫂这两个人物,但批评家却未见得喜欢这两个人物;因为无论是启蒙话语还是革命话语,都会觉得他们缺乏理论意义上的“典型”性。启蒙话语中的“典型人物”,应是“阿Q”或“华老栓”式的愚民形象,只有让他们表现得麻木不仁、昏庸不堪,“启蒙”才会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价值。可是罗歪嘴与蔡大嫂,他们既不愚昧也不守旧,相反都个性鲜明、活得自在;“启蒙”所推崇的独立人格,在他们身上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也只能是将其视而不见了。革命话语中的“典型人物”,应是“多多头”或“立秋”式的贫苦农民,只有让他们一贫如洗、苦大仇深,“革命”才能找到反抗社会的客观理由。可是罗歪嘴和蔡大嫂都不是贫苦出身,一个是奸诈刁滑的流氓恶霸,另一个是不守妇道的妖冶浪女;“革命”所推崇的阶级觉悟,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不被视为革命的对象就已经很不错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革命话语固然已经不再时髦,可是维护思想启蒙的合法地位,却仍旧是学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如果这一理论思维不发生彻底的转变,我个人总觉得,恢复《死水微澜》的经典地位,恐怕仍旧没有那么乐观。

三、《死水微澜》历史叙事的典型性问题

新时期以来,学界为了给《死水微澜》正名,纷纷以宏大叙事的理论思维,重新去阐释其反映真实“历史”的艺术价值。比如,有研究者便认为,《死水微澜》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①还有研究

^①钱林森:《“东方的福楼拜”与“中国的左拉”——李劫人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者认为,《死水微澜》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完全一致的。^① 学界之所以突然间强调《死水微澜》的“历史”真实性,其目的无非就是想把这部作品纳入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赋予其中的环境、人物和事件以“典型论”的合法性,进而实现大幅度提升《死水微澜》经典意义的主观目的。这种矫枉过正的偏激做法,其实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我很赞同邵元宝的看法:“许多文学史教科书提到《死水微澜》,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而《死水微澜》的最大看点,并不是它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复述或再现,“乃是义和团运动前后成都地区完整的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沉溺在各自尘俗生活与欲望中,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② 故《死水微澜》能否成为现代文学经典,如何看待历史叙事的真实性问题,是我们无法绕开的第三个障碍。

不可否认,《死水微澜》中有历史大事件的影子存在。李劫人还真的曾经说过,《死水微澜》所要表现的,是“1894 年到 1901 年,即甲午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③。但这是李劫人在 1950 年代的说法,而不见得是他在 1930 年代的想法。1930 年代,他说当时只想去写自己记忆中的一个世界,即他生长于此的天回镇和成都府,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这就决定了《死水微澜》的历史叙事,带有明显的生活化特征,即通过顾天成与罗歪嘴两人的矛盾冲突,以及顾天成同自己家族的内部结怨,间接性地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

土财主顾天成的“入教”,在“死水”一般的天回镇,引起了一波小小的“微澜”,但却与四川的“教案”无关。曾有学者这样认为,“在《死水微澜》中,顾天成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人物形象,他反动已极,集封建地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凶悍于一身,突出反映了这两者相互勾结、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大罪极恶”^④。言下之意,顾天成“入教”的目的,是为了去给洋人当帮凶,这种说法简直是荒谬之极。顾天成既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同时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帝,比如他经常质疑“耶稣几时才能显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顾天成的“入教”,完全是出于一种功利目的,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去向罗歪嘴复仇罢了。因为在“云集栈”他被刘三金色诱,总共输掉了一千多两银子,还被罗歪嘴痛扁了一顿,于是两人便结下了梁子。在成都府看花灯时,顾天成了约了“一个不知利害的四浑小伙子”,当着罗歪嘴的面去“臊皮”蔡大嫂,未曾想被罗歪嘴“劈脸一个耳光,又结实,又响,顾天成半边脸都红了”。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自己光顾着撒野打架,把小女儿招弟也给走丢了,故两人的梁子也越结越深。钟幺嫂给顾天成出主意,告诉他“入教”有诸多好处,曾师母不但可以帮他报仇雪恨,还不用去还那几百两银子的欠账。梳理一下故事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发现顾天成在天回镇,也是一个招摇过市的“歪人”;他向罗歪嘴去复仇,完全是两个“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有何干系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劫人对于基督教,“恐怕更多还是持否定态度”^⑤,我看未必是如此。曾师母这一人物的“教会”背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琢磨。她原本是个“孤女”,被一个洋婆子买了下来,收养在教堂里。长

①杨亦军:《〈死水微澜〉的历史“反叙述”——对作品“历史真实”的思考》,《当代文坛》2011 年第 5 期。

②邵元宝:《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中国比较文学》2005 年第 1 期。

③李劫人:《死水微澜·前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 页。

④李仕文:《李劫人的生平与创作》,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年,第 149、102-103、154 页。

⑤邵元宝:《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中国比较文学》2005 年第 1 期。

大成人之后,她与一个姓史的洋人偷情,被史夫人发现并大闹了一场,史先生没办法只好把她嫁给了曾先生。就算《死水微澜》把曾师母和史先生写得都很烂,那也只能说明他们个人的修养有问题,没能够严格遵守《圣经》教义的道德戒律,根本谈不上李劫人对基督教“持否定态度”。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顾天成与罗歪嘴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与“教案”事件没有瓜葛。顾天成“入教”以后,罗歪嘴果然遭到了报应,“制台派了一营巡防兵”,来捉拿他和张占魁等九人,害得他们仓皇出逃去躲避风头。官府派兵抓捕罗歪嘴等人,究竟是不是洋人史先生出的主意,作者没有交待,我们也无从得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罗歪嘴本人,并没有参加任何反洋教的实际活动。在官兵到达之前,罗歪嘴同蔡大嫂两人正“酪”得很:

他们如此的酪!酪到彼此都发了狂!本不是甚么正经夫妇,而竟能毫无顾忌的在人跟前亲热。有时高兴起来,公然不管蔡兴顺是否在房间里,也不管他看见了作何寻思,难不难过,而相搂到没有一点缝隙;还要风魔了,好像洪醉以后,全然没有理智的相扑,相打,狂咬,狂笑,狂喊!①

罗歪嘴本来就不关心社会政治,如今又有蔡大嫂整日缠身,他哪里有时间去反洋教呢?成都府也是一样,人们也不关心“义和团”的造反,比如“说到红灯照,郝达三有点弄不大清楚”,而姑太太更是满腹牢骚,“又是北京城的事!听厌了,听厌了”。由此不难看出,《死水微澜》中零碎散乱的历史叙事,完全不具有展现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一种揭示社会众生相的辅助手段。

顾天成因“入教”而同家族发生冲突,同样与历史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故事情节倒是与《阿Q正传》颇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为己任。首先,顾天成奉“洋教”与假洋鬼子剪辫子,都遭到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强大阻力。对于顾天成的奉“洋教”,么伯父么伯母很是想不通:“第一个理由,他不是吃不起饭的,俗话说,饿不得了才奉教,他是饿不得的人吗?第二个理由,奉了洋教,就没有祖宗——他能忍心当一个没祖宗的人吗?第三个理由,奉了洋教,只能供洋人的神——‘连菩萨都不要了,还活得成吗?’”所以,他们才会去拼命反对。阿Q也认为,假洋鬼子剪了辫子,就是违背祖制、里通外国,“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其次,曾师母与阿Q都渴望依靠他者的力量,去满足自己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欲望。八国联军就要打到北京了,曾师母异常兴奋地对顾天成说:“等到洋人把西太后与光绪捉住——史先生就是四川制台了,很大的官,是不是呢?如果史先生做了制台,我们全是他的人,不再是清朝的百姓,是不是呢?我们教会里的人,全是官,做了官,要甚么有甚么,要怎样便怎样,是不是呢?”而阿Q“革命”的全部理想,也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至于未庄那些“鸟男女”,全部杀头,一个不留。再者,人们对待顾天成和阿Q前后不同的态度转变,更是反映出了某些国人无节操的人格特征。顾天成刚“入教”时,其处境是十分凄惨的:“葬在祖坟埂子外的老婆的棺材,也着么伯父叫人破土取出,抛在水沟旁边,说是碍风水。并且四处向人说,天成是不肖子孙,辱没了祖宗的子孙,撵出祠堂,把田屋充公。”阿Q因调戏吴妈被赵家父子打了一顿,他从此也被未庄人逼上了生存的绝境:“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然而,顾天成与阿Q“发迹”之后,人们的嘴脸立刻就变了——听说洋人要来,么伯父么伯娘大惊失色,不但马上把顾天成的田屋奉还给了他,“么伯母又格外捧出一张红契,良田

①李劫人:《死水微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五十亩，又是与他连界的，说是送给他老婆做祭田。他老婆的棺材哩，已端端正正葬在祖坟埂子内，垒得很大，只是没有树碑。说不敢自专，要等他自己拿主意。”听说革命党要来，阿Q在未庄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敬重，赵太爷喊他“老Q”，老尼姑哭丧着一张脸，“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无论是巴蜀人还是浙东人，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故表现出相同的国民性特征，并不是一件值得称奇的事情。但是细细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李劫人笔下的巴蜀之人，却更为狡黠善变且工于心计。比如说，天回镇人之“愚”，同未庄人之“愚”，并不完全一样——阿Q看不惯假洋鬼子剪辫子，那是因为他观念陈旧，而表现出来的真“愚”；么伯父反对顾天成“入教”虽然也有传统的因素，但其真正目的却是要去吞并顾天成的家产，这说明他是假“愚”而真“阴”。阿Q幻想以“造反”去获取他人的不义之财，到头来却落得个杀头的罪名，他是真傻而不是装傻；曾师母虽然也不着边际地为教民封官许愿，但她却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去吸引和诱惑更多的人“入教”，这说明她骨子里面透着“精”。另外，赵太爷与么伯父都“做贼心虚”，但赵太爷只是改称“老Q”却没有一点实惠，么伯父则陪送了顾天成五十亩良田，做人谁更圆滑也就一目了然了。清人傅崇短曾用“人情狡诈，千变万化”，去形容近代社会的巴蜀民风；而《死水微澜》的创作意图，则正是对这种民风的艺术诠释。否则的话，《死水微澜》充其量就是放大版的《阿Q正传》，不仅不会令读者着迷，更会失去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存在价值。

《死水微澜》在其碎片化的历史叙事中，把巴蜀文化描写得鬼马精灵、风趣幽默，比起其他川籍作家的小说创作，毫无疑问它才是真正具有区域文化意味的文学经典。但为什么人们却把它给遗忘了呢？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既有学术成见，更有历史的原因。我们先来说说学术成见：启蒙话语强调历史事件的本身价值，直接决定着历史叙事的典型性与真实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立体化地去表现社会生活，不能从人物与历史的联系中把握住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干预生活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在于它紧紧地扣住了重大历史事件，“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关系中，从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制约作用上，独特地、创造性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①无论我们怎样去人为地提升，《死水微澜》都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因为它的主体结构，人物不是为历史服务的，而是历史为人物服务的，不以历史叙事为重点，当然也就不可能去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了。革命话语强调历史叙事的“当下”价值，即文学应服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题材”必须与“历史”具有一致性，是否“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阶级”，也便成为了衡量文学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唯一标准。^②《死水微澜》既没有描写辛亥革命，又没有描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描写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缺乏“历史”的现代感无疑就是脱离“历史”的当下性，这就直接决定了《死水微澜》遭受排斥的悲剧命运。我们再来说说历史原因：《死水微澜》写于1935年7月，次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众所周知，1935年是个多事之秋，中日矛盾已开始激化，尤其是“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全民族上下都群情激昂。借用当年《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里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实际上何止是华北，整个中国都是如此。人们哪里还有心情，去研读什么小说呢？《死水微澜》的生不逢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曹禹的《原野》和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写于同一时期。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也曾受到过冷遇；

①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②《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只不过由于它们的作者早已是名家,故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对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和解读,它们的经典地位也是由学界后来所追加确认的。李劫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写《死水微澜》时,他还没有在文坛出名;再加上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那么它只能是静静地躺在尘封的历史中,等待着有识之士去发现它的文学价值了。

我们不必为《死水微澜》去叫屈,历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经典,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而“审美”的前提就是“好看”。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明确地指出,“熏”、“浸”、“刺”、“提”是文学审美的四大要素;若要充分发挥好这四大要素,文学作品当然首先要做到“好看”,即“以赏心乐事为目的”。^① 我个人认为,梁启超之本意,是在强调文学“好看”的基础上,去负载一定的社会功能。然而五四以后,文学的“好看”性逐渐被“实用”性所代替,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也逐渐回到了对传统“文章”的概念认同。像《死水微澜》这样的优秀作品,并不缺乏“熏”、“浸”、“刺”、“提”的感人力量,无非是不符合研究者的条条框框,所以它的经典性才会受到质疑。我很想问一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既没有“经国之大业”,又没有“不朽之盛事”,可是大家为什么都异口同声地说,它就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呢?关键就在于读者认为它“好看”且“感人”。所以,“好看”又“感人”的《死水微澜》,究竟是不是一部经典之作,不应该由那些“玩文学”的批评家们来决定,而应该由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来决定。

Heckling the history: Why has the novel *Stagnant Water in Ripple* been ignored?

Song Jian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dong, 510632)

Abstract: *Stagnant Water in Ripple* is Li Jieren's magnum opus as well as a novel with regional cultural features. However, *Stagnant Water in Ripple* has been ignored by researchers for a long time mainly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characters and incidents are not typical enough. The typical theory of realism overemphasizes the common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aesthetic. If we do not break this rigid thinking thoroughly, and acknowledge anew the particularity of literature aesthetic, the excellent works like *Stagnant Water in Ripple* will have no chance to enter the rank of literary classics.

Key words: *Stagnant Water in Ripple*; typification; regionalism; criteria for criticism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董 燕 郑家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0)

摘要: 先锋小说创作潮流虽然仅经历了短短几年的辉煌就逐渐式微,但其对小说“叙事”本质的不倦探索、对小说语言的极端实验以及对生命体验的深入挖掘,无疑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进化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先锋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是中国小说观念的一次重大革新,其对小说的本体实质、价值功能等方面的探索无疑更新了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识,尤其是对小说“叙事”和形式创新方面的实验,更是有力推动了汉语小说追赶世界的步伐,拓宽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审美空间。

关键词: 先锋小说;小说观念;价值功能;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2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3

自先锋小说蔚成潮流的那一刻起,甚至说在它尚未被命名为一种潮流或类型之前,相关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到如今学界对其的关注已呈逐渐弱化之势,特别是随着先锋小说家的逐渐转型以及整体社会语境的急剧变迁,好像再去关注这个“昨日黄花”已没多少学理意义和价值。回眸那一段历史,重新阅读那些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本,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这一课题仍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先锋小说特征、先锋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类的研究相当深入,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对先锋小说家个体的研究也相当精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以先锋小说家有关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方面的讲稿或论著为理论依托,并兼及其小说文本,对先锋小说如何突破和革新传统“小说观念”的研究还十分零散。实际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总结和探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理价值,这不仅能深化作为重要文学史现象的先锋小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为精确地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小说观念的再度嬗变,而且对当下的小说创作也能提供某些理论观念的参考与镜鉴。

—

自梁启超把“小说”从仅能提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小技末道”的位置一跃而提升到能“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乃至能“新一国之民”的“大说”地位以来,小说就开始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更是成为了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附庸,甚至还一度丧失了其应有的本质规定性。1980年代之后,广大作家痛定思痛,开始对沿袭多年的一些文学观念产生怀疑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加之此时西方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及理论相继被引进,于是关于小说本质和本体性

* 收稿日期:2017-05-26

作者简介:董燕(1980-),女,浙江杭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家建(1969-),男,福建福鼎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问题才受到普遍的关注。而其中探索力度最大、走得最远的,正是当时正值青年且被命名为“先锋派”的小说家群体。

在传统观念中,小说基本上被看作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某种工具性载体,其关注的重心一直在小说本体之外。而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达,首先要做的就是扭转和颠覆这一传统观念。他们逐渐把小说文体从传统的主题、题材、人物、故事内容等窠臼中解脱出来,力争完成小说的去政治意识形态化、去文化化和去历史真实化。与观念更新相呼应,他们极力在小说文本中凸显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存表达,在极具挑战意味的个人化言说、在无限逼近纯粹个体的内心真实的同时,完成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和解构,从而抵达小说本质的审美属性。这种极具先锋性的探索可以称得上中国小说美学和小说观念的一次极为重大的历史嬗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彻底颠覆,而且是对把小说作为新民工具的小说界革命的再度反叛,这标志着在理念上从以往强调小说的主题、典型等意识形态命题回归到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内在的生命意识本身,小说开始回归艺术自身,而不再是图解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外在工具。就先锋小说的实验创新而言,这种探索主要表现在对小说“真实性”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元叙事”理论的中国化阐释和实践两个方面。

在漫长的中国小说发展进程中,是否“真实”一直被看作小说的内在生命和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判断真实性的最主要标准,则是看其与社会历史和外在现实是否吻合,或者说,是否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相一致,要义是求“真”,体现的是“历史理性”,即“通过对全局性、稳定性、秩序性、宏大性的维护,来倡导关于普遍性、真理性和理性的美好设想”^①。而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先锋作家群体,则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传统的真实观表达了深深的怀疑。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真实其实不过是宏大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亦步亦趋,是图解宏大意识形态的僵硬的真实。所以,小说变革的当务之急是祛除附着在小说(文学)上的庞大意识形态,从而还小说以艺术的“真”面目。以余华为例,“西方文学对余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上,比如对于‘小说’、‘真实’、‘现实’、‘学习’和‘继承’等,余华的观念都和当时流行的观念有很大的区别,这可以说是深层的改变”^②。的确如此,在那篇被称为“先锋派宣言”的文章《虚伪的作品》的开头,余华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但他这里所说的“真实”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实践。在余华看来,日常生活的真实只是“表面的真实”。他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述的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生活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③在余华眼中,“真实”不再是一个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虚假”绝对对立的概念,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觉及其艺术的传达就是一种包裹着“虚伪的形式”的精神的真实。这种真实,不再仅仅是事实的真实、现象的真实,而是更高层面的“理真”、“情真”,它遵循的是事理的、性格的乃至情感的逻辑。

余华对“想象”这一原本被认为与“真实”相对立的因素不仅不排斥,反而还特别提倡:“(日常生活)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

①王源:《小说叙事: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突破——略论新时期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中的叙事》,《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②高玉:《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余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③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像的茅屋里度日如年。”^①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对“想象”之于作家的重要意义推崇有加,认为传统奉为圭臬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说法歧义重重、谬误丛生。因为文学中的“生活”并非铁板一块,永无变化,恰恰相反,它有着直接的和间接的、日常现实的和预想可能的、体验性的和知识性的、实际发生的和想象中的等各种充满张力的对立,而文学的魅力就产生于这些生活间的张力之上。不仅如此,余华还进一步提出阅读本身也是一种生活,因为它不仅提供了许多生活经验,而且也提供了关于生活的诸多想象。由此,他和其他先锋作家一道,为了向朋友和读者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而走上了寻找新语言的道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放弃探求所谓本质生活、逻辑必然的努力,转而对“生活”中的边缘化的、偶然的甚至是充满神秘的部分倾注热情。在先锋小说家的笔下,“真实”的生活已不再是那些客观的、原始的现实生活,而是存在于他们精神世界里的、根据主观意图和内心规则重新组合过的生活。他们通过创作,解构了传统的“真实”观,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真实”,即带有作家鲜明主体感觉、印象、记忆和情感表达的真实。像《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褐色鸟群》《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不断颠覆着人们对道德秩序和理性逻辑的固有经验,拆解建立在客观经验之上的传统真实观,探寻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真相,进而引发人们对小说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

先锋小说既然认定文学的“真实”并非传统的反映观意义上的真实,所以它也就不必再想方设法让读者相信自己叙述的即是社会和生活的真实。相反,先锋小说家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有意暴露叙述行为、故意揭穿小说的虚构性本质的“元叙事”手法。在以往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小说的虚构性常常隐藏在小说意义的背后,甚至被忽略。即便作者想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般也要处心积虑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以避免破坏小说给人的真实感。而在先锋小说中,叙述者却故意向潜在读者揭露、或者与他们讨论小说的虚构过程,有的甚至干脆把“如何叙述和虚构”的过程本身当作小说的一种“题材”。先锋小说家无疑是在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无它,就是这么一种“虚构”。这样,“虚构”在文本中就从潜在转向显在,堂而皇之地被他们标举为小说的本质。

这种中国式的“元小说”手法,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马原的《虚构》。这一小说开头的叙说已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被广泛征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②这种写法与传统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它一点也不隐瞒地告诉读者,“我”既是作者,还是小说的叙述者以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小说中发生的一切或许是真实的情景,或许是作者根据想象编撰出来的故事。不惟马原,可以说几乎每一位代表性的先锋小说家都尝试过这种详细展示小说创作流程的小说手法,像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叶兆言《枣树的故事》等,无一例外。这些小说,都有意向读者显示和暴露“叙述过程”本身,彰显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从而对读者以传统的“直观”的方式理解故事内容的习惯形成冲击,将他们对“故事”的理解导引向另一层面。这种元小说的手法,当然有模仿法国新小说的明显痕迹,而且一旦滥用就非但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但不可否认,这种叙事策略的普遍运用,无疑表明了先锋作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自觉反叛与颠覆。

①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②马原:《虚构》,《收获》1986年第5期。

二

先锋小说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革新,除了表现在极力张扬小说“虚构”本质之外,还直接挑战传统小说关于价值和功能的一些稳固理念。众所周知,从近代的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小说一直承担着“新民”、“启蒙”、“救亡”的社会功能;而1949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小说更是被定位为政治的工具,其自身独有的文学价值与功能几乎丧失殆尽。1980年代之后,随着“解放思想”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小说的价值功能观念也随之产生明显变化。从认为小说是外界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到主张文学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从片面追求文艺的教化作用到全面审视文艺的多种功能,小说不再是教育功能的载体,转而成为审美的客体得以存在。作家们不再仅仅看重小说的功利价值,而是开始尝试祛除一直附加在小说身上的宏大的社会功利观念,进而发掘其富有审美性的新的价值内涵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价值意义。

在此方面,还是先锋派小说家走得最远,转换得最彻底。历经“文化寻根”热潮和中国式“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操练,先锋小说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向西方现代派甚至后现代派小说学习模仿的过程,充分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其在中国小说从发展演变史上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以前卫而极端的叙事实验,终于使中国的当代小说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理念等各种宏大话语的制约、羁绊和形塑,从而获得了叙事文本操作的绝对自由。先锋小说家们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外在的社会现实或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这种生命体验也不再是传统的作家个体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体悟和感知,而是一种内心精神世界的复杂呈现,是作家对自身存在的种种难题和精神困境的深入思索,具有鲜明的形而上的哲思意味。

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褐色鸟群》《青黄》、余华的《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等小说,在尽情展示“叙事”所能达到的边界的同时,也对传统小说反映现实、还原历史、启蒙民众、教化人心等宏大话语进行了无情消解。在先锋小说家看来,世界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存在”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是一种群体经验的抽象,是共性的、概括的,而作家则更应该“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的存在”,尽可能去“记述常人尚未来得及思考的真实,论述尚未渗入人们意识的现实本质和现实关系”。^①所以,与传统情节小说的线性逻辑叙事不同,先锋小说大多不关注时间的统一延续性和泾渭分明的因果关系,而是着意于构成文本的各种“故事”可能的随意排列。就像《冈底斯的诱惑》所展示的,文本中陆高和姚亮的故事、猎人穷布的故事、观看“天葬”的故事以及传说中的顿珠顿月的故事完全没有传统小说的线性因果关系,它们可以随意排列、平行并置,形成了如戈特弗里德本所说的“桔形结构”：“这部小说……是像一个桔子来建构的。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片断……组成,它们都彼此相互紧挨着,具有同等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这个坚韧的茎是表象,是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各部分之间是没有关系的。”^②这也就是说,先锋小说是很难从传统的“主题”层面上去把握的,有论者在论述世界范围内的先锋小说——法国“新小说”时认为:“有意识地淡化主

①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②[美]截维·米尔切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2页。

题是包括‘新小说’在内的所有后现代文学一个大致的特征。这是针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自觉的反叛,一种关于文学自身的解构与重构,是一场从理念到手段的文学革命。”^①而中国的先锋小说之于传统小说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认同“形式即内容”的论断,那么从小说主题上来说,中国的先锋小说有效实现了从社会学领域到人类学领域、从传统道德哲学向现代生命哲学的转移,从而突破了社会学与阶级论观念对小说观念的长期束缚。

先锋小说还显示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崭新的“历史观”。既然先锋小说家认定并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的“现实”,那么对于历史这一“过往的现实”,他们同样不能接受其具有真实客观的规定性,并且不断对其进行质疑和省思,而且在大胆的叙事实验和形式探索中彰显一种鲜明而全新的关于“历史”的态度和看法:没有所谓确定无疑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和不确定的;不存在所谓本质不变的历史,历史都是文本化的,一切关于历史的“元叙述”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对“历史”进行叙事时,先锋作家不再像以往的历史叙事者那样仅仅以“客观临摹”的手法,满足于扮演“书记员”的角色,而是更加注重书写历史本身的多义性、偶然性、复杂性,书写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先锋小说家们几乎都对其西方的偶像大师、法国新小说派的杰出代表罗伯·格里耶的相关理念耳熟能详:“小说根本就不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为一个预定的工作而设计的工具,它不是用来展示、表达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外就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它不表达,它只是探索,而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②所以,格非的一系列有着明显关注“历史”倾向的小说,如《追忆乌攸先生》《青黄》《敌人》《迷舟》等,其写作目的显然不在于要探明历史的真相或揭示历史的本质,而仅仅是以探究历史真相为表象的叙事虚构与想象。同样有此倾向而走得更远的,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历史题材”小说。据事后追认,苏童的这批小说除了受法国“新小说”派和同期的其他先锋作家追求极端叙事的影响外,还明显受到了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写出的完全是个人化的、虚构性的甚至是“文本化”的历史,特别是《我的帝王生涯》,作家完全凭借想象建构了一段子虚乌有的“历史”。苏童实际上是运用对文本的热情来抗争和消解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束缚,让文学成为文学,让小说拥有一套自足独立的话语体系。

当然,先锋小说家放弃了对传统的小说价值和功能的追求,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弃文学的职责和义务而不顾。就像洪子诚所睿智指出的:“‘先锋小说’那些出色的作品,在它们的‘形式革命’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归根结蒂,不能与中国现实语境,与对于‘文革’的暴力和精神创伤的记忆无涉……只不过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社会、人性的体验的记忆,会以另外的方式展开。”^③实际上,在极端的先锋观念和叙事实验背后,先锋小说文本透露的仍然是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就像有学者针对余华的系列极端叙事形式实验所指出的,“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更关注人物本身的生命价值,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融入普遍的人性描写当中,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地融合起来”^④。可以说,先锋小说在关注“形式”的同时,仍不失对人性与自我存在的思考与追问,只是这种努力深藏于荒诞与虚无的外在形式之下,更加隐秘、遮蔽,不易察觉而已。

①王化学:《20世纪先锋文学:从艾略特到罗布-格里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②[法]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柳鸣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8-339页。

④姜智芹:《西方人视野中的余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三

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为先锋小说家提供了难得的阅读西方、认知世界的有利条件,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逐渐地接近并接受其理论观念,暗暗把“现代派”的大师当作模仿甚至超越的对象。像马原的《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余华的《两个问题》、吕新的《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书》以及格非的《十年一日》《卡夫卡的钟摆》等文章,谈到萨特、加缪、罗伯·格里耶、福克纳、博尔赫斯、萨洛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尤内斯库等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大师及其作品,无不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与此同时,伴随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小说文本一块被翻译介绍进来的,还有大量关于“叙事”的理论。可以说,西方叙事学与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更加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内容”,至于表达的方式则与其感知世界的理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反映出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在传统小说理论看来,故事内容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它是主导性的、决定性的,而外在表现形式是从属的、次要的,受内容的掌控和制约;虽然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此关系却并非平等、均衡的,而是服务与被服务、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理念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变得更为激进和极端,内容就是一切,形式完全沦为内容的附庸,其作用基本上无足轻重,只要能完成为内容服务、能承载规定的思想意识即大功告成。而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把形式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这对先锋小说家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叙事学的刺激,加上现代派经典大师作品的震撼,共同引发了先锋小说家对叙述本体论的认同,他们积极进行各种大胆、前卫的叙事实践,冲破了传统小说中“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三要素的樊笼,抛弃了僵化的语言形式与技巧。于是,从先锋小说家的叙事实验开始,中国的小说也首次开始从注重“写什么”向关注“怎么写”转变。

与传统的中国小说仅仅把“叙事”当作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的理念不同,先锋小说家把叙事提升到与小说意义内涵基本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通过大量的叙事实践形成了一套鲜明独特而又极具创新价值的范式标准。在先锋小说中,“叙”与“事”不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叙事不再仅仅作为小说文本的表征而存在,叙事就是小说文本存在本身,叙事摆布着人物,而不是人物主宰着叙事。先锋小说家在大量的文本实践中对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和探索。

对小说叙述视角的不断探索可谓先锋小说家进行形式创新时首先关注的方面。传统小说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述者像上帝一样掌控着故事的进展和小说人物的命运,而先锋小说却多采用限知的叙事视角,叙述者一般和笔下的人物知道得一样多,有时甚至还不如人物知道得多。借用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的术语,先锋小说是从传统的“神话型”叙事向“观念型”叙事的转变,叙述的功能只是“展现”,让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完成使命。不仅如此,先锋小说的叙事视角往往还不是单一的,而是不断交叉变换。这种由多重视角所形成的“未定性”,就使读者的本体地位得以彰显,他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小说意义的建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青黄》等无一不是如此。正如马原谈及自己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时所说:“生活并不是个逻辑过程。那么艺术为什么非得呈现出规矩的连续性呢?”^①因此,马原的小说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常常是一些故事的场景和片段,对于习惯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

^①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

的读者来说“马原式叙事圈套”显得陌生而新奇。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视点”的转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它实际上内含着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即通过小说叙事“视点”的不断探索,对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等进行质疑和反思,进而也有效更新读者对世界秩序的“观点”。

叙事视角的转换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叙事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叙事是情节的线性逻辑发展,“起因-经过-高潮-结局”层层推进、严密而理性。先锋小说则不满于这种过于僵化的模式,他们力求结构的新颖奇特和复杂多变。如格非的《戒指花》,完全打破线性逻辑,而将故事的各个部分拆卸后,按照作家“内定”的叙事逻辑和顺序重新对其拼合组装,以传达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体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则基本没有完整和连贯的情节,小说由几个松散的、看似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独立“故事”组成,而这一个个松散的“故事”本身也缺乏有机的、逻辑的联系,大多是对人物活动梗概、随意的生活片段、人物生存场景的随意拼贴。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则采用“循环”的情节结构模式,“疯子”每次杀人使用的手法大体相同,许亮总是“配合”般地出现在河边,总是时不时地会有人“变疯”……这些情节的循环出现无疑使“形式”的意味更加突出。《世事如烟》的叙事结构则更为自由,作家或顺叙或倒叙或插叙或平叙,不再有强硬的逻辑羁绊,2、3、4、6、7、司机、灰衣女子、司机母亲、算命先生等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没有明确的先后逻辑,线索错综复杂,甚至互为因果。总之,在先锋小说家笔下,我们很难看到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时间也不是按照自然的线性状态单向度推进的,而是可以来回穿梭,甚至更可能是断裂的或有头无尾、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东西,随着线性时间的被打乱、因果逻辑关系的被消解,情节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条件,“情节淡化”成为先锋小说共同而显著的特征。

叙述视角和结构的多变使得小说的叙事时空也变得多维化。按照美国学者蒲安迪的说法,叙事文的根本特征就是要传达时间之流中的人生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其实就是关乎“时间”的艺术。“时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何艺术化地处理叙事时间,几乎是从小说甫一诞生就开始探讨的课题。纵观小说叙事的发展历程,时间的“线性叙事”模式传统悠久、源远流长,其叙述节奏往往与自然时间相匹配,在叙事时注意故事的完整性、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往往将自然时间是否与社会历史时间相吻合看作评判优劣好坏的标准。这种叙事观反映了小说作者对稳定有序的外部世界的确信,也就是说,在这种叙事理念中,没有因社会历史时间的流动而构成的各种事件,小说家就往往会无所措手于怎样来描述时间;反之,倘若自然时间停滞不前,则故事情节以及叙事的节奏也都将变得不可能。而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则在小说中探索了崭新的“时间”形式,“为了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故事观念,率先抽取起逻辑贯穿作用的时间要素,搬用造型艺术原则,把小说这种主要是‘时间的艺术’变成‘空间的艺术’”^①,深受其影响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也由此开始重新审视时间的意义,他们逐渐认识到,小说家之所以是小说家,最根本的是他有凭借叙述时间来任意编排故事时间的过人本领,因此他们都有意淡化自然时间,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凸显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心理时间上,赋予“时间”以崭新的表现形式,表达对社会历史和生活世界的独特而新鲜的感受,从而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禁锢,实现写作的高度自由和想象力的恣意飞升。“时间”从此在先锋小说家手中开始变得摇曳多姿,它不再始终是线性、匀速的,而是根据作家主观情感的需要成为点状的、网状的、带状的,甚至无形无状;它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自由穿梭,就如同

①王化学:《20世纪先锋文学:从艾略特到罗布-格里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博尔赫斯所论述的那样,客观化的物理时间完全为主观化的心理时间所取代,从而也形成对传统意义模式的解构和颠覆。

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和《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对传统叙事所造成的冲击,无疑是颠覆性的。两部作品虽然都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明确的时间点,但是历史背景依然是模糊一片。明确时间点的频繁出现和时间的任意组合、随意穿插使得读者无法清晰复原时间的正常顺序,这也就使得故事情节显得错综复杂甚至支离破碎。在这两部作品中“陌生人”和刑罚专家的“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以及“我”和“他”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的重叠和复制,所以不会使背景和时间清晰,而只会使其更加错乱复杂。在余华看来,“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①,时间可以被自由拆分组合,形成不同的顺序,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余华把这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时间开始变得人为可控,本该快速流逝却可以度秒如年,本应漫漫长河却又几乎弹指一瞬。

总而言之,“时间”在先锋小说家笔下不再仅仅是装载故事和事件的容器,甚至也不再是借以进行哲学意蕴探索的媒介,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的方法论活动。在先锋小说文本中,叙事者不断地用闪回和闪进的方式,随意出入于过去或未来的叙述时间中,从而使创造叙事的广阔地带成为可能。

四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承认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②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小说潮也有着其特定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先锋小说家群体基本上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之后,是一群被拒绝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大潮之外的晚生代,与亲历过“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英雄“业绩”可以夸耀的“前辈”而言,他们注定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所以,他们无法当然也不愿再去讲述意识形态神话,他们所能够炫耀的资本毋宁说是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主义的熟稔。因此,借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他们顺理成章地拿起了“形式主义”的武器,以决绝而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以及文化规范发起挑战。

先锋小说家深知,“矫枉必须过正”,惟有对既定的艺术秩序发动毫不留情的革命,才能真正建构出迥异于以往的崭新艺术形式,才能改变公众传统而根深蒂固的感知方式和认知习惯。今天看来,虽然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和叙事革新存在着种种遗憾和不足,但其对中国小说观念的革新和推进意义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的。无论是马原的叙事圈套、格非的小说留白、孙甘露的语言形式改造还是余华的零度叙事,都让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小说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小说只是作者的审美创造。甚至可以说,先锋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再次唤醒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力,有力推动了汉语小说追赶世界的步伐,拓宽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审美空间。

①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②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当然,也许是过于峻急,也许是太过彰显“叛逆”的姿态,先锋小说极端的“形式”实验也确实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局限。这一点,几乎从先锋小说开始风行的那一刻起,便不断有论者论及。概括来说,先锋小说的偏失或限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其形式实验缺乏坚实的本土根基。如所周知,先锋小说是在对传统的决裂和对西方“他者”的崇拜中勃兴的,并非是从中国内部自然生长起来的,因而明显缺乏坚实的积淀过程和本土经验的给养。同时,对西方的过于倚重,又会造成思想理念和表现手法与中国现实的错位。这一点,同样具有某种先锋特征的小说家李锐看得最为清晰。他在论述 1980 年代的“先锋小说”为何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作家们在技巧演练的同时,在接受文化观念的冲击上表现出明显的盲目和被动,致使文体试验迅速走向技术化”,“文体的转换是和文学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同为一体的”。^①“技术”可以模仿和学习,但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观念却只能与本土的文化相伴共生。

其次,其形式实验呈现出“当代性失语”的症候。为决绝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成规,先锋小说家在矫枉过正的同时也把传统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无情摒弃了,从而局限于远离现实生活的自我世界、观念王国和形式迷宫里,其作品整体地呈现出一种“当代性失语”的症候。先锋小说家对抽象观念的阐发,并非扎根于坚实的现实土壤,而更多是通过想当然的形式演绎完成的。一旦形式实验后续乏力,观念阐释必然就成为无源之水。与此同时,先锋小说家在炫耀“怎么写”的技术法宝的同时,其放纵的个人想象和形式游戏往往会严重遮蔽现实内容与虚化历史。所以有论者曾不客气地指出,先锋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变迁缺乏回应能力,因此“最终只能用玩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肤浅”。^②

再者,其形式实验远离读者的审美阅读惯性。先锋小说纷纭多变的形式迷宫和叙事魔方,在挑战传统文学圭臬的同时,也挑战了读者一直以来形成的审美惯性。先锋小说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巨大障碍,其最终结果也因远离读者而被读者远离。

正因为如此,当文学进入 1990 年代,一些代表性的先锋作家也开始与时俱进地重回“现实”和故事,像余华、苏童、格非、吕新等作家的创作,在秉持先锋精神的同时,也越来越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些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似乎不约而同地以厚重之作来向读者及批评家证明,他们已经找到一种既包含先锋精神和先锋意识、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的叙事形式。这种叙事形式有别于之前纯粹的叙事实验之处,就在于“将传统和现代的因素真正融合在一起”^③。

①李锐:《文体沧桑》,《网络时代的方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81 页。

②罗岗等:《当代性·世界性·先锋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学术月刊》2009 年第 10 期。

③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 年第 2 期。

Concept evolution and stylistic innovation: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 of avant-garde novels

Dong Yan,Zheng Jiaj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vant-garde novels which appeared around 1985, with Ma Yuan, Yu Hua, Ge Fei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 group of writers, refer to those novels with revolutionary experiments on narrative forms. The creation trend, though experiencing only a few years of glory, gradually declined, but the tireless exploration of “narrative” essence of the novels, the extreme experiment on the novels’ language and the further tapping of the life experience have undoubtedly exerte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s. Th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avant-garde novels is an important reform i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ovels; the exploration of novels’ ontological essence and value functions has undoubtedly updated people’s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and especially, the experiment on the novel’s “narrative” and form innovation are, all the more, a strong impetus for Chinese novels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world and broaden the aesthetic space of the novels’ literary style.

Key words: avant-garde novel; concept of novels; value function; narrative

责任编辑:李宗刚

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李衍柱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来看,王阳明是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从王阳明论著的实际出发,吸取中外已有研究成果,重点探讨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和中国,将王阳明的思想主要概括为四方面内容:从《大学》古本的“再生”,进入圣学之门的教典;高扬人本主义旗帜,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知行合一;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世界哲学史的转向与创新;“阳明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方面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创建的心学体系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贡献、历史局限、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文艺复兴;世界和中国;《大学》古本;人本主义;知行合一;实践论哲学

中图分类号: B4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31-1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4

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名守仁,学者称阳明先生。1472年(明宪宗八年壬辰)9月30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书圣”王羲之是王阳明的33代先祖。^①明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即公元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享年57岁。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哲理诗人和美学家。世界著名的日本“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说:王阳明是一位“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②

王阳明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他生活的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③。王阳明是如何站在时代潮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建起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心学体系?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何种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相比较,他的思想体系的价值、影响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思考和探讨的重点。由于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涉及到诸多问题,个人谈的一些看法是否正确,还要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文艺复兴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文艺复兴时代是中世纪转入近代文明的过渡时期。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传播、发展、繁盛于西欧诸国,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时间跨度为14世纪初至17世纪初。“文

* 收稿日期:2017-07-06

作者简介: 李衍柱(1933-),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87页;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朱志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页。

②[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钱明审校,杨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③[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7页。

文艺复兴”是一场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①这些时代的巨人,“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②。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与明朝中后期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航海业的发展、商业都市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已是世界的大国,“1400年—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增长到1亿5000万多”^③。在那个时代,儒教中国似乎代表了欧洲人自认缺失的许多良好的观念。在弗朗斯瓦·魁奈笔下,这个国度是“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国”^④。

王阳明一生跨越15世纪至16世纪,处于“文艺复兴”的繁盛高潮时期。此时,东西方都出现了一些文化巨人。在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1473—1573)创建“日心说”,给神学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5)发现“新大陆”;麦哲伦(1480—1521)完成绕地球一周的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文学领域出现拉伯雷(1495—1553)、莎士比亚(1564—1616)、塞万提斯(1547—1616);艺术领域出现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拉斐尔(1483—1520)、提香(1490—1576)等。在东方神州大地,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样出现了一些时代巨人。王阳明出生前60多年间,郑和于1405—1433年先后七次率庞大舰队远航亚非诸国,遍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及红海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达非洲东海岸肯尼亚和伊斯兰圣地麦加,在世界航海史、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前无古人的崭新篇章,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人类征服海洋的伟大创举。中国明史专家吴晗曾说:郑和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奥斯·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⑤。郑和下西洋充分显示出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在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明朝中后期,在中华文明史上几部影响深远的经典性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相继问世。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论著,在世界医学、乐学、农学等古代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领域,“最富有生气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⑥。吴承恩(约1500—约1582)创作的《西游记》,享誉世界、具有永久性艺术魅力,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生于同一时代而又死于同一年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创作的《牡丹亭》,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

《大学》古本的“再生”,进入圣学之门的教典

“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本义,是“再生”、“复活”之意,指希腊罗马古典文艺的再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7页。

③[美]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上卷,张世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④[美]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上卷,张世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⑤吴晗:《中国古代史讲座》下册,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年,第382页。

⑥[法]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秦传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文艺复兴”就是要让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再生、复活、发扬光大。在西方,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①。西方的文艺复兴深受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马可波罗(1254-1324)于1298-1307年间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最初名为《东方见闻录》)激发了哥伦布从西路航海到东方的壮志,从而发现了新大陆。中国的“四大发明”直接影响了西方的航海术、火药制造术、造纸印刷术的革命,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要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进而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恢复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文艺复兴萌动于宋、明之际,其主要标志是新儒学的复兴。

1482年,11岁的王阳明向塾师提出一个关乎人生道路的哲理问题:

尝问塾师曰:“何谓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②

读书学圣贤,成为圣贤,是王阳明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那么,什么是圣人之学?什么是成圣之路?圣人之学的起点在哪里?成圣之路的第一步从哪里迈出?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圣人之学面对的现实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对他所面对的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他说: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炽;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浹于人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③

王阳明痛惜和惊叹孔、孟死后,“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圣学之门“不复可睹”,成圣之道“遂以芜塞”;圣人之学,当权者“皆昏迷颠倒于其说”,加上佛老的瞽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风行于世,致使“功利之毒沦浹于人心髓,而习以成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6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88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43-44页。

也,几千矣”。如何使圣人之学“宣扬光复于世”,获得再生和发展,这是历史向王阳明一代学者提出的一个时代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圣人之学再生、光复于世的起点和第一步是恢复圣学所依据的经典文本的本来面貌。王阳明认为,圣学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是指“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①几千年来,随着“圣学晦而邪说横”,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在学术界普遍存在。“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②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儒家圣学的经典文本的整理、注释和研究很重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们又看到朱熹的主观与偏颇。他将《中庸》《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篇,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自有其贡献和价值,但是他自视甚高,肆意改变经文,将《大学》编章加字。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的过程中,“证诸《六经》、《四子》”,发现朱熹对圣学经典文本《大学》编章加字、改变经文的错误,以极大的学术勇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刻古本《大学》,先后写下《传习录》上答徐爱问、《答罗整庵少宰书》《大学问》《大学古本傍释》《大学古本原序》等,明确宣布:

《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又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人。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③

王阳明通过察证、研究孔门相传的《大学》古本,并与当时学界奉为经典文本的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中的《大学章句》仔细加以比较,发现《大学》孔门流传下来的古本并无章句之分,而朱熹则将《大学》分为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并认为第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自己杜撰填补上104字,作为《大学》的第五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④很明显,朱熹在这里将自己力倡的“格物穷理”的观点塞进《大学》的思想体系之中。王阳明断然否定朱熹“我注六经”的主观臆测,认为《大学》古本中“本无脱误”,理应恢复《大学》的原貌。王阳明特别反对朱熹将《大学》提出的“三纲领”之一的“亲民”改为“新民”,认为必须恢复《大学》古本中的“亲民”。对此王阳明专门向他的高徒徐爱作了解释。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89-190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第6-7页

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①

“亲民”是《大学》中提出和论说的“三纲领”、“八条目”的核心范畴。它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尧、舜、孔、孟治国理政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儒学政治哲学的灵魂，也是“阳明学”与“朱子学”根本分界的重要标志之一。王阳明反复阐明“政在亲民”，“亲民”与“明明德”是一回事，二者不可分离。“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亲民之极则也”^②。《大学》深刻阐明的“三纲领”、“八条目”，高度概括地总结了中华文明关于治国理政的经验，揭示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集中体现了新儒学的价值观。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在编辑王阳明《文录·大学问》时特意说明：“《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身治平之内。”^③学子们只要沿此“从入之路”践行，即可“直造圣域”。王阳明本人在龙场悟道之后，也是由此跨入了“圣人之学”的大门，走上了“成圣之路”，在弘扬中华文明传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了新儒学的复兴，创建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心学体系。

高扬人本主义旗帜 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

文艺复兴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人类跨出了中世纪黑暗的门槛，重新发现了人，冲破神学的枷锁，高扬人本主义的旗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宇宙的精华”。莎士比亚在他的名剧《哈姆雷特》中，通过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口，赞颂：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④

冈田武彦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⑤

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关学”的宗师张载（1020-1077）响亮地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⑥现展现于陕西省关中的横渠书院里的一块碑文，于右任书写的“横渠四句”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是碑文上书写的“横渠四句”，其含义是一致的，学界多以后者加以阐释和引用。张载的“四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3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12页。

④[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朱生豪译，吴兴华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⑤[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钱明审校，杨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⑥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句教”,体现了作者的宇宙观、历史观、本体论和价值观,可视为是新儒学复兴的宣言书。它以中国特色的语言,体现出“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时代精神。

王阳明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旗帜,在张载提出的命题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为天地立心”的理论,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心学体系。王阳明以更具体明确的言论说了人是天地之心: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①

为什么人能成为宇宙间天地万物之心?王阳明结合天地万物的声、色、味的变化,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有说服力地阐明人是天地之心的问题。他说:

吾人与万物混处于天地之中,为天地万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万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万物也?天地万物有声矣,而为之辨其声者谁欤?天地万物有色矣,而为之辨其色者谁欤?天地万物有味矣,而为之辨其味者谁欤?天地万物有变化矣,而神明其变化者谁欤?是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由吾心听,斯有声也;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视,斯有色也;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尝,斯有味也;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变化也;然则天地万物也,非吾心则弗灵矣。吾心之灵毁,则声、色、味、变化不得而见矣。声、色、味、变化不可见,则天地万物亦几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②

在王阳明心中没有神学家鼓吹的上帝主宰天地万物的“创世说”,只有人才是天地万物的真正主宰,只有人的心才能体察、辨明天地万物的声、色、味的千变万化。“为天地立心”的“心”,实质上就是主宰天地万物的“人”。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人在天地之间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

心既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又是具体个人自身肉体的主宰。《大学》中所说的身,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③在与黄一方的对话中,王阳明又称人的心“只是一个灵明”,进一步说明人的心在主宰宇宙万物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人所特有的主体性:“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④

天地万物的“心”是人,而人与天地万物又是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是王阳明提出的心学的哲学基础。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反复论说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答顾东桥书》中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⑤在《答聂文蔚》中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59-160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977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①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范畴良知，生发出了他对生民疾苦的人文关怀和“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的普遍人性。他所具有的判断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他的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都是源自“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宇宙观。王阳明晚年在与钱德洪的对话中，更具体生动地阐发了天地万物与人如何通过人的良知相通而融为一体的。他说：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②

圣人之学，心学也。良知是心之本体。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人有虚灵，方有良知。圣人之学的心和所谈的虚无，与道、佛所谈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自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相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③圣人之学吸取道、佛的精华，又超越道、佛。王阳明对佛、老十分熟悉，青少年时期还往深山求道访仙。他是入乎其内，超乎其外。悟道之后，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孝的问题上，他发现佛、道的不足和自私。在圣人之学中，孝为百事之先。孝也是区别儒学与佛、道的关键所在。佛、道把孝看作是假和空。佛、道出家求仙，追求的是一条弃绝人伦、放弃对亲人的恩爱和责任、舍弃对家国民生情怀的道路。因此，王阳明认为佛、道是“自私其身”，“专于为己”，“无意于天下国家”。1506年，他在一首批判佛道的神仙养生之道的《赠阳伯》诗中写道：“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④1527年过常山时写下的《长生》诗，全面抒发了他走上排斥、批判佛、道之路的心路历程：“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微驱一系念，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⑤王阳明以自己的感悟和体认扯下了佛、道的神学的光环，为天地立心，以主宰万物的人取代了佛、道宣扬的神，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性——良知和仁爱，取代了神性和兽性，这在当时社会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朱熹（1130—1200）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编纂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儒学经典文本。他建立起的庞大的“朱子学”思想体系，对新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不可否认，他所建立的“这幢大厦有点像一座监狱，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费尽艰辛才能从中逃出来。因为这一体系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该无视它的危险，而且，这些危险非常严重。它把所有思考封装在一个被尼采哲学的‘永恒回归’的远景所限定的机械进化论的封闭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2—83页。

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3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583页。

圈中,阻塞了任何唯心论的出口,借此,朱熹阻遏了中国思想的涌流,过早地结束了10、11、12世纪的伟大的哲学复兴。朱熹的学说,最终成了一种官方的信条,阻断了进一步思考的道路,把整个官僚阶层投进了实利主义和例行公事中,对13至20世纪之间中国哲学的僵化负有主要责任。”^①王阳明学习朱熹的著作,但又不迷信权威。他顶住来自官方和朱子学派的迫害和批判,解放思想,明确向社会宣布: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故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②

王阳明认为圣人不是“生而有知”的超人,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并无全知全能的天赋。孔子入太庙,还要“每事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也并非不犯错误,“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③“若尧舜之心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④王阳明关于“人人皆可成圣”的思想,充分说明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生存于世就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学术界对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是以唯物、唯心来划线、定性和定位,并断定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心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是一种进步趋向,而是一种倒退。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对王阳明心学的误读和误判。王阳明所说的“心”与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的“心”,一脉相承。如我们前面所论,其最基本的观点是“立人”,即:“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不仅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且也是“鬼神”的主宰。我们牢牢抓住“为天地立心”这个命题,才能拿到真正打开王阳明心学宝库的钥匙。

在明朝中后期,王阳明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相呼应,把人提到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的高度,力倡人人平等、“人人皆可成圣”,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冲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精神锁链,敢于对钦定的“朱子学”和佛、道的神学提出质疑和批判。“毋庸置疑,阳明学开启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之路”^⑤,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出了崭新的篇章。

知行合一: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 世界哲学史的转向与创新

知行合一论是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阳明学”中最具原创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主张。杜维明认为:这是王阳明在他的思想旅途中,“首次提出的划时代的哲学命题:知行合一。”^⑥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

①[法]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秦传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257-258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60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3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14页。

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⑤[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钱明审校,杨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⑥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朱志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3页。

界。”^①1509年(明正德四年己巳),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蓬勃发展,王阳明38岁在贵阳龙场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第一次提出的问题,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标志着世界哲学思想由二元论向一元论、由“唯理论”哲学向“实践论”哲学的过渡与转换。关于知行合一论提出的缘起、理论依据与主要观点,《传习录》和《年谱一》中都有概括的叙述。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知与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王阳明认为他所面对的有三种人,持三种态度:一种人是“冥行妄作”,“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一种人是“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而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种人,则认为“必先知而后能行”。这三种人不论是冥行妄作而不思或空思而不行,还是先知而后行,都是割裂知与行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钦定的“朱子学”力倡的“先知后行”论。王阳明尖锐地指出,这种在当时广为流行的哲学思潮,“俟知得真时方去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这种思潮有悖于圣人之学,无益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阳明贵阳龙场悟道之后,决心救治哲学机体中出现的这种“支离决裂之痛”,正式提出“知行合一”论,并以《大学》中说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经典佐证,说明自己承传和弘扬的正是圣学的优秀传统。^②

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知行合一论的丰富内涵及其主要特色,集中到一点,就是突出“论实践之功”^③,阐明“知行合一”的中心是“行”。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在日本被认为是“行动哲学”、“实践哲学”。“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④在论说知与行的关系时,王阳明通用的是“行”字。如说:“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⑤“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⑥在谈到人从事的活动时,则多用“实践”二字。如说:“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⑦王阳明自己明确宣布:“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⑧王阳明的爱徒在《年谱一》中,特加说明:“先生立教皆经实践”。^⑨钱穆将王阳明重“行”与重“实践”看作是一回事,说:

他那主张一元论倾向,和那折衷融会的精神,及其确切明显的宗旨,都可以代表阳明学的一般;而尤其是在他重“行”的一点上,不徒是他为学精神全部所关注,即其学说理论之全部组织上,也集中在这一面。所以阳明说:

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我们此刻也可以套他的话头说: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1页。

②参见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93-894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95页。

④[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钱明审校,杨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⑥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940页。

⑧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95页。

无有不行而可以知阳明之所谓良知,与其一切所说者。

所以朱子言格物穷理,未免偏重“知”上说,而阳明言格物穷理,则根本脱离不了一“行”字。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亦在实践中。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亦在实践中。不实践,空言说,则到底无是处。^①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而良知则是心之本体;行,即是实践。知与行合一,则将实践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知行合一”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地、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向前发展,贯穿在阳明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使阳明学成为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知行合一”论的提出,使王阳明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逻辑学的统一,为他正式走上成圣之路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王阳明提出和倡导“知行合一”学说的时间,正是中西方唯理论哲学大行其道、成为世界哲学思潮主流的时代。在中国,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宇宙区分为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形而上世界是超时空的潜存者,无形象可见;形而下世界是有时空的存在者。“故凡可能有之物,无论其是天然的或人为的,在形而上之理世界中,本已具有其理。故形而上之理世界,实已极完全之世界也。”^②朱熹认为在未有天地之先,已经先有此“理”。它是超时空的,先于、高于和主宰着现象界的一切;同时,它又是统帅人伦道德的“绝对命令”。在他的哲学思想里,有明显的“心理二分”与“知行二分”的二元论倾向。王阳明正是瞄准了朱熹的这一软肋,适应时代的发展,提出和大力倡导他的以实践为中心的“知行合一”论。在西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唯物主义和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是归纳法的创始人。他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极力反对中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诡辩的、迷信的神学哲学体系,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集中表达出工具理性的力量。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勒内·笛卡尔(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又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在社会急遽变革的时代,他从哲学方法论上摧毁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他的《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等著作,与培根的《新工具》《伟大的复兴》等著作相呼应,为唯理论哲学提出了新的原理和“游戏规则”。笛卡尔提出的著名口号是“我思故我在”。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③“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是笛卡尔哲学的一大特色。他与儒家经典文本所显示出的“即此即彼”和“既此又彼”的思路不同,“把身心、灵肉、心物、主客、精神/物质、凡俗/神圣等判定为对立、冲突、抗争和矛盾的范畴,从儒家心学的立场来观察,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而且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④。在二元对立思维盛行的时代,王阳明在被政治迫害、处于生命危机、十分险恶的生活环境中,龙场悟道,以思想家的理论勇气,创立心学体系,提出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由二元论向一元论、由唯理论哲学向实践论哲学转向的大门,为“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做出了理论贡献。

王阳明反对将身与心、灵与肉、心与物、心与理、知与行、道心与人心二分的二元论观点,以良知作为他心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良知是照亮他的心学体系的总光源;良知是天,是渊,与天理融

①钱穆:《阳明学述要》(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③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69页。

④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朱志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5页。

为一体,是宇宙的本体,心的本体;良知是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最高标准;致良知是人人皆可成圣、人人具有良知之心的根本途径;致良知的过程是一个知行合一、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知行合一架起了一座由天理良知通向至善的理想境界的桥梁,为成圣之路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知行合一的主体是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宇宙万物中间的人。人的身与心、灵与肉、心与理、知与行怎么能分为二呢。“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①文中说的“致”即是行,指的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和“诚意的功夫”贯穿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没有“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彻上彻下功夫”,就无法完整理解王阳明的“四句教”宗旨。王阳明谆谆告诫弟子们:“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②

圣人之学与知行合一是不可分的。学、问、思、辨、行,圣人之学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行,都要经历知行合一、循环往复的不断深化过程。“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之谓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③王阳明针对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将知行分为“两节事”,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的观点,辩证而又层层递进地论说了学、问、思、辨是如何与行之不可分离,知行合一是如何贯穿于“圣人之学”的全过程,学、问、思、辨、笃行之功与“致良知”是如何通向“至善”的理想境界。这一切,可以看作是王阳明对如何走上读书成圣之路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王阳明以哲学家的视角对“圣人之学”的特点、规律和途径的探索与回答。知行合一论的问世,赋予王阳明心学以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找到了一条“朱子学”想解决而未解决心与理、理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矛盾与统一问题。这是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在世界哲学史上,唯理论的思想家,不论是笛卡尔还是朱熹,都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心与理、理与情的关系的。在笛卡尔看来,“理”等于“天赋概念”,人的理性“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来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就是说,简单一句话,他就是上帝”^④。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洛(1636-1711)用诗体写成的《诗的艺术》,其哲学基础就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他要求作家艺术家:

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0-71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5页。

要爱理性,让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①

在布瓦洛看来,理与情二分,二者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他要求作家应牢牢树立理性本位的创作理念,并以此去判断艺术作品的成败得失。在中国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必在现象界的人与具体事物之先,“人得于理而后有其性,得于气而后有其形。性为天理,即所谓‘道心’也。因人之有气禀之形而起之情,其‘流至于滥’者,则皆人欲,即所谓‘人心’也。人欲亦称私欲。就其为因人之为具体的人而起之情之流而至于滥者而言,则谓之人欲;就其为因人之为个体而起之情之流而至于滥者而言,则为之私欲”^②。冯友兰先生指出“理之离心而独存”与“无心即无理”,是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的心学的根本不同之点,这也是二人关于“道心与人心”理解不同的主要理论依据。朱熹解决道心与人心二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格物穷理”去实现。王阳明对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理论和途径坚决予以批判和否定。

对“格物”理解的不同,是区分心与理为二还是心与理为一的关键。王阳明以生理学对人的身与心为一体的观点为依据,从而得出“合心与理而为一”的结论。他认为“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身与心本来就是一体的。在活生生的人群中,没有心的身与没有身的心的人是不存在的,除非他是一具已死的僵尸。无心则无理,心与理怎么能二分呢!王阳明曾生动地论说了人的“驱壳”与“真己”、耳目口鼻四肢的视听言动与情与理与生的关系。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为己之心”,“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驱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驱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③。

在唯理论哲学盛行的时代,王阳明在反对身与心、心与理二分的同时,充分肯定情和欲的存在。他的弟子钱德洪问他:“欲”是不是“人心合有的”?王阳明答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④“欲”是七情之一,是情感不可或缺的因子。在社会生活中,“欲”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它既可向善的方向发展,也会泛滥成灾、走向恶的深渊。王阳明特引出《老子》第12章中关于“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的教诲,谆谆告诫弟子们,应认真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要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分清和把握好善与恶的界限。“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⑤

钱穆指出:“我积年来,总是主张人类一切理论,其关涉人文社会者,其最后来源出发点在心。而我所指述之人心,则并不专限于理智一方面。我毋宁将取近代旧心理学之三分说,把情感、意志与理智同认为是人心中重要之部分。尽管有人主张,人心发展之最高阶层在理智,但人心之最先基础,则必建立在情感上。情感的重要性决不能抹杀。若人心无真情感,情感无真价

①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6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值,则理智与意志,均将无从运使,也将不见理智所发现与意志所达到之一切真价值所在。”^①钱穆关于“人心之最先基础,则必建立在情感上”的观点,我们从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的文字中,可以得到新的佐证。“性自命出”文中说:“胷(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衍(道)司(始)於青(情),青(情)生於胷(性)。司(始)者近青(情),终者近義。”^②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人的心与理的基础是情感。没有情感的生命,只会是一具僵尸或是庙堂上的泥菩萨。“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观的基石。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这是‘人道’,也就是‘天道’。……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③王阳明承继和弘扬了儒学以“仁”为核心的情感原则,进一步提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乐的本体”的理论,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新儒家追求的最高层次的“真乐”与“天乐”的至善、至美的“天地境界”。但王阳明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的心学体系始终贯穿着一个“行”字,“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对于如何达到“真乐”的天地境界,他在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的同时,强调“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诉合和畅,原无间隔”。因此,必须知行合一,不间断地“时习”和“致良知”,才能克服来自社会的种种可能引起“不乐”因素,以“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创立,“乐是心之本体”与“良知是乐之本体的提出,标志着理性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换,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正在涌动的浪漫主义思潮发出了绿色信号,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李泽厚所说:“尽管王阳明个人主观上是为‘破心中贼’以巩固封建秩序,但客观事实上,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走道。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例如表现在文艺领域内)的哲学基础。”^④

“阳明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529年,王阳明病逝。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颗明亮的星陨落了。斯人已逝,精神犹存。他用心血创建的哲学心学体系,却永存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他留下的理论遗产中那些属于未来的因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日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贡献,总是与他能否提出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提出或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对这些重大问题回答的深广度与创新性,则决定着他的学术地位。

王阳明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突出的首先需要明确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中心是神还是人?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在西方,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并主宰着宇宙万物;在中国明朝,虽然笃信天神存在的佛、道还有一定的影响,但禁锢思想界头脑的精神枷锁则是那个脱离了现象界的“天理”。这个“天理”相当于笛卡尔的理性,是天赋的,上天将它安放到人的心中。它将心与理、理与情、知与行二分,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深远的口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接过张载的“横渠四句”提出的时代哲学的重大命题,吸取中华文明传统的精华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创建出一个具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和范畴概念的心学体系,以当时学术发展可能达到的

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中: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第325-326页。

②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③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0-311页。

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1-252页。

高度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做出了承前启后的新贡献:他弘扬圣人之学的优秀传统,使《大学》古本“再生”,“宣扬光复于世”,赋予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亲民”以新的生命,摈弃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他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旗帜,以生理学、心理学的视角,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的理论,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突显人的价值和尊严,摈弃了上帝创世说和上帝主宰天地万物的观点,并与佛、道弃绝人伦、舍弃对家国民生情怀的“虚”与“无”划清界限;强调“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批判中西唯理论哲学家关于身与心、心与理、灵与肉二分对立的观点;他原创性地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他“讲知行是从本体上讲的,……阳明虽讲‘知行合一’,但因其针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所以事实上特重在‘行’字。始于‘行’,终于‘行’,而‘知’只是‘行’的一种过程”^①。他强调“行是知之成”的实践功能,并将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以“致良知”——“知行合一”,架起了从纯粹理性(天理)到实践理性(至善)的桥梁,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的统一;他富有独创性地提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是乐之本体”的理论,展现出新儒家追求的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真乐”与“天乐”的至善、至美的“天地境界”,标志着理性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换,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正在涌动的浪漫主义思潮,发出了绿色信号,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秦家懿先生说:“王阳明的思想伟大处,即是以二化一的‘辩证’法所树立的有机体性的哲学。这哲学内的每一概念,都与其他概念相通,但是又不并吞其他概念。”^②王阳明心学体系的这一特点,同时也暴露出他提出的范畴概念体系所潜存的二重性和矛盾性。“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其他概念“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以此为前提、为本源,由“良知”这一同心圆扩充生发直至“至善”的天地境界。这种一元的、辩证有机整体性的心学体系,对于克服二元论哲学将身与心、心与理、理与情、知与行二分的弊端,自有其理论的贡献。但若我们进一步追问,“良知”从何而来?它与“致”、“行”是何种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良知”概念的先验性与神秘性。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③“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④这里说得很明白,良知就是天理。它是先天的,支配着、制约着人的思维全过程。“王氏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注意到了主体的省思活动总是在双重意义上处于普遍之理(思维规律)的支配之下(循乎理则明,反之则扰),这种支配作用往往具有必然的、强制的性质:不管主体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的一切思维活动都永远不可能摆脱这种制约。但是,王阳明把作为正确思维之必要前提的必然之理(思维规律)归结为天赋良知中包含的心之条理,则是一种先验论的偏见。”^⑤良知的先验性,必然具有神秘性。“此‘致知’二字,真是千古圣贤之秘……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知则遂沦埋。”^⑥王阳明的初衷是不满朱熹的心与理二分、先知后行而提出良知概念作为自己心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由于其先验性、神秘性,虽然他一再辩证地说明知行合一不可分,但又不得不说“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到头

① 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9-10页。

② 秦家懿:《王阳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61页。

③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④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⑤ 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73页。

来他又不自觉地重新陷入朱熹的知行后行的怪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提出知行合一、强调实践的功能,这是王阳明在哲学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由于他对知(良知)的理解存有先验的神秘主义倾向,这就使他不可能科学地阐明知与行的丰富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自王阳明创立心学,提出“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概念体系 500 多年来,对“阳明学”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看法,不仅哲学界、学术界关注“阳明学”,而且一些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也十分重视“阳明学”,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论。“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阳明思想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和日本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孙中山(1866-1925)的行动学说、熊十力(1885-1968)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更不用说 1970 年震撼文学界的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的事件,都多少受了阳明思想方式的影响。”^②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称:“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③在《讲堂录》笔记中记载,当年毛泽东很重视“阳明格物,思筭生之理”^④的体悟,并说:“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底光明)”。^⑤王阳明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即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青年毛泽东的课堂笔记,显然是赞扬陆、王解放思想、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的心学传统。

写于 1937 年的《实践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辨析了中外哲人的不同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辩证地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实践论》的副标题即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⑥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批判地吸取了王阳明哲学中的合理成分,肯定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⑦毛泽东赞成王阳明关于人的认识是以五官感觉的直观体认为前提的观点,王阳明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⑧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⑨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存在着二重性和矛盾性,由于王阳明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性去观察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知对于行的依赖关系,未能揭示出知与行的科学内涵,结果必然错误地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于如何实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和实践及其特点、规律又是什么,王阳明没有解决,而这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⑩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5-136 页。

②杜维明:《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朱志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1 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年 6 月-1920 年 11 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02 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年 6 月-1920 年 11 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26 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年 6 月-1920 年 11 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35 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2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96 页。

⑧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 1 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年,第 32 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7-288 页。

⑩《列宁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3 页。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不限于生产实践,还包括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文学艺术等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一切领域的活动。王阳明所谈的“行”(实践),主要是道德活动,而又大于道德伦理范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时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为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为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成其德。”^②

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理论的来源、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检验、丰富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阳明说“行是知之成”,这话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含有“行”(实践)是检验“知”是否正确、是否达到和完成了“知”所预设的计划的意思;但说“知是行之始”,则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③中西唯理论哲学家,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能动的相互转换的辩证法,因此,虽然他们各有某种片面的真理性,“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掌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⑤的知行统一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⑥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当今的世界已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的信息时代。具有5000余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进入21世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需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更要重视承继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找回它的“根”和“魂”。500多年前在文艺复兴时代,王阳明创建的心学哲学体系中那些属于未来的因子,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行合一论,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它的生机与活力。

第一,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他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⑧王阳明关于天地万物与人一体的思想,对我们观察世界经济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气,万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283页。

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⑦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解放军报》2014年9月25日。

⑧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脉在树。用途管理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①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地球的生态美,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现实问题。习近平同志这段关于地球家园的山水林田湖与人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说,承继和超越了包括了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生态观,科学地总结了中外生态保护的历史经验教训,辩证地揭示了山水林田湖与人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并且提出了整体性系统的治理保护对策。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术性和实践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的新发展。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和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这一理论的提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观察当代世界风云的变幻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最现代化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是我们提出和制定内政、外交的治国方略与政策、处理国际间的矛盾和危机的最强大的理论武器。

第二,在文艺复兴时代,王阳明使《大学》古本的复活与再生,突显“亲民”的优秀传统,并对《大学》中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给予新的阐释,这对于我们继承中华文明政治哲学的精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王阳明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相呼应,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旗帜,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力倡“人人可以成圣”,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体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时代精神。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引出经王阳明校正恢复的《大学》古本开头的三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而“亲民”则是实现“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具体途径和集中体现。“亲民”,就是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就是“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③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④它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关系范畴和目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探索追求和理想信念,是对《大学》中所阐明的“三纲领”、“八条目”的价值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第三,王阳明提出和阐发的“知行合一”论,在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我们对于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论,不是囫囵吞枣、照抄照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予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内涵。我们所说的“知行合一”的“知”,剔除了王阳明那种先验的神秘主义的成分,是来自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它是在实践中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而获得的一种真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切记:“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③

2017年4月26日初稿

2017年7月25日修订

2017年11月6日校定

Wang Yangming: the Pioneer of Chinese Renaissance

Li Yanz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ang Yangming is the pioneer of Chinese Renaissance. Based on Wang Yangming's works and the studies on him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ituations of the world and China in the time of the Renaissance in four aspects: the “rebirth” of the ancient text of *Great Learning* and the canon for the start of the Confucius study; the promotion of humanism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ity and personal valu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di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philosophy; Wang Yangming studies and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so, the paper examine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historical limitation,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Wang Yangming's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mind” (Xin Xue) in the history of both Chinese and the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the Renaissance; the world and China; the ancient text of *Great Learning*; humanism;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ractic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季桂起

(德州学院 文学院,山东 德州,253023)

摘要: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班固在《汉书》中使用重要篇幅,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汉武帝的政治成见,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把武帝当作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这导致了《史记》对汉武帝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的缺失。

关键词: 董仲舒;贤良对策;司马迁;汉武帝;《史记》;史实回避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49-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5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对结束汉初实行的汉承秦制与以刑名、黄老之学治理国家的政策,转而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至于后人将其总结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班固在《汉书》中使用了重要篇幅,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对这样一件深刻影响到汉帝国治国方略及政策的历史大事,奇怪的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几乎只字未提,似乎这件事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一样。由于《史记》在中国历史著作中具有显赫地位,这就引起了后人对这一现象的很多猜测。如有人认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并没有对汉武帝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只是由于《汉书》的夸大,才显得重要起来。还有人认为,董仲舒当时在儒家各学者中的地位很普通,并无特别显著之处,所以司马迁只是把他纳入《儒林列传》,与申公、王臧、辕固生、韩生、孔安国、伏生、胡毋生等一并叙述。

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司马迁心中董仲舒到底有没有特殊地位?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对他在史实的选择与表述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贤良对策”一案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亲自执政,确实采纳了当时有儒学背景大臣的意见,曾下诏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收集并听取他们对朝廷治国理政的意见。而董仲舒也确实参与了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活动。这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记载。《汉书》在《武帝纪》与《董仲舒传》中都提到了董仲舒的参与。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下诏召贤良之士垂询,让他们针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上书对策。诏曰:“今朕获奉祖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

* 收稿日期:2017-10-30

作者简介:季桂起(1957—),男,河北南皮人,德州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②这次汉武帝下诏“举贤良之士”对策,应该是他预定的长期施政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之前的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也曾下诏令各级官员与诸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但那次丞相卫绾认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③,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而这一次所举的贤良之士,大多为儒学的饱学之士,满足了他的愿望,成为他改弦更张、以儒学治国的一次重要活动。董仲舒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因建言献策而崭露头角。

司马迁并没有回避这件事,但他的记载极为简略,对武帝垂询的过程及所了解的问题,对贤良文学之士的参与情况及对策内容,都没有详细叙述。只是在《儒林列传》中用极为概括的一段话一带而过,也没有特别提到董仲舒的突出表现:“及今上即位,越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④在这里,司马迁在说到“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之士”后,并没有按常规接着叙述汉武帝为什么要招集天下的贤良文学之士,汉武帝招来这些人是要干什么,这些人又都为汉武帝做了什么,而是用一句“自是之后”轻轻带过。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汉武帝招来这些天下的“贤良文学之士”只是为了让他们传承已经濒危的儒家学说,而没有更为直接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诉求。这是颇为值得玩味的。作为一个朝廷史官,又是一个对朝廷大事不可能不了解的人,司马迁对汉武帝“举贤良对策”的目的、内容应是知悉的,即便当时他没有直接参与,但事后对宫廷档案的了解也足以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然而《史记》的记述却如此简单草率,这似乎不太符合正常的记史逻辑。这说明司马迁从本心上对汉武帝的这一举措有故意回避之嫌,在《史记》撰写时并没有把这一活动作为一件非着重强调不可的历史大事来记载,也并不认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的活动中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这件事真的不是一件大事,董仲舒真的没有突出表现,还是司马迁对此有他个人的特殊想法?

从司马迁与董仲舒的个人关系看,两人之间并无思想对立相悖之处,亦无是非恩怨或私人芥蒂,且相互之间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曾这样评价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⑤司马迁自述他还曾向董仲舒求教,以了解《春秋》之道,这就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提到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①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5页。

②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890页。

③班固:《汉书·武帝纪》,《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1页。

④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71页。

⑤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77页。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①对董仲舒给他的辅导,司马迁也给予了正面回应:“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②可见司马迁对董仲舒辅导的体会之深。有人据此还将他们定义为一种“师生关系”。尤其在《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对公孙弘、主父偃因嫉贤妒能而陷害董仲舒的行径,给予了贬责,表示了对董仲舒的同情。这些都说明,司马迁对董仲舒素有尊重之情,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董仲舒的人品、学问、声誉,其记载与评价都是正面的,但唯独没有明言他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可见,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问题。

当然,也有人说,因司马迁对公羊春秋学的历史观点不甚赞同,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灾异之说持怀疑与批判态度,故对其上武帝之策不予记载,这似乎也说不通。司马迁在《自序》中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③这样的说法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所阐发的公羊学观点并无二致,有的几乎就是董仲舒书中之原话的变相引用。^④另外,司马迁在《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中对那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神秘幽闻及荒诞不经之事也没有拒绝,而是同样给予了一定的记载,有些地方还表现出了津津乐道的笔墨。《高祖本纪》则记载了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⑤这样的天人感应现象,并没有认为其为荒诞、杜撰之虚言。况且,基于司马迁对汉武帝政治才能与治国成效的否定性认识,他如引用董仲舒的“灾异之说”,在批判汉武帝弊政上还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表述视角。对司马迁来说,这应该是不会轻易错过的机会。

至于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史记》不予记载,但作为历史事实,应是不容怀疑的。其理由如下:一是班固著《汉书》不会凭空杜撰。《汉书》作于东汉,这期间虽然经过了两汉之间的政权交替,但东汉仍然奉西汉为正朔,对西汉王朝保持了应有的继承与尊重。这不像其他异姓王朝的皇权更替,后朝修史往往有所篡改、伪饰。东汉距西汉时间不长,官方档案文件应有相当程度的保存,班固修《汉书》肯定参考了这些档案文件。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⑥应该不是妄言。二是两汉在武帝之后的官方政策受董仲舒影响很大。西汉昭帝朝专论经济问题的“盐铁”会议所形成的官方文件《盐铁论》,其代表贤良文学一方的意见主要阐述的便是董仲舒对策中的观点,在辩论中他们有时还直接引用董仲舒的原话作为支持己方主张的权威依据。此后,

①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1页。

②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2页。

③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2页。

④参见《春秋繁露》中的《楚庄王第一》《玉杯第二》等篇。

⑤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页。

⑥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17页。

刘向著《说苑》,多方面引用董仲舒对策及其著作中的思想,对董仲舒有很高的评价。刘向之子刘歆则称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①。东汉官方的白虎观会议所形成的制度化文件《白虎通义》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董仲舒对策中的思想,尤其是用“三纲六纪”专门表述了董氏“三纲五常”的观点。自汉代之后,历代学者也都基本认可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影响汉帝国政治政策的重要事件。

由此可见,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既非两人之间的个人问题,亦非这件事情本不存在或不重要,而是另有原因。我认为,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恩怨以及他对汉武帝政治形象的个人评价。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触怒武帝,因而受到腐刑的惩处,这对司马迁可谓人生的奇耻大辱。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大发怨言,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圜墙,乃喟然而叹:‘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②虽然此一耻辱刺激了司马迁专注于《史记》撰述,写出了一部彪炳千古的伟大历史著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的个人情绪,这些情绪进入到《史记》的撰述过程,对他的记史选择和历史判断产生了特定影响,尤其是对汉武帝本人的政治评价。比较《史记》和《汉书》对汉武帝的记载,其内容与评价相距之大可谓令人惊奇。一个是专注于追求长生不老,迷恋于神仙方士之术,不断以封禅祈求上天护佑,治国理政上无所作为的昏君;一个是具有雄才大略,能够选拔重用贤才能吏,治国理政屡有建树,在汉帝国的崛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为君主。尽管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部分也写到了武帝一朝的政治业绩,但他对此都做了基于个人选择的独特处理。他把这些业绩的帐分别记到了那些大臣、将军身上,而丝毫不正面给予汉武帝本人。连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重用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这样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也避而不谈,可见他对汉武帝的个人成见之深。有人曾称赞司马迁这样做,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风骨,但我认为,从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公共责任而言,这也有失客观、公允。当然,对汉武帝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不是不可以批判,但批判的前提是不能有意回避他的这些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活动,而应该是在正面表述这些活动的基础上,运用个人的历史眼光从正反两方面辨析其高下优劣、成败得失。在这一点上,《汉书》对司马迁有关武帝记述的纠正,是有特定史学价值的。

从《汉书》所载汉武帝向贤良文学之士垂询的问题看,武帝应该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和敏慧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武帝所垂询的问题集中于四点:第一,怎样才能保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以及刘姓皇室之皇权地位的不断传续,这需要奉行什么样的主导思想,并以此来制定什么样的政治政策;第二,对于汉代之前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在治国理政时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才能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其中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第三,汉代之前诸朝代逐渐衰微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从它们的失误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治国理政的弊端;第四,在治国理政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获得较好的行政效果,如何做到保持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转,使得国家强大、民生安稳。如果司马迁像班固一样来如实记载汉武帝的这些垂询,那么出现在《史记》中的武帝就会是另外一种形象,这显然是司马迁在恩怨情感与历史认知上所不愿看到的。

再从董仲舒上汉武帝《贤良对策》的内容看,董仲舒的思想纯粹是处处在为成就一个伟大帝王出主意、献计策,属于政治上典型的“武帝帮”。第一,他推出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而刑为

①班固:《汉书》,《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20页。

②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83页。

辅的治理体系,纠正秦帝国酷法暴政的弊端,解决汉初以来奉行刑名、黄老之学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现象、中央政权政令难以统一的问题;第二,他提出以“正”为本,“君权天授”,主张综名核实,定皇权为一尊,巩固汉帝国皇权统治的合法性;第三,他主张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应以统一思想为基础,提出以儒学为思想之宗,对民众实施教化,以聚合民心,达到思想与政治的一体化治理;第四,他重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倡导设立国家管理的学校,为政权培养合适的支持者与从业者,同时制定通过选贤任能,有效推举官吏、使用官吏及考核官吏的制度,强化帝国的行政运转;第五,他提出适时“更化”的观点,认为虽然以行仁义、尊德性为根本的治国理政之大道不可变动,但具体的政治政策、典章制度还应该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进行改革,以达到“善治”的目的;第六,他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提出“大一统”的思想,主张以皇权专制为核心,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董仲舒的这些建议,表现了他对文、景之后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他从公羊学的思想出发对如何巩固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使民众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入思考。至于上策之后,董仲舒并未得到汉武帝重用,只是被授予了一个小小的江都相,原因应该是汉武帝对其上策中过度提及以“天人感应”与“灾异之说”限制皇权有关。

曾经有人以董仲舒未能得到汉武帝重用为由,认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没有那么重要,因而司马迁没有予以详细记载。在我来看,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恰恰是因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十分重要,汉武帝才只是采纳了其治国理政的方略,而没有重用董仲舒本人。应该说,这一点与汉武帝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汉武帝固然有雄才大略,但也是一个猜忌与防范之心很重的皇帝,这从他听信江充之言酿成“巫蛊之祸”与对待卫青的处置方式即可看出。以汉武帝之聪敏,不可能看不出董仲舒的才能,也不可能看不出董仲舒所上“贤良对策”中的深层含义。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一方面以“君权天授”为由,强调了皇权的合法性,对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用“天人感应”与“灾异之说”为皇权制造了一个理论的笼子,让皇权的运行时时受到董氏学说的制约。这意味着如重用董仲舒那就要全面接受他的这套理论,这对汉武帝来说从内心深处是不情愿的。“举贤良对策”后,汉武帝重用了公孙弘而没有重用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深知二人的差别。公孙弘与董仲舒皆是当时以治公羊春秋学而著名的儒生,但二人无论是在学问还是在为人上都有很大不同。在学问上,公孙弘远逊于董仲舒,其声望也远远不及董仲舒,故《史记》《汉书》皆用“嫉之”来表述他与董仲舒的关系;在为人上,《史记》《汉书》皆以“希世用事”“从谀”形容他的性格,而以“廉直”来评价董仲舒。汉武帝对这两个人的取舍显然与他对二人的了解有关。把董仲舒这样一个学问、声望很高,又以“廉直”性格著称的当世大儒重用在朝廷,无疑等于在身边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与其等到君臣之间因某些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而自己又很难处理,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如打发他到江都去做江都王之相,让他用自己的学问感化那位性格暴戾的哥哥。这对汉武帝与董仲舒都是一个两全的选择。对汉武帝而言,他是宁可容忍东方朔式的谏言,而不愿听从董仲舒式的谄语,当然他更喜欢的还是公孙弘式的顺从与阿谀。对此,《史记》中有一段话似乎可以让我们窥探到汉武帝当时“举贤良对策”后做出选择的一点真相:“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第一。”^①在最初的对策中,公孙弘位居下游,是汉武帝将其擢拔为第一。公孙弘对策的内容《汉书》略有记载,这些内容与董仲舒对策相比多是老生常谈,缺乏政

①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3页。

治上的真知灼见,只是契合了汉武帝的口味,大唱歌舞升平的赞歌,没有实际的政治改革的价值,其中所含有的儒家思想并无个人创见,否则他的对策不会让太常令不入法眼而拟定在下游。对公孙弘被汉武帝赏识的原因,司马迁是这样表述的:“上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①这句“缘饰以儒术”的评价可谓道出了公孙弘只是一个平庸官僚而非儒学大师的真实身份。在这里,司马迁依然没有提到董仲舒,但却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太常令最初拟定的对策位居第一位的是谁呢?从《史记》所留下的蛛丝马迹看,这个位居第一的人应该是董仲舒。董仲舒后来屡屡受到公孙弘、主父偃嫉妒并陷害,这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受到二人陷害时的董仲舒,在朝廷上并没有重要地位,如果不是“对策”的因素,他对公孙弘、主父偃构不成实质性的政治威胁。公孙弘、主父偃所怕的还是董仲舒“贤良对策”对汉武帝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事实证明,汉武帝在这次“举贤良对策”后对公孙弘的选择一点没有错:“(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辩之。”^②而这种圆滑的处事方式,就汉武帝私心而言自然是比较欣赏的,也是他认为以“廉直”著称的董仲舒所难以做到的。

然而,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包括汉武帝垂询的问题与董仲舒所提出的治国理政方略,在司马迁看来都应是为汉武帝脸上贴金之事,其与司马迁所要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格格不入。事实上,《汉书·孝帝纪》所载汉武帝的很多执政措施,董仲舒的对策起到了很大作用。如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要求各级官吏要“广教化,美风俗”,“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③。元朔五年夏六月,下诏要求“导民以礼,风之以乐”,“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举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④。元狩元年夏四月,赦天下,下诏曰:“嘉孝弟力田,衰老眊寡鰥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悯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⑤元狩六年六月,因整顿市场,纠正“币轻多奸,农伤而未众”,富者凌贫,豪强兼并的现象,下诏“改币以约之”,为贫困者下发救济,“遣博士大(褚大,董仲舒之弟子)等六人分行天下,存问鰥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⑥。这些措施可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互为对应,但在《史记》中均未见记载。司马迁选择性回避汉武帝这些政绩的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大概就是出于他对汉武帝政治品格与政治形象的个人看法。相反,对汉武帝因董仲舒著《灾异之记》而给予他的不公正待遇,司马迁却在《儒林列传》的有限篇幅中进行了大肆渲染,其中既有为董仲舒的不平之鸣,亦暗含着对汉武帝的微言讥刺。仔细品味,似乎还带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的味道:“(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讥刺。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⑦一代大儒,又是曾为汉武帝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竟落得这

①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53页。

②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53页。

③班固:《汉书·武帝纪》,《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9页。

④班固:《汉书·武帝纪》,《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2页。

⑤班固:《汉书·武帝纪》,《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4页。

⑥班固:《汉书·武帝纪》,《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8页。

⑦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77页。

种地步，岂不悲哉！在这里，司马迁运用其高超的文字功夫，旁敲侧击，从一个侧面影射了汉武帝喜用谗佞小人、薄情寡义的形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涉及有关董仲舒记载时的选择，受着他对汉武帝个人态度的明显影响。当然，司马迁在这里不经意间还透露了一丝信息，即汉武帝终在《灾异之记》事件中赦免了董仲舒的死罪，以汉武帝杀伐决断的性格，这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以“灾异”之言触动高庙失火这一皇家的顶级忌讳，如无特殊功劳，怎能逃脱一死？恐怕还是汉武帝感念董仲舒当年“贤良对策”的旧情以及赏识他的学问才能，对其网开一面吧。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回避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汉武帝的政治成见，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意把武帝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史记》是一部忍辱发奋之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①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得更露骨：“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未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②也就是说，尽管司马迁有史官之职，但《史记》并不是官方的史书，而是一部个人著述，其对历史的记述有意与官方正史拉开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不回避自己与当朝皇权的恩怨情仇。鲁迅曾称《史记》为“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③，不是没有道理的。《史记》从总体上虽说是理性的历史著作，但内里充溢着一种孤愤的感情激流，这与《离骚》颇为相像。这造就了《史记》很强的文学性，但在史学上也留下了些为后人质疑之处。鲁迅认为《史记》有“背《春秋》之义”凸现的便是它作为史学著作的缺陷。

《史记》的伟大之处不容置疑，但作为个人著述也确有作者一定的随意性。如《史记》列有《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记载了一些与国家政治生活关系不大的民间和宫廷的传闻逸事，这当然也不无意义，对了解西汉时期的民间和宫廷的细微社会生活有所补益，但毕竟与官修正史有很大区别。后者更强调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之关键大事的记载。《史记》对武帝一朝一些大事的有意回避，显然表现出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记史追求。像其记载董仲舒这样一位当世大儒，仅在《儒林列传》有很小的篇幅，不如作为宫廷弄臣的东方朔，甚至不如司马迁自己评价不高的公孙弘^④，这如从官修正史之记史要求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想，个中原因即在于《史记》如给予董仲舒一定的记史地位，必然要涉及其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而涉及“举贤良对策”这一影响武帝一朝的大事，则必然涉及对汉武帝政治才能与政治形象的历史评价，这对司马迁来说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也是他不情愿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在撰写这段历史时便有意采取了“史实回避”的方式，使“举贤良对策”事件成为了一个书写的空缺。因此，《史记》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也便保持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应该说，这是《史记》的一个缺失，也是历史的一个遗憾。如果没有受辱一事对司马迁造成的个人伤害，他能够作为一个普通史官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一事，相信其内容及细节一定会比《汉书》更为丰富，当然后人所看到的《史记》也会是另外一副面容。

①司马迁：《史记》，《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4页。

②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页。

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9页。

④《史记》之所以能给东方朔、公孙弘较大篇幅，恐怕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塑造汉武帝的负面形象。

Why Sima Qian sidestepped Dong Zhongshu's *Proposals by the Able and Virtuous* recorded in history

Ji Gui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Abstract: Dong Zhongshu submitting *Proposals by the Able and Virtuous* to Emperor Hanwu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political affairs in West Han Dynasty. So it affected the political ideas of Emperor Hanwu and political trend of the Han Empire. Ban Gu, in his *Book of Han*, recorded in great length and in detail the *Proposals by the Able and Virtuous* submitted by Dong Zhongshu. The historians in the later dynastie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event. However, Sima Qian did not mention it at all in *Shi Ji* written by himself.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main reason why Sima Qian sidestepped the *Proposals by the Able and Virtuous* by Dong Zhongshu in *Shi Ji* is that he had political prejudice against Emperor Hanwu and, personally, he was unwilling to depict Emperor Hanwu as a monarch capable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is resulted in the missing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time of Emperor Hanwu in *Shi Ji*.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Proposals by the Able and Virtuous*; Sima Qian; Emperor Hanwu; *Shi Ji*; sidestepping historical facts

责任编辑:孙昕光

汉代列侯爵溯源考^{*①}

秦铁柱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列侯爵作为汉代第二等贵族爵,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列侯对两汉王朝的影响无处不在。汉代列侯爵与周代的五等爵制有一定的历史联系,起源于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脱胎于秦二十等爵制,是楚封君制与秦彻侯制糅合的产物。在汉代,列侯爵制日趋完备,步入了鼎盛时期。魏晋以降,五等爵制兴起,列侯爵衰落,作为奖功酬劳的重要手段,逐步与五等爵制融合,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

关键词: 汉代;列侯爵;溯源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57-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6

列侯^②之列,功德之大,列显于世,至于享有高爵,“列者,言其功德列箸,乃飨爵也”^③。列侯之侯,有替天子守御四方之义,“《谥法》曰:执应八方曰侯。《孝经·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蕃也”^④。亦有问候侍奉天子之义,“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⑤。

“汉兴,设爵二等,曰王,曰侯。”^⑥列侯爵作为汉代的第二等高爵,在汉代统治阶层中占据极为显赫的地位,对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汉代列侯爵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周代的五等爵制,萌芽于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直接继承于秦二十等爵制中的彻侯爵。笔者在分析周五等爵制、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以秦、楚爵制为代表)、秦彻侯爵的基础上,力证汉列侯爵并非直接继承于秦制,而是秦楚爵制糅合之产物。

一、周代的五等爵制

汉列侯爵在本质、内容上都与西周分封制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柳春藩

* 收稿日期:2017-08-30

作者简介: 秦铁柱(1985—),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汉代封国‘诸子’与齐鲁文化研究”(15DLSJ04)的阶段性成果。

②“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9页。在汉代,“列侯”本称“彻侯”,因避武帝讳而改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列侯”共出现了201次,“通侯”共出现了25次,“彻侯”共出现了9次。为了与秦彻侯相区分,故本文将汉初之彻侯亦称为列侯。

③(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6页。

④(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16页。

⑤(东汉)董仲舒撰,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

⑥(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55页。

认为:“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赐爵制在本质上、内容上都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和采邑制不同,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这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封国食邑制是渊源于西周的裂土分封制和采邑制。”^①刘芮方认为:“周王室名存实亡,规范诸侯之间秩序的‘五等爵制’不复存在,但其中一些爵称,如‘侯’被吸收进各国新爵制之中。”^②

西周社会是一个等级极其森严的宗法社会,不仅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贵族内部亦有种种等级。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③。《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④各级诸侯拥有不同里数的封地。《春秋繁露》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⑤《汉书·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⑥

五等爵制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准则,在奴隶主内部分配权力与财富的一项制度,“授民授疆土”,同时规定各级诸侯对于周天子的义务,是西周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居于高位的封臣(‘诸侯’)全都是从古代统治者的子孙里拔举出来的”^⑦。至春秋时期,伴随着诸侯的强大与天子的势衰,实力成为财富与权力分配的重要标准,五等爵制遭到严重的破坏,丧失了它原有的政治功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交性的准则。《左传·桓公十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饷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⑧鲁国根据周五等爵制的班次向诸侯分发粮饷,郑国是伯爵,故虽战功卓著却被列于最后。郑国不满,遂联合齐、卫进攻鲁国。三国进攻,郑国虽为主力,因齐、卫为王爵,《春秋》将郑列于齐、卫之后。到了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封建官僚政治的初步建立,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五等爵制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以它作为母体孕育出的战国封君食邑赐爵制却成为了汉列侯爵的滥觞。

二、战国时代的封君食邑赐爵制

春秋战国时代,大国争霸,兼并小国,战争极为频繁。战国初期,各国推行变法改革,“社会制度由宗法封建君主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模式”^⑨。各国国君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削弱宗法贵族势力,推广郡县制,以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在这一背景下,封君食邑赐爵制作为一种军功刺激奖励机制产生于各国,上至贵族,下至奴隶、刑徒、庶人,只要立有军功,均被赐以爵位,继而获得官位、食邑、田宅。封君食邑赐爵制是在战国时期新的经济、政治、军事形势下建立起来的充满活力的封建等级制度。

各国封君食邑赐爵制中的爵名与爵秩不尽相同。赵国有君、侯、上卿、客卿、五大夫、公大夫、上大夫、国大夫、长大夫、大夫、五乘将军、公乘;齐国有君、侯、上卿、卿、客卿、上大夫;楚国有君、

①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②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③(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一《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页。

④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1—52页。

⑤(西汉)董仲舒著,苏舆、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爵国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4—235页。

⑥(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2页。

⑦[德]马克斯·韦伯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桓公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8页。

⑨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7—348页。

侯、执圭、上执圭、五大夫、上官大夫、大夫;秦国有君、侯、关内侯、公、上卿、客卿、显大夫、大夫及其他军功爵位(后文详叙)。君、侯爵为战国诸国之显爵,侯与君可以通用,封君亦侯,侯亦封君。“封君包括有‘君’和‘侯’称号的人。……如范雎封应地,号应侯,也称应君。封君的大量出现是在战国中期各国君主称王之后。”^①

此时,汉代列侯爵的雏形产生了,秦有三蜀侯,穰侯魏冉食陶、刚、寿三邑,文信侯吕不韦食河南洛阳十万户,长信侯嫪毐领山阳郡,家僮宾客数千。赵国有万户侯,“夫虞卿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斤,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万户侯。当是之时,天下争知之”^②。楚国有通侯、州侯,《战国策·楚》曰:“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③“州侯相楚,甚贵矣。”^④“庄辛谏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淫衍侈靡,而忘国政,郢其危矣。’”^⑤齐国亦有侯,齐封邹忌于下邳,号曰成侯。^⑥柳春藩认为:“据统计,终战国之世(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共封列侯封君九十五人,其中魏国十七人,赵国二十五人,韩国七人,齐国五人,楚国十四人,燕国五人,秦国二十二人。”^⑦

总的来说,在战国时代获得封君的标准主要有二:一则因功;一则因亲。这就产生了关东与关中两类封爵体系,关东以“亲”而封的体系;关中以“功”而封的体系。关东六国受周代宗法制影响深远,血缘宗法色彩浓厚,宗室势力较强,侯爵封君一般授予宗室贵族。苏秦“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⑧一语道破关东封爵的传统。通览《战国策》,在齐国,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安平君田单等封君均是田齐的宗室贵族。赵豹、平原君赵胜、马服君赵奢、春平侯、长安君等封君均为赵国宗室贵族。信陵君魏无忌、山阳君为魏国宗室贵族。至于楚国,贵族封君势力则更为强大,春申君黄歇、昭阳、昭奚恤、昭雎、昭鼠、景鲤、景舍、鄢陵君、寿陵君、夏侯均为宗室贵族。楚悼王任命吴起为相,主持变法,针对楚国宗室“封君太众”的局面,“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⑨,剪除了大量的封君,招致了宗室封君的怨恨,“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⑩。吴起的新法尽数被废,反映了楚国贵族封君势力的强大。“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⑪在楚国,“骨肉之亲”是成为封君显贵的最重要条件,浓厚的宗法血缘色彩是楚国爵制的一个本质特征,楚爵制成为关东封爵体系的典型代表。

秦在战国前期仍僻处西陲,与戎狄杂居,不与中原诸侯会盟,受周制影响较小,宗法血缘色彩较淡,功利色彩浓厚。尽管在昭王时期,出现了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等煊赫一时的宗法贵族,但总的来看,宗法贵族阶层始终未成气候,“秦国没有能够和东周时期普遍存在的强宗大族相提并论的异姓宗族。不要说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韩、赵、魏等一流大族,就像齐国的崔、庆、

①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②(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注:《风俗通义校注》卷七《穷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

③(西汉)刘向编订,明洁辑评:《战国策》卷五《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④(西汉)刘向编订,明洁辑评:《战国策》卷五《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⑤(西汉)刘向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第二《杂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1-243页。

⑥(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90页。

⑦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⑧(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45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吴起列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8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吴起列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8页。

⑪(西汉)刘向编订,明洁辑评:《战国策》卷五《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管、鲍等二、三流宗族,秦国也没有”^①。商鞅变法,创建军功爵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②,“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③。以军功获得爵位,凭爵位获得相应的田、宅、奴隶,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要以有无军功来决定,打破了“贵者恒为贵,富者恒为富”的格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④凡是没有立过军功的旧贵族,不能得到封爵,甚至开除他们的贵族籍,进一步削弱了宗室的力量。显赫的军功与事功成为封侯的重要标准,魏冉虽是宣太后异父同母的长弟,但受封穰侯则是因为他为秦国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连司马迁都说:“穰侯,昭王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⑤

三、秦二十等爵制之彻侯爵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⑥

以上是史籍中有关秦二十等爵制的最为完整的记载。二十等爵制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至秦统一前后最终形成。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⑦,下令求贤,此时商鞅入秦,以“强国之术”得到孝公赏识,主持变法。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50年,推行过两次变法。建立军功爵制成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商君书·境内篇》载,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共有十八级,最高爵为大良造,一级公士之下还有小夫爵,另外还有正卿和客卿爵,缺少后期爵制中彻侯、关内侯等数个爵名。此后,该爵制逐渐发展成为二十等爵制。至于彻侯爵何时完善于秦军功爵之中,史家有不同的观点,董平均推测彻侯在商鞅变法以前就存在了,“商鞅、白起、王贲等,多从左庶长爵位授起,依次升迁,商鞅、白起由大良造而为封君,这说明,‘军爵’、‘公爵’之上,还应该有一个大的爵等,授予对秦王朝之强盛有特殊功劳之人”^⑧。杜正胜认为彻侯爵于商鞅变法时所创,“唯按军功授爵以定平民身份的二十等爵制,却出现于商鞅的创意”^⑨。守屋美都雄从“列侯”的内涵出发,认为在商鞅变法前就已经存在列侯爵,但此爵位须授予有杰出贡献之人,但此爵位并不属于诸侯范畴。伴随着国君称王,列侯爵就具有了诸侯之意义了。^⑩守屋美都雄依据司马迁“封鞅为列侯,号商君”^⑪的记载进而推测出秦国于变法之前就已经存在列侯爵,不过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军功爵制日趋轻滥,仅列侯能够拥有食邑。根

①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⑤(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30页。

⑥(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9页。

⑦(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

⑧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⑨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317-318页。

⑩[日本]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页。

据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①,五大夫以上便能食邑。孝公把商、於作为商鞅的封邑,未知当时商鞅所获之真正爵称,司马迁遂以汉列侯爵来比附商鞅所获之爵位,且“列侯”这一爵称始于武帝时期,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才改彻侯为列侯或通侯,故《史记》的记载明显有附会之嫌。

笔者认为周王室东迁后,虽然周天子权威坠地,无力维系分封秩序,诸侯力政,但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天子与诸侯还维持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故诸侯尚不能称王。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国君尚且称公,公与侯均为诸侯,故商鞅建立的军功爵制不可能设立侯爵,哪怕是“诸侯”意义上的侯爵,只有在秦公称王后,才可能设置侯爵。等爵制完善于二十等爵制之中。汉列侯爵即脱胎于秦二十等爵之彻侯爵。

至于秦彻侯有无食邑,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秦的彻侯爵有其特殊性,它只是一种虚爵,既无封地,又无封户。安作璋认为秦之彻侯在统一前后均存在食邑,“秦统一中国之后,对有食邑而无治民之权的列侯,皆‘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即封建国家将封邑内的赋税赏赐给封君”^②。董平均认为:“战国时期,秦不仅分封了一大批封君,而且允许封君享受食邑。统一之后,封君食邑与郡县制度并行不悖,并没有完全废除。”^③笔者以为秦彻侯有无食邑在统一前后是大有不同的,秦统一之前彻侯享有封邑,“(秦昭王)收穰侯之印使归陶”^④,魏冉归于食邑陶;文信侯吕不韦食河南洛阳十万户;长信侯嫪毐食山阳郡。秦统一后,彻侯则不立封邑,只能食“公赋税”了。在沙丘之谋中,赵高以“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⑤之语威胁李斯,足见秦统一之后,彻侯已无封邑,失势后,只能怀揣侯印归于乡里了。

四、汉列侯爵之形成——秦彻侯爵与楚封君制的糅合

“一级曰公士……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⑥“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⑦学界多依据《汉书》《后汉书》中的这两段材料认为,汉列侯爵完全承袭了秦二十等爵制中的彻侯爵。笔者以为汉列侯爵虽脱胎于秦二十等爵制,但并非完全承袭,而是秦彻侯爵与楚封君制糅合的产物。

战国时期楚国之封君,就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楚惠王时有鲁阳文君、庸夜君、阳城君、养君、析君、徐君;楚悼王时有都君、阳城君;楚宣王时有江君、彭城君、州侯、安陵君、郢阳君、庸夜君、鄂君子析;楚怀王时有鄂君启、应君;楚顷襄王时有襄成君、州侯、夏侯、寿陵君、鄢陵君、阳文君、阳陵君;楚考烈王时有春申君、中君、临武君、向君。“楚国封君,占战国时期七国封君已知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为各国之冠。”^⑧楚国的封君,大体上是在君号之前冠以封地名称,从而直观地展现其封地之所在。以封地为号,是楚国封君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汉列侯的名号方式如出一辙。

楚国封君直接统治所属的封邑。封君直接任免封邑内的官吏,官吏们只对封君负责。《吕

①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五《境内》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

②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758页。

③董平均:《出土秦律汉律所见封君食邑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2页。

⑤(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50页。

⑥(东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9-740页。

⑦范曄:《后汉书》卷一百一十八《百官志》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30页。

⑧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氏春秋·上德篇》载:“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①封君直接统领封邑内的臣民,对臣民拥有奖惩生杀的权力,《墨子·鲁问篇》载:“鲁阳文君将攻郢,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若何?’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②

楚国封君拥有经济特权。封君拥有“府”以经营各项经济活动,并掌管封君的各项收入与支出。封君除了征收封邑内的赋税,还进行远程贩运贸易。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揭示了楚国封君所享有的经济特权,展现了他雄厚的经济实力,“屯三舟为一舸,五十舸”,“车五十乘”^③,鄂君拥有配备50辆货车的陆路商队,配备150艘商船的水路商队,运输范围远及楚国四境。关卡税官“见其金节则毋征”^④,凭借政治特权而获得的免税特权使其获得了高额利润,从而累积起巨额的财富。封君还自营手工业,从一些楚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封君拥有自己的冶铸作坊,木、竹制作作坊,用以制作兵器、车辆、礼器、奢侈品及其他生活用品。封君在封地内又拥有自己的粮仓系统,春申君在吴造“两仓,……西仓名曰‘均输’,东仓周一里八步”^⑤。

楚国封君在封邑内征发大量的劳役,开渠、修路、垦荒、筑城、建屋。申浦、无锡湖为当年春申君征发民力所开,用以灌溉封邑内的良田。《七国考》卷二所引的《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⑥《越绝书》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泻)西野。”^⑦

楚国封君在封邑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白公胜为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后与伍子胥流亡于吴,楚惠王感念其父被冤杀,“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⑧。而后白公胜为报父仇,率领封邑之兵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并欲劫持惠王,最终叶公率领本邑兵马击败白公胜的军队。^⑨在曾侯乙墓葬中,出土了一支析君所造的戟,应为析君的赠赠之物,可见封君可以自制兵器。楚国封君的这些特点与汉初的列侯颇为相似。

而秦分封彻侯爵首重军功,分封的彻侯屈指可数,史有明载的仅15人。在秦国时期,彻侯虽有食邑,但是彻侯在封邑内的权力较小,对封邑的控制较弱,封邑统治权掌控在由秦王所委派的官吏手中,封君只是获得封邑的赋税收入。秦统一后,彻侯更无食邑,仅“以公赋税重赏赐之”^⑩而已。

汉初列侯拥有极大的权利外延,“自致吏,得赋敛”^⑪,掌握除侯国令长外的所有侯国官吏的

①(战国)吕不韦等编著,陆玖译注:《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00—701页。

②(战国)墨翟撰,方勇译注:《墨子·鲁问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9页。

③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

④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

⑤(东汉)袁康著,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第二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⑥(清)董说:《七国考》卷二《楚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页。

⑦(东汉)袁康著,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第二卷《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⑧(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2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82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⑪(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8页。

任免权。在封国内征收赋税、市租、“私奉养”,经营工商业。拥有侯国武装力量,拥有“擅征捕”的权力。这些特点与楚国封君极为相似。但是在精神内涵上,汉初列侯爵却吸纳了秦二十等爵制中的军功至上原则,摒弃了楚爵制中的宗法血缘色彩。可以说,汉初列侯爵是秦爵制与楚爵制糅和的结果。

汉列侯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振臂一呼,发动了大泽乡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帷幕。义军所到之处,农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迅速扩大。攻克陈县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即有张大楚国之意,以楚国继承人自居,实行楚制,如他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即是明证。对此,晋灼作了专门的解释:“(陈)涉始号楚,因楚有柱国之官,故以官蔡赐。”^①陈胜兵败被杀后,其将秦嘉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继续反秦。而后,项梁派兵击杀秦嘉、景驹,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领导反秦事业。项梁死后,其侄项羽成为反秦领袖,期间楚制成了唯一合法的国体制度,楚爵制亦成为唯一合法的军功爵制。项羽于钜鹿大败章邯,消灭秦军主力,而后又率兵进入关中,“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②。然后封王,宰割天下,“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印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印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③。项羽分封的18位国王多为旧贵族后裔及亲友故旧。这一点,韩信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项羽对于有功之人吝啬封爵,所封授的都是其宗族亲友故旧,“项王见人恭谨,言语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刻印刳,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又背义帝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④。项羽所遵奉的依然是宗法血缘色彩较浓的楚爵制。

“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⑤刘邦起义于家乡沛县,以陈胜部下自居。沛县又属于楚地,当然也要推行楚国旧制,所以刘邦攻占沛县后,称沛公而不称沛令。《汉书音义》:“旧楚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胜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⑥陈涉死后,楚将秦嘉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都留。刘邦之留见景驹而请兵,又一次确认了其与楚政权的归属关系。同年四月,楚将项梁杀景驹,驻军于薛。刘邦之薛见项梁,归属项梁,仍为楚臣。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刘邦从沛县起兵到楚汉战争,为了鼓舞士气,奖励军功,在每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4页。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页。

④(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64页。

⑤(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3页。

⑥(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1页。

次战斗结束后,都要颁授军功爵位,赐给他的部下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上间爵、五大夫、卿、执帛、侯等爵位。从这一时期的爵名上看,刘邦遵循楚爵制无疑。王先谦《补注》引《汉书疏证》曰:“高祖初起,官爵皆从楚制。”在施行楚爵制过程中,刘邦看到楚爵制重血缘而轻军功,在战争中不能够很好地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无法使战争机器高效运转,所以他试图对楚爵制进行变革,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其实早在汉中就国之前,刘邦就已经开始变革楚爵制。他率兵攻入咸阳,灭亡秦王朝,虽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①,“余悉除去秦法”^②,但也深刻体会到秦二十等爵制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正是二十等爵制才使秦国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风卷残云般地统一六国,而且二十等爵制早已为关中民心所向。刘邦受封汉王之后,独立建国,成为与楚国并立的王国政权,终于可以不再受楚制的羁绊,遂参照秦二十等爵制分封了第一批列侯,成为汉中爵制改革的先声。“明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樊)哙为列侯,号临武侯。”^③“项羽至,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夏侯)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④“沛公立为汉王,赐(靳)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⑤“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⑥“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周)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⑦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汉王刘邦就国于汉中。刘邦在汉中厉兵秣马,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在此时成为汉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⑧刘邦命韩信重申军法,对楚爵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推广秦二十等爵制,彻底摒弃了楚爵制中的宗法血缘色彩。

伴随着二十等爵制的初步确立,全军将士士气极为高涨,为最终消灭项羽集团,统一天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项羽封人惟亲,将士多不用命,致使大量的人才流入了刘邦集团,如陈平、韩信、英布,上下离心,最终败亡。高起与王陵对此作出总结:“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⑨但在楚汉战争中,战火遍及各地,楚汉双方激烈争夺,所封列侯根本没有条件真正享有食邑,所封之食邑只不过是刘邦对诸将开出的空头支票。颜师古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此例多矣。”^⑩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消灭项羽。春正月,刘邦接受了诸侯王们的拥戴,于定陶即皇帝位,“刘邦政权,也由汉王国政权转化为汉王朝政权”^⑪。夏五月,“兵皆罢归家”^⑫,遣散军队,发布诏书,处理汉帝国建立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将国家由战时轨道转入和平发展轨道。高帝五年诏之全文如下: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樊哙列传》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5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灌婴列传》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65页。

⑤(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八《傅歙列传》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9页。

⑥(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15页。

⑦(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周勃传》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51页。

⑧(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

⑨(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6页。

⑩(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一《樊哙传》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69页。

⑪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4页。

⑫(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

(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①

最终从制度上废除了楚爵制,至此秦二十等爵制完全取代了楚爵制,成为官方的军功爵制。当然,还存在一些楚爵的遗留问题。

汉帝国建立后,战国时代所遗留的文化对立格局依然存在,关东关中文化尚未融合,地域文化之间依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刘邦为了避免重蹈秦二世灭亡的覆辙,更为有效地镇抚关东,稳固统治,在“承秦”的同时,尊重关东各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推行郡国并行制,将秦郡县制与楚分封制结合起来,“汉制杂用秦楚,和秦立郡县、楚复分封一样,也是当时形势使然”^②。当然,汉列侯爵制同样是秦楚糅和的结果。汉帝国建立后,战争期间所开的“空头支票”终于能够兑现了,此类功臣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沛县起义、入关灭秦、楚汉战争、剿灭异姓诸侯王,“其相从甘冒白刃、捨死忘生之徒,无非日夜望咫尺之封,自不能不悬殊爵以励功臣”^③。这些功臣全盘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皇权相对薄弱,若是照搬秦彻侯爵,则过于苛刻,不能满足功臣们对于富贵利禄的追求,反而会激化由于诛除异姓诸侯王所造成的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享有丰富特权内涵的楚封君制再一次引起了刘邦的重视,遂将此制纳入秦彻侯爵制中,功臣们可以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权力,拥有广阔的权力空间,满足了他们对于富贵利禄的追求,且诸功臣大多为关东人,这也充分考虑到了他们的关东文化背景。高祖刘邦将秦彻侯爵制与楚封君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皇帝任命侯国令长作为侯国的行政长官,又以汉法加以约束;同时,列侯在封国内又拥有广泛的权力,享有巨大的利益。这足见高祖刘邦为政之高明。

汉列侯爵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最终形成: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

①(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

②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③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年,第133页。

为侯,我属无患矣。”^①

高祖先封雍齿以安群臣之心,在这一年内共分封了66位列侯,而后又陆续分封了143位列侯,完成了由秦彻侯爵向汉列侯爵的转变。在刘邦去世前,为了获取功臣侯集团对于刘氏皇族的支持,加强皇权,巩固统治,遂举行“白马之盟”,“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②,“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③。使得功臣侯们的各项特权与政治地位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

总之,高祖刘邦通过汉列侯爵的创设,迅速消除了功臣侯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疑忌与恐惧,稳定了当时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但是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这些享有广泛特权的列侯们不自觉地成为了离心皇权的势力集团,而如何削弱、限制、打击列侯阶层的势力,则成为后来文帝、景帝、武帝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五、余论

汉列侯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西汉,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吴楚七国之乱为分水岭,列侯在封国内的治民权、置吏权、赋敛权、统兵权等各种权利逐步被剥夺,最后仅仅保留“衣食租税”而已。王莽篡汉后进行爵制改革,恢复五等爵制,废除列侯爵制。东汉承袭了西汉的列侯爵制,为了更好地明辨功勋等次、奖功赏能,列侯爵制被进一步规范化,由西汉的一等县侯变为东汉的县侯、乡侯、亭侯三等,仅县立侯国,乡亭则不立侯国,列侯的封授也趋于轻滥。

至汉末三国时,曹操为了解决相对稀少的民户、狭小的疆域与尽封功臣、激励军功之间的矛盾,增设名号侯等爵。“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④注引《魏书》曰:

“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⑤

魏晋之际,司马氏在功臣武将与名士大族的支持下掌权,在禄位名秩上奖功励劳成为司马氏所面临的当务之急。而此时相对简单的县、乡、亭侯爵是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于是,层次复杂的五等爵制便被司马氏采用,列侯爵与五等爵制并存,列侯的秩位下降。《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注引晋《百官表》:“县侯,汉官也。自县侯而下,通号列侯。金章紫绶,朝服,进贤三梁冠,官品第三。”^⑥《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典》十九记载,乡侯为第四品;亭侯为第五品;关内侯、名号侯为第六品;关外侯为第七品。^⑦五等爵制大盛于两晋南北朝,但是作为奖功酬劳的重要手段,作为分配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列侯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列侯中的县侯逐渐与五等爵制中的侯融合,乡侯、亭侯等则逐步消亡。列侯爵依附于五等爵制存在下来,一直延续到清代。施琅率大军于澎湖消灭郑军主力,攻克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3页。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7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7页。

④(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⑤(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⑥(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16页。

⑦(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典》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03-1004页。

台湾,功封靖海侯。曾国藩屡败屡战,最终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功封一等勇毅侯。左宗棠率军消灭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功封二等恪靖侯。甚至袁世凯称帝后依然以侯爵奖励功臣。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Marquis of Han Dynasty

Qin Tiezhu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250014)

Abstract:The marquis, the second title of nobility, occupie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Han Dynasty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both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s influence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Han society. Historically, the Marquis of Han Dynasty had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ve-rank marquis system of Zhou Dynasty, originating from the system of conferring princes and granting feudatory lan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merging from the twenty-rank marquis system of Qin Dynasty, and was the product of the system of conferring princes in State Chu and the marquis system in Qin Dynasty. In Han Dynasty, the marquis system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te and reached its height. After the dynasties of Wei and Jin, a new five-rank marquis system came into being. However,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award and reward, the marquis system gradu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new five-rank marquis system and continued till the end of th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Han Dynasty; the marquis; origin

责任编辑:时晓红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日本的应对*

中村宗悦著¹ 李光贞译²

(1.大东文化大学 经济学院,日本;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经济却停滞不前,原因何在?从全球化时代的视角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未制定出有效的经济政策,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而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则正是基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切实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做出很大贡献。就宏观经济管理而言,中国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雷曼兄弟金融危机发生时,能迅速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克服危机。作为中日两国今后重要的课题,在全球化形势下都应该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结构改革。

关键词: 中国;日本;全球化;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1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7)06-0068-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7

前言:何谓全球化时代?

2010 年,中国的 GDP 首超日本,2015 年达到日本的两倍(以美元换算)。17 年前,即 2000 年,日本经济规模还是中国经济规模的四倍,如今却被中国一举超越,这是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巨大停滞带来的结果。当然,如果换算为人均值,两国之间还有差距。中国经济的飞跃与日本经济的停滞是如何发生的?今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文拟以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视角对该问题展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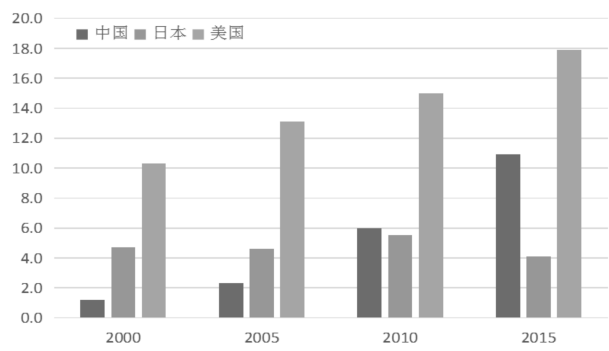


图 1 ab 均引自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一般来说,“全球化”一词指的不仅是跨越国界的各种商品及服务,还包括人力流动、资本流

* 收稿日期:2017-10-25
作者简介:中村宗悦(1961—),男,日本大阪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李光贞(1962—),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动在内的全球一体化现象。从历史上来看,可以举出很多国际化的例子,例如蒙古帝国曾起到将欧亚大陆东西地域联系在一起推动全球化的作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范围则不限于阿拉伯半岛,而是扩大到西至伊比利亚半岛、东至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其势力范围也几乎扩张至世界的每个角落,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全球化。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将这种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下,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商品化”的现象,称为“恶魔的推磨”,将这样的社会称作“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①。对此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在英国工厂中制造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中国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②③}。

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常强大,但由于其自身暴露出的问题而屡次陷入崩溃的危机,也即是常说的“萧条”。萧条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重,1929年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可谓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之所以分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两个阵营,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脆弱性造成的。即,选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本的脆弱性;而在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积极参与控制市场的“改良资本主义”则较为普遍。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控制市场运行的公有化、国有化生产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变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失灵”的同时,也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死灰复燃。1989年欧洲的“天鹅绒革命”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的历史事件,给许多人留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胜利的深刻印象^④,世界也再次卷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全球化漩涡中。但问题是,人类是否有可能真正地控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将对20世纪70年代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全球化的应对历史进行追溯,之所以将追溯的时间范围划定得如此宽泛,是因为本文拟结合当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西方经济体系(IMF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历史来进行分析;其次,对苏联解体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应对进行论述;最后,对2000年后中日两国全球化应对做一个比较分析。

一、高速增长期以来的日本经济走势^⑤

曾被称为“奇迹”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发展到1968年,日本GDP在西方国家中达到第二位。然而,这种快速增长在进入70年代后开始放缓。造成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大都市圈和太平洋沿岸工业区内取得的红利被人为地分配到地方城市,然而,对地方的投资却未见经济效益。长期以来,执政的自由民主党采取很多措施来促进投资地方城市以获得利润,田中角荣任首相期间甚至将促进政策上升到国家层面,以“日本列岛改造论”(1972年6月)^⑥的形式推出,并迅速加以实施。该政策被称为是给投资地方城市公共工程的投资者带来利润的返还型政治,各方对田中的列岛改造充满期待,认为各地地价会升高,所以纷纷

①[匈牙利]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新译)大转换——市场社会的形成与崩溃》,[日本]野口健彦、栖原学译,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9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译,大月文库,1952年,第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43页。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新装版)》上·下,东京:三笠书房,2005年。

⑤以下第1章的论述,参照中村宗悦《日本经济的历程——从开国·开港到安倍经济学》。见渡部茂、中村宗悦:《教材 日本经济》(第1版),冈山:学文社,2016年。

⑥[日本]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东京:日刊工业新闻社,1972年。

在地方城市购买土地,结果使得土地价格暴涨,这是由于在高速增长长期内没有看到资源分配的扭曲造成的。^①

1971年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声明(尼克松·冲击)结束了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的美元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日本也从此前相对便宜的1美元=360日元,转变为固定的308日元汇率后,于1973年2月转向浮动汇率体系。一般来说,日元升值会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起到物价回落的作用,但在当时,日本央行为防止日元走强而采取宽松政策,反而引起物价上升。

1973年秋天,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原油价格上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东的石油资源被以美英为中心的大石油资本垄断,因此石油价格相对稳定。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宗教对立,围绕资源的利益冲突再三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之际OAPEC对支持以色列的诸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当时的日本,受到石油危机的严重影响,出于对石油进口停滞所产生的危机感,人们开始对各种大宗商品进行防御性购买,由此引发1974年日本“物价暴涨”。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就支持中东产油国,石油进口不会停滞,此次“物价暴涨”,可以理解为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使得短期内物价迅速上涨。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没有调整宏观政策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实例。

经济高速增长为何会结束?其根本原因是失去了支持高速增长的因素。首先,大量廉价劳动力丧失,这是肯定的。因为从农村、山村、渔村到城市打工的人数有限,如果不限外国劳动力的供应,经济增长还有可能继续,但日本一直采取限制外国劳动力的政策。这样,国内的制造工厂最终为了谋求国外廉价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而到海外发展,而国内的产业结构将不得不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专门产业结构。而转向高附加值产业结构,花费时间长,也会与现有的行业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日本,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证券等服务行业以及采用通讯技术的新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不强,为此,必须真正地放松管制。否则,产业结构转型将难以进行。

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后,伴随着技术革新的投资也钝化了。特别是追求规模经济的大型产业中,日本过剩的供给成为增长的绊脚石,在其后新兴国家的追赶中败下阵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汽车等机械产业、微电子(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电子工程技术;ME)等成为主导领域产业,尤其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汽车、录像机、照相机等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也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此外,作为ME技术基础的半导体领域出口也成效明显,包括NEC在内的许多大公司开始进入到半导体产业领域,并建立起新型的材料工业。然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却领先一步,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IBM等大型制造商已经将计算机生产全面铺开,在硅谷诞生了英特尔(1968年)、微软(1975年)、苹果(1976年)等公司。虽然ME行业定位于现有晶体管技术的延伸,但计算机产业的核心却是软件控制技术。IBM基本上是一个制造公司,英特尔则是一个称之为计算机心脏的CPU开发的垄断公司,他们在使计算机成为大众化电子消费品方面,成效显著。这样到70年代,一方面,日本产业技术在当时的制造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而另一方面,在创新领域却被大幅拉开距离。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虽然因为原油价格突然上升而饱受滞胀之苦,但那时日本的经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1979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和第二年开始的两伊战争,造成第二次石油危机,全球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而日本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积累

①[日本]原田泰:《1970年体制的终焉》,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8年。

的经验活学活用,在减少能源使用等节约政策下,将损失降到最低,加之 ME 产品及汽车的强劲出口,给日本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1979 年出版的傅高义(EZRA F. VOGEL)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中认为,日本良好的经济得益于日本式经营的成功,或者说应该称之为公私一体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政策的功劳。^① 傅高义的分析,诚然有不妥和极端的地方,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有效地在石油危机中全身而退、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是事实。

那时,因进口日本产品而致使国内产业受到冲击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日本间的贸易摩擦开始成为一个大问题。美日贸易摩擦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纤维摩擦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到 80 年代,在汽车、半导体、农产品(大米、牛肉、橘子)等产业领域的贸易摩擦剧烈增长。当时的美国,正苦恼于国际贸易收入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赤字”,在加强对日本贸易施加压力的同时,改变美元对日元升值现状的声音高涨。而在日本,随着国内财政收支平衡的恶化,不得不增加赤字债券的发行以应对形势;同时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臃肿的财政问题,对以前高速增长时期的高福利(社会保障)政策进行调整,等等。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小政府”改革呼声很高,美国提出“里根经济政策”、英国来自保守党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新自由经济政策”,而 1982 年就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则举起“战后政治总清算”的大旗,开始财政改革。

中曾根内阁的改革路线,主要是根据第四届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在 1983 年第 2 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上的具体政策提议归纳而成,内容包括诸如“不增税财政重建”、“三部门(国家铁路、垄断公司、NTT 公司)民营化”等改革计划。其中“不增税财政重建”计划非常成功,使得从 1975 年开始每年持续发行的赤字国债,到 1989 年降为零,且一直保持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 1993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里根政府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以遏制高通胀,利率达到两位数,世界上的热钱涌入美国,导致美元升值,出口减少,进口扩大。不可否认的是,如上所提到的日美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就这样成为反映美国贸易失衡的替罪羊。此外,因为抑制通胀的高利率政策压制了民间投资,导致税收减少,财政赤字累积。在通货膨胀平息之后,货币政策放松,经济复苏贸易赤字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1985 年 9 月 22 日,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召开国际经济合作会议(G5),旨在纠正美元汇率过高问题,最后在各国协调干预日元升值、马克升值=美元贬值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这个“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速升值,1 美元的价值大约一年间从 230 日元降到 150 日元,美元的迅速贬值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因为未必能消除美国的“孪生赤字”,故 1987 年的 G7 会议,是在卢布协定的指导下进行协调干预。然而,在同年的 10 月 19 日,美国纽约市场的股票价格暴跌,同时全球股市暴跌(“黑色星期一”)。

在这样的股票价格走势背景下,大家推测美国因经常性收入赤字的扩大以及广场协议后低利率推行的美联储(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利率可能会走高,金融工程的发展使得高度使用数学的金融商品销售增加,这会进一步成为螺旋性交易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接手保罗·沃尔克继任美联储新任主席的格林斯潘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准备好提供流动性供应,并成功地阻止了股价下跌。

日本经济因“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曾出现过短暂的被称为“日元升值萧条”的经济衰退期,但从 1986 年底开始,进口价格下跌而企业业绩好转,直至 1991 年经济形势一直保持良好势

^①傅高义:《日本第一:给美国的启示》,[日本]广中和歌子、木本显子译,东京:阪急文化交流会,1979 年。

头(战后第二个长期扩张局面)。这一时期经济增速的特点,是因为金融宽松而资产价格如土地、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升高,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是和消费、投资相结合的。土地和股票的升值带来进一步的预期,也催生出以后称之为“泡沫”的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资产价格上涨。

为了解决日本和美国间的经济摩擦,1985年,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前川春雄组长),提出题为“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建议报告(通称“前川报告”)。该报告成为日本日后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路线的起点。一方面,为了促进汽车行业的出口自主限制,日本的主力汽车制造商被迫将其制造基地迁往美国国内。另一方面,与迅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关系得到加强,日本在全球经济中,也通过产品、服务、资本进出口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各国加强合作,影响力增加。与中国的关系,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不断加强。在中国对外开放最早开始的沿海地区,不断出现日本企业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

1987年,中曾根内阁在实施“销售税”失败后,继任的竹下登首相首开日本历史上附加值消费税(税率3%)之先河,同时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悬而未决的牛肉、橘子等问题,根据日美间的协议,达成进口自由化的一致意见。但是,竹下内阁因为利库路特贿赂事件不得不辞职。

1989年,海部俊树政权开始执政时,日本经济仍处于泡沫经济之中,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在蓬勃发展。特别是消费中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如豪华轿车、度假村、名牌产品的销售不断扩大,学生的就业也非常强劲,并形成“卖方市场”。然而,城市中土地价格的上涨开始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1989年就任日本银行行长的三重野康,连续提高官方贴现率,其结果是股价在1989年底的最高值(日经平均38915.87日元)的顶峰开始下跌,在海湾战争和原油高涨以及官方贴现率进一步上调后,1990年10月1日,一时跌至2万日元,暴跌至九个月当中一半的价格水平。为了抑制地价的上涨,财政部在1990年3月推出“抑制与土地有关的贷款”(总量管制)机制,地价暴跌开始,所谓的泡沫经济崩溃。

何谓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指过量的资金以投机目的流入股票和土地,引起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股票、土地价格的上涨(因此可以说,泡沫破灭是由急剧收紧金融、监管土地交易等引起)。是什么原因使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错觉:股票和土地的价格会一直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与美国经济比肩抗衡的苏联经济崩溃。苏联的改革、东欧的民主化革命,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大实验已经告终;而在中国,自1992年在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也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变化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特别是资产价格的下跌,产生了不良债权问题,银行的贷款功能和各公司的财务状况严重受损,企业投资停滞,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002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1%以下水平。

经济停滞,政治也会偏离。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单独执政的自民党政权以1993年宫泽内阁总辞职而宣告终结。从1993年到1996年,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相继建立非自民党为第一党的联合内阁。1995年1月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3月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战后日本的“安全神话”开始瓦解。

1996年村山内阁总辞职后,在随后的自民党、社民党和先驱党的联合政府中当选为总理的桥本龙太郎,率领自民党在同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再次单独执掌政权的桥本内阁正式走马上任。桥本首相提出进行6大改革(行政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改革)。1997年4月,消费税从3%提高到5%,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山一证券、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相继破产,经济大幅下滑,桥本内阁于1998年被迫辞职。桥本政权

下的经济失败,使得该年度 GDP 与上一年度相比负 2%,在 503 兆日元中约减少 10 兆日元;GDP 平均物价指数下跌至负 0.5%,导致通缩持续衰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宽松政策仍然停留在零星小规模水平。总之,日本央行出于对泡沫经济可能死灰复燃的担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

1998 年 7 月,执政的小渊惠三首相实施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翌日,日本央行(速水优行长)将汇率下调至 0.15%,开始实施货币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之后,以美国 IT 行业的繁荣为契机,日本经济也景气起来,但 2001 年 IT 泡沫破灭,9·11 恐怖袭击又加剧衰退。小渊惠三首相因病去世后,森喜朗内阁开始执政,但仅一年很快就结束。

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举着“没有被豁免的结构改革”大旗当选总理。当时,他虽然多次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从国有到民营”的口号,但事实上他在首相任期内,在“邮政民营化”以及与道路有关的 4 个公团民营化、政策金融机构重组、独立行政法人重组和民营化、派遣劳动者法案修正等方面,实施放松管制政策,起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为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同时 2002 年 10 月他还任命竹中平藏兼任金融担当大臣,通过“金融振兴方案”对不良债券问题实施最终解决。2003 年,为了图谋金融系统稳定,小泉政府向即将破产的里索那银行注入公共资金,使之成功地从通货紧缩的衰退中摆脱出来。然而,2007 年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导致经济衰退。2008 年,当雷曼兄弟破产时,日本经济再次迅速陷入萧条。

2009 年,民主党高举“政权更迭”的大旗赢得选举胜利。之后到 2012 年底野田内阁下台,民主党执政时间约 3 年 3 个月。民主党执政下的日本,从经济萧条中摆脱出来也并非易事。当然,2011 年 3 月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均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桥本政权时代修正的日本银行法下扩大了独立性的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在雷曼兄弟危机后,各国中央银行急于扩大其货币储备,而日本中央银行则对金融宽松政策采取谨慎的立场,也没有下决心做出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

2012 年 12 月,民主党在众议院换届选举中遭遇惨败,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诞生,形势随之发生变化。首先,安倍晋三首相基于振兴经济就要摆脱通货紧缩的重要认识,实施了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对日本央行行长、副行长实行人事改革。2013 年 3 月,推出了以黑田东彦为行长的日本银行新体制。2013 年 4 月 4 日,新体制下的日本央行在政策决定会议上,明确表示在 2 年内将通货膨胀率提高 2%,资金供给规模提高到 2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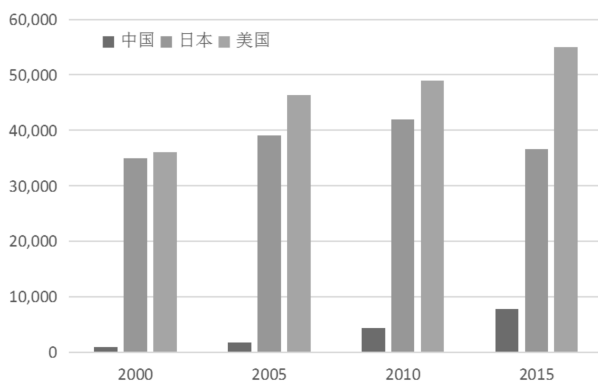


图 2 主要国家基础货币余额趋势(2000~2011 年)

(引自:山本幸三《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报告》2012 年)

二、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全球化的应对

1978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路线的节点,1992年这一路线进一步得到推动和明确。另外,如前所述,曾发生过苏联解体事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以下论述的是1992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应对。

1992年,邓小平在广东省经济特区发表“加速改革与开放”的“南巡讲话”。在此精神下,各省纷纷表示加快改革开放。同年6月,“党中央四号文件”下达,表示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意欲对中国投资的外资反应积极;10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决定,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决定是和计划经济诀别的宣言,在理论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起,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崛起是相互作用的关系。”^①

1992年之后,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在地方实施生产责任制和生产承包制。这是一个以生产为导向的改革政策,生产承包制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这一经济增长政策实际上极大地刺激了1992-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飞速增长。此外,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是资金,而且也能通过引进外国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日本在高速增长期所发生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高速增长期的中国:乱开发问题、金融机构泛滥以及由于银行强制融资政策,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通货膨胀等。虽然人们对增长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充满担心,但这种财政导向型改革在1993年11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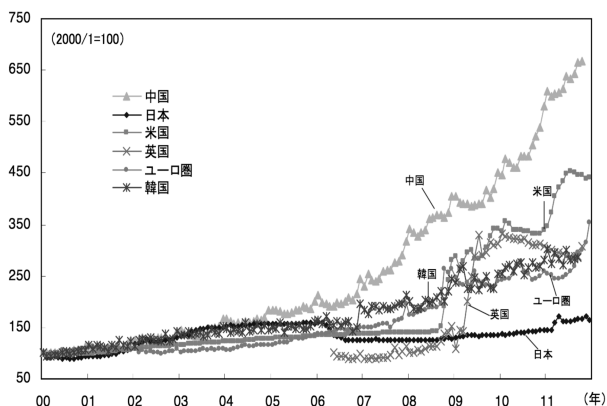


图3 名义GDP(1978-2000年:亿元)

(引自:日中经济协会《中国经济数据手册》2016年版)

这一时期,外交稳定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全球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在贸易和外资引进部分,与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当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贸易关系绑在一起考虑,是否给中国最优惠待遇悬而未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解决国内诸问题成为发展全球业务的关键。但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应美国国内商界的强烈要求,做出政策转变,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剥离。1996年,访问中国的布朗商务部长阐述说,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①[日本]高原明生、前田宏子:《系列中国近现代史⑤ 走向开放主义时代 1972-2014》,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第96-97页。

日本与美国一样,同中国有重要的关系。1990 年底,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1998 年 11 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日本,签署了“为和平与发展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日中联合声明”,在国际合作领域,就年度领导人互访、开设政府间热线、朝鲜半岛问题、多边贸易体制、东亚经济问题等达成系列协议。中国对与日本合作振兴亚洲、在东亚框架内与日本合作的加强充满期待。但在 2001 年,日本对来自中国的香菇、大葱和灯心草等采取紧急限制措施,中国则采取报复性关税令日本企业受到损失,由此产生贸易摩擦。

1997 年 2 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7 月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上陷入困境,业绩下滑;另一方面,围绕着财政是继续紧缩还是宽松的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与日本一样,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雷曼兄弟危机后的中国。这关乎中国这一大国如何应对全球化中经济出现的问题。对亚洲诸国的货币已经升值的人民币是否贬值,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如果人民币保持不动,则在金融危机下对经济衰退的东亚各国的出口减少,中国经济可能会因对东亚国家出口的下降而遭受重大损害。

然而,中国这时并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措施。其理由,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条:贸易顺差持续坚挺、短期资金引进慎重、对资本交易进行严格管理,即使人民币不贬值也降低了资金急速外流的可能性。当然人民币贬值是有风险的。如果人民币贬值,引进的外资会随着外国债务本金偿还风险的增加出现进口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贬值也未必会扩大出口,而且还会引起亚洲各国陷入货币竞相贬值的危险。最终结果是,1998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强劲,达到 7.8%。这件事情得到来自世界各方的高度评价,中国给人以“负责任的大国”印象,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因日元贬值遭到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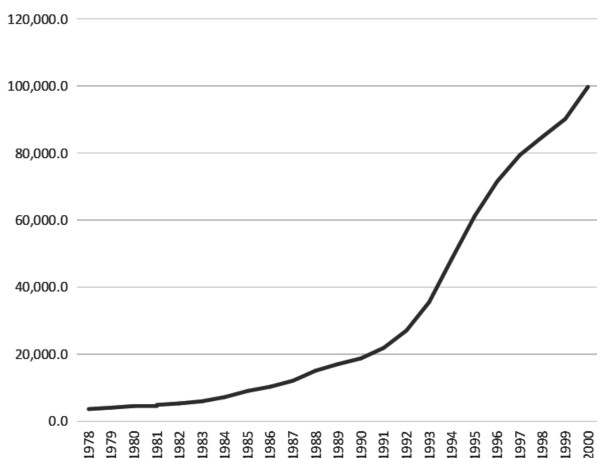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夕,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香港回归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意义当然重大,然而,在经济上,香港从 10 月开始受到对冲基金的投机性攻击。中国采取买入港元和高利率诱导政策,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从此例来看,中国政府必须要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保障”意识。

1998 年 3 月,朱镕基出任总理,中国开始政府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离。政府意欲控制与强化经济规律,此时,“党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矛盾在现代中国的扬弃”^①。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也采取了宏观刺激方案,越发积极地采取措施来扩大内需。

在 199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中国共产党对经济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法。2001 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讲话中谈到,欢迎私营企业主入党;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个决议极为重要。虽然在“改革开放”旗帜下,中国一直在追求经济增长,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道路颇为曲折。世纪之交,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做出很大转变,作为这种转变颇具代表性的事情是中国在 2001 年 12 月成功加入 WTO。中国政府从 GATT 时代就开始积极努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以此为契机,中国扩大贸易、引进外资,加速了经济增长。

2003 年,中国遭遇非典,同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 6.7%。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中国在钢铁、家电、电子信息设备等领域牢固树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表面化。2003 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①[日本]高原明生、前田宏子:《系列中国近现代史⑤走向开放主义时代 1972-2014》,东京:岩波书店,2014 年,第 132 页。



引自:图4 ab 同图3

中,特别凸现了五个问题亟待解决: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经济和社会、人类和生态、国内发展和对外出口等问题,强调了各方面的均衡发展,这一方针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平衡发展,即倡导实现“和谐社会”。2006年底,中国将发展模式从注重速度转向平衡,政策目标从“速度快且(效率)好”,转向“(效率)好且速度快”。

而在日本,2006年安倍晋三接替小泉纯一郎成为首相后,出访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谈,约定建立战略互惠关系。^①日本在2003年实际上已经制定政策,例如将里索那银行国有化等,经济因此而振作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实际上到2007年,不包括香港,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发生别的事情,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出现了(日本)对中国好感度自然上升的现象”。^②

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日本股市暴跌,通货紧缩再次严重化;在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要求国务院对金融紧缩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开始从紧缩财政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9.2%,成功地率先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当然,靠财政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不总是永远奏效,虽然中国从雷曼兄弟危机中恢复迅速,但不可能总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密集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来无限期地持续促进增长。为了可持续增长,应该不断提高生产率,而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与政治改革关系紧密结合的特点。保持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正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2008年,中国发生四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共同经历过地震灾难的中日两国在灾难面前合作日益深化,但另一方面,外交政策立场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也悬而未决。2012年,习近平开始担任国家领导人;第二届安倍晋三政府也于同年年底诞生。2017年10月,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政府进入第二个时期;日本的自民党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选,获得执政党胜利。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有舵手作用,在稳定内部事务、对外合作协调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①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发表“包括有关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包的日中共同声明”。

②[日本]高原明生、前田宏子:《系列中国近现代史⑤ 走向开放主义时代1972-2014》,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第160页。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日本

深受全球化时代货币变动影响的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重建中落后于世界,并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尽管是社会稳定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必不可少之要因,但不得不说,因为一直轻视通货紧缩,没有强硬的通货再膨胀政策,为此日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时机、错误的政策,以及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高速增长时期成功经验的束缚。提出“日本再生”口号的第二届安倍晋三政府已经诞生五年,这一期间,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再生计划,采取了诸如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增长战略等措施,截至到2017年,日本经济发展已超过战后最高水平,但这种经济发展并未在国民生活中体现出来,其结果是政府的稳定也受到损害。

在本文撰写之际,安倍晋三首相解散了众议院。他在继续保持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意欲将提高消费税后的增收部分用于充实全面社会保障的做法,在争取着国民的信任。然而,有人认为中途解散内阁进行选举本身就是失去大义,对此做法加以批评。这样,即便是在选举中获胜,也很难保证政局的稳定。政局不稳定,经济政策的信任也会丧失,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再次放缓。而日本经济的稳步发展,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稳步发展。这种发展即使是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发展模式所形成,也很难否认中国的高速增长对国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就宏观经济运行而言,如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雷曼兄弟危机中,中国反应迅速,快速实施刺激方案克服了危机。可以说,由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经济发展价值模型,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包含着诸多矛盾,但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果。

当然,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口号很有意义,但同时要说的是目前中国要实现“和谐社会”还任重道远。这并不单是中国的问题,在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差距,而这个差距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2016年,皮奎特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①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在该书中,他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差距在扩大,这与之之前增长论中所说的经济发展会缩小差距的理论截然相反,其实证性的结论与之前的理论背道而驰。到底哪一方说的是事实,今后应进一步展开研究。可以确定的是,皮奎特的观点令许多人有真实感,与很多人的感觉吻合。

在中国,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家会更加稳定。然而,即便在稳定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究其原因,是因为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进行大胆的改革,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两难的境地。最近,习近平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中国政府稳定,中日关系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也积极参与。我对这种构想下全球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充满期待,因为这不仅与中国和日本有关,而且与“世界梦”有关。

①[法]皮奎特:《21世纪的资本》,[日本]山形浩生、守冈樱、森本正史译,みすず書房,2014年。

Response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to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akamura Muneyoshi¹, Translator: Li Guangzhen²

(1. Faculty of Economics, Aito Bunka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How can the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stagnation of Japanese economy after the 1990s be explained?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is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the two countries respond to the ag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Japan delayed the rebuilding of its econom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ubble economy, falling into a deflationary recess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ha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90s. Even if the growth is based on autocratic policies, nonetheless, China's high growth has definitely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and stability of the people's lives. Regarding to the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t the times of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of 1997 and the Lehman stock crisis of 200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rapid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and thereby survived the crises. In the future, the policies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domestic structural reform,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globalization for both China and Japan,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Key words: China; Japan; globalization; deflationary recess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李宗刚

基于《时事新报》初期社论 看福泽谕吉的中国贸易观*

堀 和孝著¹ 孙守峰译²

(1.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日本;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在江户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把西方文明介绍到日本,是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的主要功绩。福泽谕吉并非从人生一开始就学习西洋学,也不认为明治维新后一边倒地学习西方正确。福泽谕吉虽然在他本人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的社论,但在同一报纸上他主张加强与亚洲交流与合作的社论也不少。从《论中国贸易之可能》《英语和中国语》等社论中,可以了解福泽谕吉关于加强与中国贸易的相关言论及主张。

关键词: 福泽谕吉;时事新报;中国贸易

中图分类号: F11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79-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8

前言

提起福泽谕吉(1835-1901)在日本历史上的功绩,估计一般的回答都是,他在江户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了日本。福泽在明治维新之前共计三次去美国和欧洲,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他发挥其高超的语言技能,把欧美的学问及思想介绍到日本来。1872年,《劝学篇》一书得以出版,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最畅销的一本书。书中开首,福泽就写下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①的句子,把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合到文章里,至今在日本都被广为传颂。

在《福泽谕吉自传》中,福泽回忆年少时,“长到十四五岁才上学,因此很感害羞。别人都在读《诗经》或《书经》,而我却刚开始读《孟子》”^②。从此也可以看出,福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西洋学,而且在明治维新后,也不认为一边倒地学习欧美就是好的。诚然,福泽在1885年3月16日他本人主编的《时事新报》中曾经发表过“脱亚论”(脱离亚洲)的社论;但是,另一方面,在《时事新报》里也不乏要加强和亚洲合作与交流的社论^③。本文依据1883年至1887年在《时事新报》中刊载与中国贸易相关的社论,探讨福泽主张加强与亚洲交流的观点。

本文所介绍的《时事新报》社论,出自青木功一著《福泽谕吉的亚洲》(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所收录的《〈时事新报〉论说的对中论调(一)(二)》(均由福泽谕吉协会发行的《福泽谕吉年鉴》第6号(1979年)和第7号(1980年)重新收录)。因此,本文既是对该书内容摘要所省

* 收稿日期:2017-10-15

作者简介:堀 和孝(1974—),男,日本东京人,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孙守峰(1975—),男,山东郯城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29页。《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②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12页。《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

③众所周知,福泽被其弟子竹越与三郎用“政治恋爱”来评价其和朝鲜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研究颇多,本文采用的是月脚达彦《福泽谕吉与朝鲜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

略部分的补充完善,同时也添加了和社论所处同年代的考察(《英语和中国语》收录)^①。另外,在《时事新报》中尚有大量匿名社论未被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全21卷(岩波书店,1958-1964年)收录^②,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社论不受《福泽谕吉全集》收录所限,只要是主张扩大对中国贸易、需要派日本人赴中国调查了解该国情况的内容,均会被本文采用^③。

—

《时事新报》刊载的社论中,最早记载主张日本人去中国的,应该是福泽谕吉所写《鼓励中国之行》(《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收录)。关于这篇社论,福泽这样写道:“仗交通世界变小,虽人少,仍有开疆拓土创文明之局面,此为世人皆知。然徒知之不足亦。唯有破局进取,用交通之便,才无愧文明之人。西洋人士既知交通之便利又能用之。”福泽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提出了今后日本人应该和邻国中国“促进往来,激励邦人留在本地,与当地人接触交往”的观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日本而言,“今后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政治上争先机定输赢,唇齿之关系的竞争对手”,除了中国别无其他。

但是很遗憾,当时去中国的日本人极为稀少。从“统计年鉴”上来看,1876年到1880年间,为去中国而申领护照者,男女合计共1550人,归国后上交护照者有926人。因此,1880年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数是624人,即用申领护照人数减去归国后上交护照人数,算上1876年以前滞留在中国的人数,加起来应该是700人左右(归国后不主动上交护照者比较多,所以实际留在中国的人数远没有那么多。关于此,福泽加了备注)。与此相比较,1880年在日本的外国人数为:中国人3739人、英国人933人。由于中国人本身基数比较大,如果这个人数算作“例外”的话,那么,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和留在日本的英国人相比较,“谁在关心参与国外之事、谁在利用交通之便”一目了然。

当然,福泽也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局不稳,带有风险。尽管如此,福泽还是大力推行鼓励措施,鼓励日本人去中国。在他看来,“我邦之有为青年”要么“忙于谈论政事”,要么“斤斤计较局部之利害”,如果他们能够打开视野去“天赋之富国”中国的话,“对内可以减少兄弟阋于墙的争论,上下朝野,均为自由而运动;对外,可以扩大市场密切邻国之关系”。

《鼓励中国之行》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后的翌年,即1884年4月21日,福泽谕吉再次以《扩大与中国之贸易甚为紧要》为题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其内容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之大国,地广人多,古今万国能与其媲美者甚少。尤其是我日本与其一衣带水,在蒸汽时代之今日往来交通甚为便利。于社会、政治、商业,日中两国关系愈加紧密是不争之事实。

那么,时下日本人是否在努力了解、认识关于中国的事情?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日本人对中国之事无视之态度过甚,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商业上,对现在的中华帝

①关于福泽的贸易论相关文献,有千种义人《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东京:同文馆出版,1993年)、藤原昭夫《福泽谕吉的日本经济论》(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1998年)等。

②《时事新报》的社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福泽独自执笔撰写全文;②福泽口述由社论记者整理,最后福泽修改;③记者独自起草,最后福泽校正(福泽谕吉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福泽谕吉事典》,东京:庆应义塾,2010年,第195页)。福泽生前所发表的《时事新报》社论和相关漫谈论题一栏均收自同一事典。

③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91~94页。

国试图了解认识从而为我国所用之心甚为淡薄”。从当年的“外国贸易表”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进出口总额每年达到6600万日元,其中出口中国为530万日元,从中国进口为630万日元,进出口合计为1160万日元,与中国的贸易占到日本国外贸易总额的近五分之一。但是,在中国从事贸易的日本商人状况是,“除去上海一港外,约400余州不见其影是不争之事实”。

当时日本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干鱿鱼、海带、鲍鱼、干海参、琼脂、干鱼等海产品。社论认为,应该将其贩卖渠道扩大到长江中游区域城市,以求改变现状。为何要选择长江流域,原因在于,“长江是当时通往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其两岸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这些地方被称为中国一等富庶之地,是贸易重心之所在”。社论认为,特别是“像汉口人口六十万之大都市,乃长江流域一流之中心市场,是最重要之地。日本海产品如能经销到此地,市场之扩大成果甚丰则是毋庸置疑”^①。

1885年6月22日和23日,福泽谕吉连续两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论中国贸易之可能》,主张采取措施扩大对中国海产品的出口(《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收录)。他在社论卷首说,“日本应以贸易立国。兴物产而促制造,扩大与欧美诸国之贸易为强国之本,此乃为我辈之所见”,“商业获利渠道甚为复杂,不能依赖单一区域,与西洋之远洋贸易固然重要,然与东洋之贸易亦不能忽视之,此乃利之所在”。除此以外,福泽还说道,“日本对中国之贸易,未来如能有扩大之势,必能使贸易大增,实乃国力增强之幸”。根据福泽的观点,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预测与中国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第一,“距离近往来便利自由”。一般来说,客户距离越远,越对对方不了解,越容易产生各种分歧和损失,“日中两国一衣带水”,与欧美贸易相比,与中国贸易“省时省力省钱,商业损失风险小”。原本日中贸易多是水产、铜和煤炭等,福泽在将来的可预测商品利润中也没有提及日本与欧美诸国间的主打贸易产品生丝和茶叶,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从距离近,往来便利自由这一点来看,和中国间的贸易毫无疑问有利可图”。

第二,“港口多市场广阔”。比如说,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在运到上海后,可以进一步分散到中国各地的市场。根据某项调查,鲍鱼会销往福建、浙江、直隶、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河南、山东、广东、云南等十一省,干鱿鱼销往广东、云南、江西、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十省,合计贸易额达到80万日元。这个金额与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530万日元相比不能说是小数目,但是如果被中国十省平均的话,一个省只有区区8万日元。不仅如此,中国一个省的平均人口要达到2千万人到3千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国家。“如此人口众多之国,来自日本的水产鲍鱼销量只有区区八万日元,以后绝无供大于求之忧”,福泽还表示,与中国的贸易“大有前途、大有余地、大有希望”。

第三,“货物非一时流行之品”。当时,日本出口到欧美的商品除了生丝和茶叶外,还有陶瓷和手工艺品等杂货。这些商品,不是“欧美人的必需品”,“作为时尚,只是供当时的绅士室内装饰点缀之用,物以稀为贵,把玩所需”。且这些商品“随着贩卖量之增加,商品稀缺性渐失,价格随之而降。当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扩大,商品数量增加之时,即是市场萎缩之时。日本商人艰难开辟之市场会再度缩小”。这都是当时不得不面临的“困难”。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扇子。当时在美国,日本的扇子是紧俏商品,美誉度极高,1880年出口额一度达到17万日元,当时的日本

①《时事新报》(第3卷)~(1),东京:龙溪书舍,1986年,第349页。

商人都看中这个市场。随着供给增加,扇子“不再流行”,加之法国也开始出现扇子的仿制品,日本的扇子出口额从1881年的10万日元到1882年的8万日元,再到1883年的4万日元,每年都急剧下降。与此相反,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海产品,它们是“日常消费之所在”,“若诚实交易,待五年乃至七年,随渠道之明确,日本出口之常用销售渠道可期也”。

第四,“货物生产容易”。“日本四面环海,所到之处均是河海港湾,水产之物比比皆是。日本固有饮食习惯,食物之十之八九为水产鱼类”,水产品的“生产加工之便利”实非难事。对于中国而言,“总体来讲是内陆国,尤其其内地远离海岸千里乃至两千里,水产之美味自出生起就无从品尝之民众”众多,因此,“唤起水产美味之欲望,让其卧床思念其味而不得入睡”,让这些民众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东洋日本之贸易,必定开创新局面,获取之利润古今不能比拟亦未必不可期也”。

基于以上理由,福泽主张应该加大力气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他还认为同中国的贸易不仅仅在于获得商业上的利益。也就是说,“日中间商业利益之关系,在今日国交之冷淡之际,和政治军事关系一样均能成为决定因素”,他期待,贸易会给因朝鲜问题而日渐冷却下来的日中关系带来转机。^①

在《论中国贸易之可能》刊载三个月之后,《时事新报》又刊登了以《英语和中国语》为题的社论。在社论开首,福泽这样说:“日本人富必致国力强。国权之伸缩,国力之强弱,唯在财富之多少。日本国欲在今之世界与西洋诸国平等交往,必先发展繁荣工商业,扩大产业发展开拓海外贸易。”为了繁荣海外贸易必先通国外语言,那么首先学习哪国语言,“毫无疑问是英语。”这是因为在海外贸易市场中,不仅“找不到不说英语的地方”,而且“现在日本国的开放港口中,即便仅有五处,如果不使用英语”就基本不可能做成业务。

那么,日本人除了需要学习英语外还要学习哪门语言?福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汉语。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现在日本与诸国之贸易,年约七千万日元,与中国之贸易约一千二百万日元,即占据日本贸易总额之六分之一。日本通商国有二十余,除去英吉利与美利坚两国,唯有中国最为重要”。不仅如此,“中国的年度国外贸易总额高达二亿乃至二亿五千万之多”,日本要把现在的贸易额提高三倍、五倍不是难事。但目前的情况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砂糖和棉花,却未见为此而赴中国去采购的日本商人,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也是“全权交给中国商人”,今后,“日本人欲赴中国内地开展贸易,必学中国语,而且要精通善说”。

当然,中国人中也不乏“英语熟练者”。但是,那仅限于“该国开放港口或在日人员”,“欲知内地情景,抑或贸易之需要,必与中国人交往,与中国人交流,循环往复于中国,无他”。福泽认为,学习汉语不仅是对中国贸易所需,与西洋开展贸易,汉语学习也是“不容忽视之急务”。为什么这么说?“日本国产引以为傲之产品,眼下唯有生丝、茶二品”,“此二品在中国对西洋贸易中数额巨大”,“中国具有可以左右国外市场之力量,此力量强于日本数倍,中国内地本年度茶叶生产情况如何,生丝收成如何”,所有这些都必须掌握了解。换言之,“中国不仅是日本之合作伙伴有依靠之谊,还是竞争对手必存畏惧之心”,因此,日本商人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必须学好汉语。^②

在《英语和中国语》发表在《时事新报》的前一年,即1883年,象征井上馨外务卿西化政策的

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305~310页。

②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424~427页。

鹿鸣馆在东京落成。在鹿鸣馆,接待过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邀请来的外国贵宾和上流社会人士,甚至为他们举办过社交舞会,在那种西化政策推行的时代背景下,福泽仍然提出有必要扩大对中国贸易,并学习该国语言的观点,实在令人惊叹。关于《英语和中国语》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测,福泽实际上是在影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不在于政府当局建造像鹿鸣馆那样的豪华场所,而在于民间从事商业的人群中蕴藏多少财富。

附带介绍一下,早在1880年1月,福泽在庆应义塾就开设了教授汉语的会话和时事文章的“中国语科”。成立之初聘请的中国人教师名为龚思录,还把庆应义塾毕业、当时在北京公使馆做翻译见习的金子弥平也聘请过来。最初学生有40名左右,龚思录和金子弥平两人约一年后辞职,后由张泚肪和鉦鹿赫太郎继任。但是,张泚肪半年后也回国,出生于浙江省的郭宗仪继任。龚思录和张泚肪教的是北京官话,而郭宗仪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学生发音方面出现混乱,1881年该专业被迫关闭。虽然短暂,但是“中国语科”是庆应义塾早期所设置的专业,通过这件事也能看出福泽很早就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了。^①

二

1886年10月13日和14日,以《中国贸易》为题的社论连续两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在社论开首,记载了以下之事:近来,大阪商人为了日中间进出口贸易,组织成立了“东亚贸易商会”,该商会在天津开了分店。德国的克虏伯商会和英国的“某商会”互相竞争互相牵制,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开平(今唐山市)到天津间铺设铁路的订单,铺设铁路所需枕木由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来供货。社论认为获得这样扩大商机的机会“值得可喜可贺”,同时又提出勿忘之前数次“在南中国的贸易中每次失败的案例”。

为什么之前日本人在和中国人的贸易中没有大获成功?该社论认为主要原因是,“在从事贸易的商人中没有合适人选”。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日本人在和中国人做贸易时还是采取和欧美人做贸易一样的方式,依靠“书生气人物”,他们熟练掌握“英语”,知道“万国形势”。他们到上海或香港后,直接学习当地的英国商人做法,“做大门面,装修豪华,尽享美食,注重交际,所谓儒商绅士气十足”。但是,反观中国人,“不在意粗茶淡饭衣着简朴”,更擅长“卖之时耐心周旋买之时巧砍价格”。能和中国人“抗衡”的要算德国人了,英国人也要被中国人“压制”,日本人很像英国人。社论又说:“今后在和中国人做贸易时,不要选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书生气人物,必须选用能节俭、能忍耐粗衣淡饭,不在意豪华门面外表,深谙世事、具有生意经的人。”

在谈到选用“合适人才”从事中国贸易时,该社论在关于“商业上的安排”方面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慎重考虑出口“商品”和“销售区域”的“比例”。这一点在前面《论中国贸易之可能》一文中已有说明。当时的日本商人,缺乏“团结一致高瞻远瞩共同牟利之习惯”,“在海外贸易中一旦有利可图就都去争抢出口”,从而导致价格战,“出现粗制滥造之品,致声誉尽失最终同归于尽之例”不在少数。在《论中国贸易之可能》社论中举出的是出口到美国市场的日本扇子例子,而在《中国贸易》中是关于火柴的例子。当时,中国对日本生产的火柴需求不断,新燧社生产的火柴质量仅次于德国造,虽然价格高(德国造一捆28.9美元,新燧社造一捆24美元左右,其他欧洲造一捆17.8美元),但是口碑很好。结果,日本商人听到火柴出口能赚大钱后,都去生产火柴出口到中国,造成供给过剩,出口火柴里面还有部分“劣质品”,因此,造成的后果是,“日本火柴

^①庆应义塾史事典编辑委员会:《庆应义塾史事典》,东京:庆应义塾,2008年,第37页。

质量不好,最终被排斥淘汰”。该社论在介绍这个事例的同时,对此表示惋惜:“若我国出口商品无粗制滥造之品且出口额度有限制的话,那将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顶级商品。”同时,在和中国贸易中,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根据不同商品种类,可以先摆放样品,待有顾客需求后再调货”。

第二,“大额商品出口时要做好转换市场的准备”。日本人大概是尚未适应“海外地理及市场情况”,向国外出口商品在当地销售不好时经常会“含泪大甩卖”。例如,1884年,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大阪商人把在国内卖不动的“甩卖品”伊万里和九谷的陶器出口到香港,在当地也是销售不佳,“一对几百日元”的花瓶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迫降价。然后,一直在等待降价的外国商人把商品一扫而空。外国商人完全是为了转卖而购买,购买之后他们再把商品转卖到上海、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乃至墨尔本、悉尼等地。该社论对日本商人提出了同样要求,如果在香港卖不动,要寻找到其他市场转卖的“时机”。

第三,“商品设计要符合消费者需求”。由于中国人“比较保守,墨守固有传统”,所以作为卖方的日本人需要考虑“买方”需求,在“投其所好”上下功夫。举的具体例子是,日本出口的扇子由于比较小,不适合中国男性使用。扇子由日本的“寻常卖书画家”作画,即使运用“芋山罗列,蚯蚓并行”之手法,也只不过是“徒增笑话”。从北海道出口的罐头,外包装贴着白底黑字的商标,这种配色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与此相反,用红纸包着的挂面,火柴外边包着的五色纸却极受欢迎。以上所举事例只不过是关于中国贸易需要注意的“管中窥豹”,“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方人民风俗习惯各异,作为商人应该更加详细探索其商业之道”^①。

1887年8月5日《时事新报》刊登了《日本桑蚕家不应忘记与中国之竞争》(《福泽谕吉全集》第11卷收录)一文,文中呼吁大家要对中国这个竞争对手引起注意。在该文开头部分介绍了流传在坊间的一些论调:近年来由于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大力鼓励桑蚕业”,所以,“西洋生丝产业会更加发展繁荣,从而会抑制东洋的供给,东洋生丝要迎来低谷期”。但是,福泽对此却并不悲观,他认为“日本的桑蚕绝不应担忧在西洋的未来”。因为,“日本百货皆廉,西洋实乃难以竞争”,不仅如此,单凭“光泽和韧性二点”,日本产的生丝就远超西洋。

然而,福泽认为,日本的“养蚕制丝家”不要忘记,“最恐怖的竞争对手在邻国中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东洋有适合蚕业发展之气候土壤,然中国与日本共享此优势”,“其国土更宽广其生产更具无限可能”,而且,“其工钱低且民众有不厌劳动之风气”,这些都是优于日本的条件。前些年,富冈制丝场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去上海制丝场做了试验,发现,“无论是光泽还是韧性,日本丝几乎完败给中国”。十年前,在美国市场,中国生丝出口量为八九千俵(计量单位,1俵约60公斤),日本生丝出口量约为八九十俵,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在仅不到十年时间就增加到了上万七千俵,那完全是“率先进行技术改良之结果”。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机器缫丝”量逐年增加,又逐渐解决了“狡猾的商人”在生丝里掺杂假货之现象,因此,中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因此,福泽说,“日本应抢占先机尽最大之力扩大市场,巩固己方之优势,实乃当下之急务”^②。

同月末,刊登的题目为“中国新设立银行对日中贸易之影响”(1887年8月27日,《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的社论。该社论指出,清政府筹划和美国实业家合作,大规模开设银行。据社论

①《时事新报》(第5卷)~(1),东京:龙溪书舍,1986年,第177、181页。

②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327~329页。

报道,银行初期资本金为一千万两白银,四分之三股份为美国和中国商人持有,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两为清政府持有,清政府持有的资金是由“美国富商米建威氏”(Vanderbilt)以低利息提供的。银行“总经理”自然为李鸿章担任,“米建威氏”派人参与监督管理。根据《最近之报》消息,这个计划由前驻英大使曾纪泽在伦敦和美国人以整顿“内约”而开始,业务涉及到“陆军海军铁路电信疏水运河造币造船乃至国库及各省现金管理”。

在日本,关于中国设立银行,各方议论纷纭。有人认为“西洋诸国欲干涉中国之内政,恐在东洋重蹈土耳其、埃及之覆辙,实乃大祸”,也有人认为,“财政税法紊乱”之清朝国家,导入“秩序井然制度严明西洋流之银行”岂不是“更加混乱”。但是,该社论却认为,“作为局外人的日本人应该祝愿新开设的银行能够按照预期达成目的,同时日本人亦可共享其便利”。之所以有如此主张,那是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国家意义上的银行”,都是“各自为战各为己利之私立银号”来开展银行业务,外国商人一般不会享受此便利。此次设立之银行可以方便在中国内地广泛开展业务,从而获取“特许自由”,“内通外联之银行”很有可能就此诞生。社论还期望通过银行来改革中国币制。目前,“现行的货币银两由于是天然银块,买卖皆不便”,除此之外,还“真假伪造同在”,同时中国商人在交易时还要把银两重新铸造再交给银号,为此还要鉴定。如果新设立的银行能够渐进改良中国货币制度,则会给“一衣带水之我日本商人之商业利益”带来重大利好。不仅如此,社论还认为,再加上“铁路电信之便利”,会对中国内地的贸易“理所当然带来非常进步之势”,日本人也应该做好准备,“不落后于西洋人逐利中国中原”^①。

次月月末,《时事新报》上刊载《日本中国之贸易》文章(1887年9月30日,《福泽谕吉全集》未收录)。该文论及到中国独有的“厘金税”。在文章开头,列出了从1877年到1886年间的日中贸易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期间贸易额基本翻了一倍:

日本出口到中国	4,185,942 日元(1877 年)	9,079,213 日元(1886 年)
中国从日本进口	4,576,203 日元(1877 年)	7,106,564 日元(1886 年)
合计	8,762,145 日元(1877 年)	16,185,777 日元(1886 年)

在公开这些数据后,社论认为,“中国国土广大其海岸少,故水产渔业货物匮乏”,为此,“让该帝国四亿人口对海产物之需求达到厌倦程度尚需数年或更久远,日本国扬此优势销售国产之物其利大焉”。但是,其中一个阻碍是“被称为厘金税的一种变相课税”。在中国各省均以厘金税之名征收税赋的极端情况下,国外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时已被征税十余次。而且由于厘金税“在税率和可征收次数方面变化不定”,西洋商人苦不堪言。前年,英国借在云南传教士被杀之机,发起改革厘金税的谈判,与中国签订了“半口税”的税则协议。主要内容是,在增加海关税率五成的前提下,取消厘金税,如此,进口商人就能看到进口商品之未来,贸易额也随之增加。社论认为,“日本和中国的条约虽和西洋诸国在中国利益有不同,通商自由对日中双方皆有利之前提下,早晚日本人亦可免受厘金税之束缚,从而获得内地通商之自由”。

该社论还对从事中国贸易的日本商人提出以下希望,“查探彼国商务之事情,再行以实地之考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存在变通之则”,即便推行“文明之商规则”,然“他们变通之则包罗万象,进退自由”,被套牢其中之事不在少数。虽说日中贸易总额在十年间由876万日元倍增到1,618万日元,但生意失败之日本商人颇多。其失败原因大都是因为,“对彼国人之商务习俗知之甚少,带些许资本宁信文明之信用”。“从函馆到横滨,在日本开放港口

①《时事新报》第6卷~(2),东京:龙溪书舍,1986年,第543页。

买日本物品后将其出口之人,十之八九为中国人。日本人对于近在眼前之对手毫无防范,抓住机会还是要走出国门”,虽然有此建议,但是,“我辈即使听闻此说亦无意去留中国”。中国人在日本购买日本物品,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去中国销售物品的话,“日中贸易之盛大可期也”。所以,日本人去中国,加深认识其“国情”就显得非常有必要^①。

结语

福泽谕吉认为,国家富强必须要繁荣贸易,中国与日本地缘接近,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不可多得的市场。1880年代,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是干鱿鱼和鲍鱼之类的海产品,福泽认为,海产品出口不能完全依靠中国商人,建议日本人应去中国内陆直接销售(《论中国贸易之可能》)。自打出生以来从未吃过海鲜的中国内陆民众,吃上日本的鱿鱼和鲍鱼后是否觉得这是“美味”呢?福泽谕吉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他的确说过,日本人为了扩大销路,需要学会说汉语,而且很有必要。在当时政府完全推行西化政策时,这个主张可以说是对政府的一种隐形批判。另一方面,围绕向欧美出口的生丝和茶叶,福泽认识到,日本和中国是竞争与合作关系,但在能够左右国外市场的力量方面,中国要强于日本数倍(《英语和中国语》)。另外,他同时指出,为了更加认识了解中国内地情况,汉语知识不可或缺。

顺便提一下,笔者1992年进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学习时,选择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当时,绝大多数学生还是选择德语或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的。然而,25年后的今天,听说欲选择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是最多的。可以说,福泽谕吉的主张经历百年洗礼后终于在今天结出硕果。

How Fukuzawa Yukichi argued about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ijishinpou*

Hori, Kazutaka¹, Translator: Sun Shoufeng²

(1. Fukuzawa Memorial Center for Modern Japanese Studies, Keio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Fukuzawa Yukichi's main contribution was introducing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Japan from the end of the Edo era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eiji era. But he neither studied European sciences in his childhood nor thought it desirable for Japan to be totally committed to the Wes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Although he published his editorial *Datsu-A Ron* (Argument for leaving Asia) in his *Jijishinpou*, we can still find lots of his editorials in the same journal which advocated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Asia. His editorials, such as *Shina no Boueki ni Nozomi Nakiniazu*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trade with China) and *Eigo to Shinago* (English and Chinese), reflected his opinions about and claims of promoting trade with China.

Key words: Fukuzawa Yukichi; *Jijishinpou*; trade with China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时事新报》第6卷~(3),东京:龙溪书舍,1986年,第138页。

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关系： 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①}

张莉¹ 赵景欣² 张文新²

(1.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以456名服刑青少年为被试,采用问卷法,探讨了青少年服刑后的积极情绪、人际协助与其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比较突出,其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因子上检出为阳性;(2)服刑后的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症状;(3)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心理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既可以直接降低其服刑期间的心理症状,又可以通过提升其人际协助来改善心理症状。

关键词：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心理症状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7)06-0087-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09

一、引言

服刑青少年指已满14周岁至未满25周岁的个体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触犯刑律的行为,依法受到处罚,并在押服刑的青少年犯群体。^②由于经历司法判决负性事件,再加上监狱特殊的生活环境,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巨大冲击。已有研究表明,与普通青少年群体相比,较高比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SCL-90)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并且在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等因子上表现出阳性。^{③④⑤}较高的心理症状水平不仅影响服刑青少年的狱内适应和改造,而且不利于他们出狱以后的社会适应和良好发展。因此,探讨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水平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改善服刑青少年在服刑期间的心理适应与生活状况,促进其刑满释放后的积极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所谓积极

* 收稿日期:2017-07-25

作者简介:张莉(1982—),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赵景欣(1980—),女,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张文新(1962—),男,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ZR2013CQ010);山东省“十二五”特色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省应用基础型特色名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项目。

②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③Reich, W. A.: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outcomes among Justice-Involved youths under community supervision,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2014, 53(3), 211-230.

④Dianna, T., Christopher, J., & Paul, W.: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offenders serving orders in the community,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2007, 45(1-2), 123-148.

⑤赵美玉:《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心理健康现状及犯罪原因的对比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年第6期。

情绪是一种暂时的愉悦,是个体对自己感兴趣事情的一种独特即时的反应,积极情绪与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个体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加,消极情绪体验的减少均会降低个体的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症状。研究表明,在普通被试群体中,积极情绪体验的短时和长时变化均与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焦虑和抑郁显著相关,积极情绪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心理症状,提升其幸福感水平。^② 那么,对于生活在监狱环境中的服刑青少年来说,积极情绪是否在降低其心理症状中发挥保护作用呢?本研究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人际协助是指个体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获取帮助或进行情绪宣泄,代表着个体所获的家庭以外支持力的高低。^③ 在监狱这一限定自由的环境中,服刑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自由地接受来自家庭的支持。他们日常的人际互动对象主要是共同服刑的学员以及管教所的教官,这也构成了他们获得人际协助的主要来源。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所获取的人际协助水平与心理症状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④ 对于服刑青少年,教官和一起服刑的学员给予的人际协助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甚至莫大的安慰。这种安全感或者安慰对于降低乃至避免他们在服刑期间的心理症状均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服刑青少年更加客观地认清现状,以乐观心态面对自己的狱中生活,并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憧憬;另一方面,它能够在服刑青少年遭遇压力时,帮助其缓解甚至摆脱焦虑、抑郁、乃至恐惧等心理症状的困扰。可以预期,服刑青少年入狱后获得的人际协助是降低其心理症状的重要保护因素。

根据 Fredrickson 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扩大与构建理论”,积极的情绪体验,例如高兴、感兴趣、满足、自豪和热爱等,能够扩大个体即时的思维-行动技能,其中不仅包括身体、智力等个体内资源,也包括友谊、社会支持网络等人际资源。^⑤ 这些人际资源的获得能够较好地缓解个体因不能良好地应对压力而产生的心理症状。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个体所获得的人际协助显著正相关^⑥,说明个体的积极情绪越多,越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人际资源。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限制自由的监狱环境与单调枯燥的劳动改造等不利条件,虽然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但是他们也有体验积极情绪的可能。那么,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是否有助于服刑青少年获得来自于教官和服刑学员更多的人际协助,进而降低其心理症状水平呢?本研究拟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综上,本研究拟以心理症状作为服刑青少年监狱适应的指标,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作为其发展资源的指标,主要探讨积极情绪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的基本状况;(2)积极情绪对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直接预测作用;(3)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①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 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8-226.

②Gloria, C. T., & Steinhardt, M. A.: Relationships among positive emotions, coping,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Stress and Health*, 2016, 32(2), 145-156.

③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心理学报》2008年第8期。

④李义安、张金秀:《高中生心理韧性 with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01年第1期。

⑤Fredrickson, B. L., & Branigan, C.: *Positive emotions*. In: T J Mayne, G A Bonnano (Eds.), *Emo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1.

⑥Stepoe, A., Dockray, S., & Wardle, J.: Positive affect and psycho-biological processes relevant to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9, 77(6), 1747-1776.

从 XX 省 XX 监狱选取 456 名服刑青少年作为被试,其犯罪类型包括绑架、抢劫、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强奸和聚众斗殴等。由于服刑青少年中女性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取样要求,因此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全部为男性服刑青少年。服刑青少年的年龄分布在 15-21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8.44 ± 1.26 岁。服刑青少年的服刑时间分布为 3-69 个月,平均为 21.86 ± 11.72 个月。

(二)研究工具

1.积极情绪

采用陈文锋和张建新修订的积极情绪量表(中文版)^①来测查青少年在服刑期间的积极情绪状况。该量表共包括 8 个题目,如“事事顺心”。本量表采用 4 点计分,其中“1”代表“没有”、“2”代表“很少有”、“3”代表“有时有”、“4”代表“经常有”,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最后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均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情绪体验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2。

2.人际协助

采用胡月琴等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②中的人际协助因子来测查青少年在服刑期间所获得的人际协助情况。该因子包括 6 个题目,如“我有困难的时候会主动找别人倾诉”。本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我说不清”、“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均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服刑期间获得人际协助越多。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3.心理症状

采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测评个体的心理症状水平。该量表包含 9 个维度: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共 90 个项目,如“容易烦恼和激动”。本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其中“1”代表“没有”、“2”代表“轻度”、“3”代表“中等”、“4”代表“偏重”、“5”代表“严重”。计算项目得分的总和,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症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

4.研究程序与处理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男性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由于服刑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在具体施测时,采用狱警组织,分管区进行的施测方式。考虑服刑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偏低,施测时由主试读题,被试统一作答。采用 SPSS17.0 及 AMO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心理症状和人际协助的特点及相关分析

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心理症状及其各因子上的均分和标准差见表 1。在心理症状上,服刑青少年的平均分为 1.98,接近筛选阳性分 2 分;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总分为 178.15 分,高于全国常模 160 分,说明服刑青少年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心理症状。进一步分析发现,得分高于 160 分的被试 262 人,阳性检出率为 57.96%,其中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 5 个因子上均分高于 2 分,表现出阳性。在积极情绪上,服刑青少年的平均分 2.86 分,最高分为 4

①陈文峰、张建新:《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的结构和效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 年第 11 期。

②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心理学报》2008 年第 8 期。

分,最低分为 1 分,这表明尽管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总体水平一般,但是仍有一些服刑青少年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情绪。在人际协助上,服刑青少年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分和标准差

	M	SD
积极情绪	2.86	0.54
人际协助	3.07	0.80
躯体化	2.01	0.78
强迫	2.28	0.75
人际关系	2.05	0.76
抑郁	1.89	0.72
焦虑	1.89	0.74
敌对	2.21	0.88
恐怖	1.48	0.55
偏执	2.11	0.81
精神病	1.93	0.63
SCL-90	1.98	0.62

服刑人员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服刑人员的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显著正相关,与心理症状总分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症状各个因素均呈显著负相关;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总成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症状各个因子也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 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积极情绪	1										
2 人际协助	0.25 **	1									
3 躯体化	-0.15 **	-0.12 **	1								
4 强迫	-0.20 **	-0.15 **	0.68 **	1							
5 人际关系	-0.20 **	-0.16 **	0.60 **	0.76 **	1						
6 抑郁	-0.28 **	-0.16 **	0.64 **	0.78 **	0.81 **	1					
7 焦虑	-0.19 *	-0.13 **	0.71 **	0.78 **	0.77 **	0.82 **	1				
8 敌对	-0.13 **	-0.13 **	0.59 **	0.65 **	0.70 **	0.68 **	0.70 **	1			
9 恐怖	-0.11 *	-0.10 *	0.56 **	0.64 **	0.68 **	0.65 **	0.68 **	0.60 **	1		
10 偏执	-0.15 **	-0.11 **	0.69 **	0.74 **	0.80 **	0.76 **	0.74 **	0.71 **	0.64 **	1	
11 精神病	-0.13 **	-0.13 **	0.64 **	0.75 **	0.77 **	0.80 **	0.79 **	0.67 **	0.69 **	0.78 **	1
12 SCL-90	-0.21 **	-0.15 **	0.81 **	0.89 **	0.78 **	0.91 **	0.91 **	0.80 **	0.76 **	0.85 **	0.88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二) 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检验。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先检验积极情绪对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变化的显著程度。^① 为了提高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稳定性、指标数据质量和模型拟合程度,对于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两个单维变量采用随机打包策略进入结构方程模型^②,其中积极情绪变量打包后有两个指标,分别为 p1 和 p2;人际协助变量打包后形成 r1 和 r2 两个指标;心理症状的九个观测变量分别为躯体化(h1)、人际关系敏感(h2)、强迫(h3)、抑郁(h4)、焦虑(h5)、敌对(h6)、恐怖(h7)、偏执(h8)和精神病(h9)。

①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 年第 5 期。
 ②吴艳、温忠麟:《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题目打包策略》,《心理科学进展》2012 年第 12 期。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积极情绪直接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模型(简称:直接作用模型)和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中介作用模型(简称:中介作用模型)分别进行数据拟合。模型拟合指标和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分别见表3和图1。

表3 结构方程的模型拟合指数表

	χ^2/df	GFI	CFI	NFI	TLI	RMSEA
直接作用模型	3.44	0.94	0.98	0.97	0.97	0.07
中介作用模型	2.59	0.95	0.98	0.96	0.97	0.06

从表3看,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理想。从直接作用模型的结果来看,积极情绪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beta = -0.23, p < 0.01$)。从中介作用模型的结果看,加入人际协助以后,积极情绪与心理症状之间的路径系数仍显著($\beta = -0.18, p < 0.01$),积极情绪对人际协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eta = 0.35, p < 0.01$),人际协助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13, p < 0.05$)。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心理症状路径中,其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11, -0.01]$,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 $0.35 \times (-0.13) = -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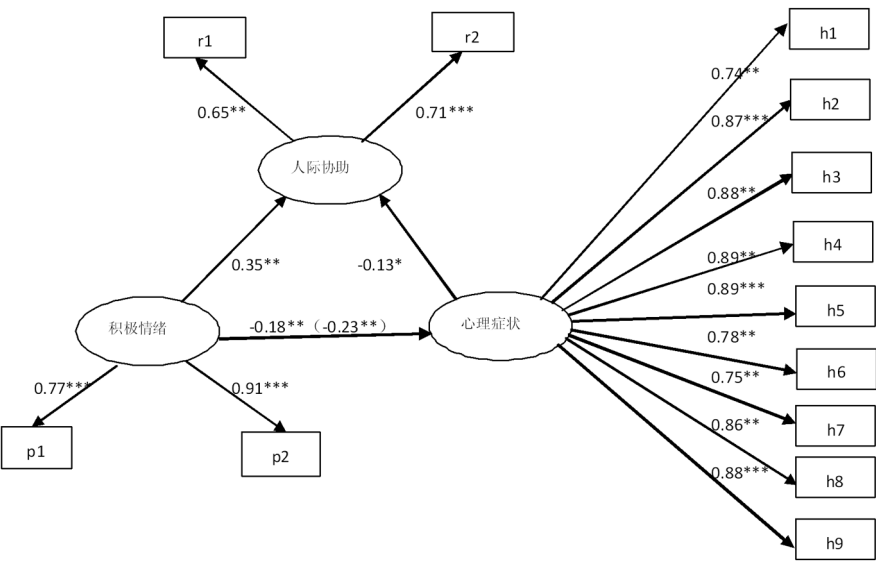


图1 人际协助在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中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中的值为积极情绪影响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直接作用系数。)

四、讨论

(一)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人际协助和心理症状的特点

研究发现,服刑青少年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上的得分较高,其中半数以上服刑青少年的得分高于全国普通群体常模参照水平,尤其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几个因子上表现为阳性。这说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适应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比较突出可能是其在入狱前就存在某些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恰是引发他们犯罪的原因;也可能是犯罪行为作为负性刺激,导致他们表现出了某些心理症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处于限制自由的

监狱环境,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干预,会使他们的心理症状更为严重。因此,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定期组织专业人员评价和评估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水平,及时为需要帮助的服刑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或辅导,并建立长期的、可追踪的心理健康档案。

本研究还探讨了服刑青少年在积极情绪上的特点。研究发现,服刑青少年在入狱后,获得的积极情绪体验偏少。对于服刑青年来讲,入狱服刑是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与入狱前相比,入狱后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许多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这些变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有研究表明,适度生活改变会激励人们付诸行动适应新环境,但过快、过大或过于持久的改变容易超过机体自身的调控能力,造成适应困难,引起一系列生理与心理功能的紊乱,进而会使个体产生较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较少的积极情绪体验。^①

在本研究中,服刑青少年的人际协助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已有研究显示,服刑青少年入狱后,父母给予较高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处境不利中的个体面对自己的环境容易产生自我诋毁。^③对于服刑青年来讲,监狱内限制自由的处境不利环境带来的自我诋毁可能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接纳水平,而较低自我接纳进一步影响服刑青少年人际交往中的自信,使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愿意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同时,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污名”现象也会导致服刑青少年与亲人、朋友之间的隔离和疏远。此外,监狱对于服刑人员与外界沟通进行严格管制,并且沟通渠道不畅通。上述因素都会对服刑青少年的人际协助产生不利影响。

(二)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和心理症状的关系及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是降低个体心理症状的重要内部资源。^④这一结果也在本研究得到了支持。在本研究中,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心理症状,即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水平越高,其心理症状就越不明显。这显示,尽管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在整体上偏低,但是积极情绪在降低个体心理症状上的保护作用仍然适用于该群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发挥积极情绪的保护作用减少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比如监狱管理部门尽可能丰富服刑青少年的生活,鼓励服刑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以增进服刑青少年彼此的相互了解,帮助服刑青少年认识欣赏自我,悦纳自我,从而让其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

本研究还发现,服刑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还可以通过人际协助对降低其心理症状发挥作用。该结果为积极情绪的扩展与建设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能增加个体对熟悉人的信任感^⑤,还有益于友谊的发展^⑥。对于服刑青年来讲,入狱前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了严重挑战,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服刑青少年维持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保护他们已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积极情绪还能够一定程度

①金怡、姚本先:《生活应激研究现状与展望》,《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张莉、李静雅、赵景欣:《父母支持与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年第6期。

③Bulman, R. J., & Wortman, C. B.: Attribution of blame and coping in the “real world”, sever accident victims react to their lo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7, 35(5), 351-363.

④Zautra, A. J., Johnson, L. M., & Davis, M. C.: Positive affect as a source of resilience for women in chronic pai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73(2), 212-220.

⑤Dunn, J. R., & Schweitzer, M. E.: Feeling and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 736-748.

⑥Harker, L., & Keltner, D.: Expressions of Positive emotion in women's college Yearbook Pic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ersonality and life outcomes across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1), 112-124.

上帮助服刑青少年在监狱内与学员、警官进行良好互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从而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已有社会支持网络的维护和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均是他们在困难时获取支持、宣泄不良情绪的重要支持系统,这些人际资源能够增强服刑青少年的狱内适应,进而降低其产生心理症状的可能。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经历司法判决和监禁,尽管服刑青少年的人际协助水平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他们仍然可以获取丰富的人际协助资源,这种人际协助则能够成为降低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重要保护资源。

五、结论

本研究关于服刑青少年积极情绪、心理症状、人际协助基本状况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比较突出,尤其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敌对、偏执上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服刑青少年获得的积极情绪体验偏少,而人际协助处于中等水平;(2)积极情绪和人际协助能够负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3)积极情绪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而且可以通过增强其人际协助来降低服刑青少年的心理症状。

Positive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 of Juvenile Offenders: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Zhang Li¹, Zhao Jingxin², Zhang Wenxin¹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posi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impact juvenile offenders' psychological symptom, 456 male juvenile offender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Positive Emotion Scale,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Scale, Symptom Checklist 90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Juvenile offenders had a relatively poorer condition of mental health, especially in summarization,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hostility and paranoid ideation. (2) For juvenile offenders, posi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both predicated a low level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 (3)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exerted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 Overall,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juvenile offenders' positive emotion had not only a direct effect on their psychological symptom, but also an indirect effect on the psychological symptom through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Key words: juvenile offenders; positive emotion;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psychological symptom

责任编辑:时晓红

中小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現狀調查研究*

姜言霞¹ 卢巍² 毕华林¹ 卢珊珊¹

(1. 山东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2.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 依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基本框架》编制调查问卷, 抽样调查山东省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共计 161806 名中小學生, 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 我国当前中小學生核心素養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中小學生各核心素養发展水平不均衡; 人文底蘊、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5 大核心素養随学段的增长不断提升, 而健康生活核心素養随着学段增长反而降低; 男女生在各核心素養的发展表现各有优势项, 男生在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两大核心素養表现有明显优势, 女生在人文底蘊、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心素養的表现有显著优势。

关键词: 中小學生; 核心素養; 現狀調查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094-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0

1 研究背景

教育部于 2016 年 9 月正式颁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简称“文件”)。文件指出,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3 个方面, 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蘊、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 6 大素養, 其中每个核心素養包括 3 个基本要点, 共 18 个基本要点。^①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有关文件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正在进入以“核心素養”发展为本的基础教育改革阶段。^{②③}以核心素養发展为本, 也是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趋势。^{④⑤}亚太经贸合作组织 (APEC)、美国、加拿大、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均明确提出了关于核心素養的基本要求。尽管核心素養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首次提出, 并不意味着之前的教育对发展学生的核心素養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之前的基础教育,

* 收稿日期: 2017-11-05

作者简介: 姜言霞 (1979—), 女, 山东潍坊人,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 卢巍 (1965—), 女, 山东临沂人,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毕华林 (1965—), 男, 山东威海人,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卢珊珊 (1986—), 女, 山东济南人,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讲师, 博士。

① 核心素養研制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914/c1053-28714231.html>

② 姜宇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实践途径与策略》,《中国教育学刊》2016 年第 6 期。

③ 辛涛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人民教育》2015 年第 7 期。

④ 左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趋势:走向核心素养为本》,《课程·教材·教法》2016 年第 2 期。

⑤ 辛涛等:《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特征及框架定位》,《中国教育学刊》2016 年第 6 期。

更不能认为当前我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起点水平为零。事实上,核心素养旨在勾勒新时代新型人才的形象^①,文件的颁布进一步规定和明晰了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核心素养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核心素养的短板和问题,从而找到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探寻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保障教育改革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研究的设计和过程

2.1 研究目的和任务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的目的是调研中小学生学习核心素养发展的现状。主要任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开发测查工具。由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刚刚提出,查找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现成的测查工具可以应用。因此,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基于研究设计,开发中小学生学习核心素养调查问卷,测查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同时设计学生和教师访谈提纲,主要辅助分析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学生在各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情况。

(2)分析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面向我国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个学段学生的,不同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不尽相同,培养策略也有一定差异。因此,充分了解各个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水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并通过在三个学段分别选择学生代表进行访谈,深入了解其核心素养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2.2 研究工具的设计

2.2.1 工具开发过程

本研究所用工具的开发,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核心素养的内涵。在开发工具之前,首先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文件,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3个方面,对6个核心素养以及18条基本要点进行解读,以理解和明确18条基本要点的主要表现描述。

(2)进行结构性访谈。选择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共37位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结构性访谈。访谈对象来自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小学,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品德与社会等15个学科。访谈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学段、不同学科老师对核心素养的理解情况,各学段学生在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典型表现行为,以及他们对学生各项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初步估计和评价。访谈结果主要是为调查问卷的编制提供支撑素材。

(3)设计问卷项目。结合对核心素养各基本要点的理解,将教师的访谈进行转录、梳理,联系不同学段、不同学科教师描述的学生在各核心素养上的具体表现,针对每个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开发相应的项目。例如,“信息意识”这一基本要点主要表现描述包括,“能自觉、有效地获取、评估、鉴别、使用信息”,直接将该描述列为问卷项目,势必会有不少学生特别是中低年级学生难以对自己的实际表现准确评价。访谈中有位老师提到,在“信息意识”方面,“学生通常会查

^①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全球教育展望》2016年第1期。

找所需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查信息还是难不倒学生的,但是对于网络病毒没有防备意识,也不会分辨垃圾信息”。我们据此在“信息意识”调查部分编写了如下项目:“我会熟练地利用手机或电脑搜索信息”;“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时,我非常警惕网络病毒和垃圾信息,不随意登录一些陌生网站”。项目设计时尽量保证每条基本要点有 3 个以上的项目,并尽可能覆盖各要点的主要表现描述。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计为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反向题则反向计分。

(4)问卷效度的初步检验。问卷初步编成后,请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学生各 12 名进行试读,并根据试读情况适当修改一些语句表达。请学科教学论的专家、中学各学科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等对开发的项目所测评的核心素养、项目的表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检验,确保问卷设计的内容效度和专家效度。

(5)进行试测,修订调查问卷。将初步形成的测试问卷,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试测。回收到有效学生问卷 1870 份,并对这些问卷的结果进行初步分析。根据学生和教师的作答情况,进一步修正问卷。并再次交付专家讨论,最终修订确定正式调查工具。

2.2.2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通过专家效度和分维度科隆巴赫 α 信度分析对各变量调查项目进行初步筛选,继而对筛选出的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可以确定调查工具能够测量到的理论构念或特质的程度,同时是对调查工具建构效度的较为严格的检验(王保进,2002)^①,即通过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研究中所列题项是否能够测量出研究者想要测量的变量。本研究基于试测对各观察变量进行因素分析后,确定最终进入实际调查及结果分析的题项。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进行因素分析,以“科学精神”这一核心素养为例,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科学精神”核心素养因素分析结果

题项	内容	因子负荷
Q11	我会联系应用一些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生活现象和问题	0.805
Q13	在学习和研究中,我喜欢用事实和证据来说话	0.799
Q14	当生活中出现问题时,我会类比运用所学内容寻找解决方法	0.847
Q15	我在学习和生活中,经常进行逻辑推理解决问题	0.843
Q16	我会对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疑问	0.579
Q17	在和其他人讨论问题时,我一般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	0.800
Q18	我解决问题时会多角度思考、选择最佳方案	0.846
Q19	对一些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我有好奇心,想去探究	0.803
Q20	遇到问题时,我能积极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	0.833
		特征值(Eigenvalue):5.744
		累积解释变量(Cumulative %):63.827

^①王保进:《窗口版 SPSS 与行为科学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2007 年,第 236 页。

经过试测修订,学生核心素养问卷总体信度为 0.948,信度很高。各因素变量具体的测查题项分布及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各核心素养变量测量工具的总体情况

核心素养	项目	因子负荷	Cronbach's Alpha 值
人文底蕴	Q1;Q2;Q3;Q4;Q5;Q6;Q7;Q8;Q9	0.707-0.853	0.886
科学精神	Q11; Q13;Q14;Q15;Q16;Q17;Q 18;Q19;Q20	0.579-0.847	0.874
学会学习	Q22;Q23;Q24;Q25;Q26;Q27;Q28;Q29;Q30;Q31;Q32	0.433-0.851	0.855
健康生活	Q33;Q34;Q35;Q36;Q37;Q38;Q39;Q40;Q41	0.455-0.863	0.857
责任担当	Q43;Q44;Q46;Q47;Q48;Q49;Q50;Q51;Q52;Q53;Q54;Q55;Q56; Q57;Q58;Q59;Q60	0.524-0.770	0.890
实践创新	Q61;Q62;Q63;Q65;Q66;Q67;Q68;Q69	0.681-0.861	0.910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本研究中自行开发的 6 个核心素养变量的分量表信度介于 0.855 到 0.910 之间。根据 De Vellis(1991)的观点,分量表的信度介于 0.7 到 0.8 之间表示具有良好的信度,介于 0.8 到 0.9 之间表示信度非常好(吴明隆,2009)。^① 因此,本研究中开发的测量工具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另外因素分析表明,学生问卷关于 6 个核心素养表现的大部分测量项目的因子负荷较高,表明各个测查题项能有效测查学生的 6 个核心素养表现。由此说明,本研究开发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于进行调研测查。

2.2.3 访谈提纲

学生访谈对象从参加问卷测查的学生中选择。访谈内容主要包括:(1)请学生对自己各核心素养的表现进行评分;(2)针对给自己核心素养表现的评分,说出一些具体(典型)表现,包括优势和不足。

2.3 研究样本信息

本次调查样本来自山东省 7 个地市,尽可能全面覆盖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以保证样本对中小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抽样方式采用整群抽样。学生样本涉及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包括 1-12 年级。由于 1-3 年级学生年龄较小,可能对问卷表述内容理解有一定困难,因此问卷填答过程中,请家长和老师共同帮助其完成问卷调查。施测后,根据作答情况,首先剔除空答、规律作答等明显的无效问卷,然后根据测谎题,进一步剔除无效问卷。学生核心素养测查有效样本统计情况如表 3 所示。由于山东省内包括五四学制和六三学制,因此 6 年级样本分为小学和初中两部分。

2.4 研究实施过程

根据研究目的选定抽取的样本后,利用“问卷网”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将测查问卷网址转发给受测者,请受测者选择合适的时间完成网络问卷。

随后从烟台和日照两个地市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从每个学校中抽取各学科教师 20 名,各年级学生共 20 名,进行深度访谈,共访谈 60 名教师和 60 名学生。

^①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77 页。

表 3 学生核心素养调查有效样本分布情况表

学段	年级	男生	女生	合计
小学	1 年级	10729	9697	20426
	2 年级	9316	8321	17637
	3 年级	10069	9001	19070
	4 年级	9137	8317	17454
	5 年级	7448	7650	15098
	6 年级	904	877	1781
	合计	47603	43863	91466
初中	6 年级	6824	6982	13806
	7 年级	7404	8161	15565
	8 年级	15565	7092	13544
	9 年级	4822	5469	10291
	合计	25502	27704	53206
高中	10 年级	3119	3713	6832
	11 年级	3585	4352	7937
	12 年级	1067	1298	2365
	合计	7771	9363	17134
总计		80876	80930	161806

3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现状分析

本研究从网上下载全部调查数据后,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使数据结果更易于理解,我们将计算的各个分数乘以 20,转化成百分制。

3.1 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总体表现分析

对于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总体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学生问卷调查数据获得,即基于学生作答问卷的反馈信息,推断其各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对所调查的有效学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6 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根据图 1 数据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在 6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方面,责任担当表现最好,平均分为 79.95 分,而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的表现最低,平均分为 71.04 分,另外,科学精神的表现也比较低,平均分为 72.86 分。其他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别为:人文底蕴为 74.98 分,学会学习为 73.47 分,实践创新为 75.04 分。

进一步分析学生在 18 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表现情况,如图 2 所示。

根据图 2 可以看出,学生在 18 个基本要点的表现情况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国家认同”、“社会责任”、“珍爱生命”的表现水平均高于 80 分,说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而“健全人格”、“自我管理”、“信息意识”的表现水平均低于 70 分,其中“健全人格”的表现水平最低,为 59.87 分,这与当前独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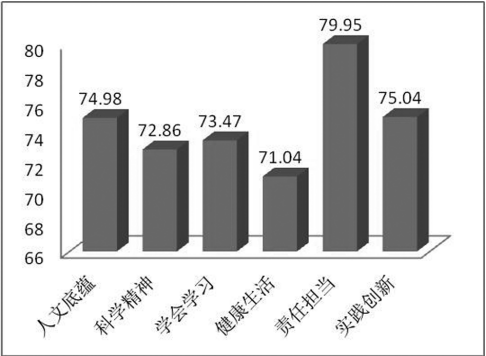


图 1 学生核心素养的总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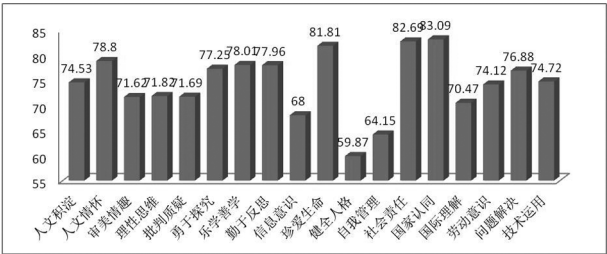


图2 学生在18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表现

女的高比例及其典型的教育问题有高度的一致性。^①

3.2 中小學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性别差异分析

对全体男、女學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男、女學生样本在6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性别學生核心素养表现的差异检验

核心素养	男生	女生	均值差	显著性
人文底蕴	74.30	75.66	-1.36	0.00
科学精神	72.99	72.74	.25	0.00
学会学习	77.78	78.37	-.59	0.00
健康生活	71.08	71.00	.08	0.10
责任担当	79.63	80.27	-.63	0.00
实践创新	75.11	74.97	.14	0.11

根据表4数据可以看出,中小學生中男生和女生6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并不相同。男生在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类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女生高,其中在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两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方面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女生在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男生高,且均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3.3 中小學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学段差异分析

对不同学段學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析,如图3所示。进一步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學生样本在6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以上图表数据可以看出,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6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并不相同。其中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这5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随着学段的增長而逐渐升高,即高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又好于小學生。但是,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方面,却出现了反向变化趋势,即小學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高中生。进一步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发现,三个学段在6大核心素养的表现差异均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即差异显著。

^①郝克明、汪明:《独生子女群体与教育改革——我国独生子女状况研究报告》,《教育研究》200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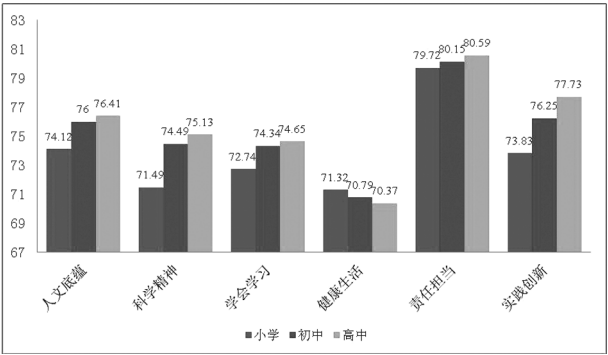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

表 5 不同学段学生核心素养表现的方差分析

因变量	(I)学段	(J)学段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人文底蕴	小学	初中	-1.88 *	.08	.00	-2.03	-1.73
	小学	高中	-2.29 *	.12	.00	-2.51	-2.06
	高中	初中	.40 *	.12	.00	.17	.64
科学精神	小学	初中	-3.00 *	.08	.00	-3.15	-2.85
	小学	高中	-3.64 *	.12	.00	-3.87	-3.41
	高中	初中	.64 *	.12	.00	.40	.88
学会学习	小学	初中	-1.60 *	.065	.00	-1.73	-1.47
	小学	高中	-1.91 *	.10	.00	-2.11	-1.72
	高中	初中	.31 *	.11	.00	.11	.52
健康生活	小学	初中	.53 *	.05	.00	.43	.63
	小学	高中	.95 *	.08	.00	.79	1.11
	高中	初中	-.42 *	.08	.00	-.59	-.26
责任担当	小学	初中	-.43 *	.07	.00	-.56	-.30
	小学	高中	-.87 *	.10	.00	-1.07	-.67
	高中	初中	.44 *	.11	.00	.23	.65
实践创新	小学	初中	-2.42 *	.09	.00	-2.60	-2.24
	小学	高中	-3.90 *	.14	.00	-4.18	-3.62
	高中	初中	1.48 *	.15	.00	1.19	1.77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比较方法为:LSD。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当前中小學生核心素养发展总体水平不高

根据问卷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小學生在 6 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方面,总体发展水平并不高。其中“责任担当”的表现水平最好,平均分为 79.95 分;而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的表现最低,平均分为 71.04 分。

事实上,根据访谈分析,我们发现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可能比这些数字还低。进行访谈时,学生往往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学校保护而将自己或学校的表现情况进行夸大说明;当我们要求其举例说明时,学生却无法举出一个具体的实例。如我们问:“你会质疑一些权威的认识或观点吗?”学生回答:“会。”我们继续提问:“那你在学习和生活中会批判质疑一些权威或专家的观点,

对吗?”学生回答:“是的,我会批判质疑。”“那你通常在学习和生活中会批判质疑什么或者哪些方面呢?”学生此时表现很茫然。我们进一步追问:“比如,你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你曾经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对所学内容或者老师讲解的某些内容提出批判或质疑吗?”学生仍然无法列举一个具体的实例,只好说:“我觉得不能迷信权威或专家的观点,但是我想不起来我曾经质疑过什么。”

由此可以推断,学生对核心素养的表现尚处在认识水平,即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好的,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达到自觉的行为水平,即在没有外力监督或督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其所认为“对的”相关行为。这说明,经过十几年新课程改革的努力,山东省中小学生在核心素养的发展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距离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需要结合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基本要求,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范围和力度,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4.2 中小学生学习核心素养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基于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小学生学习6大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根据图4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雷达图,可以看出学生的“责任担当”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相对最高,而“健康生活”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相对最低,二者平均水平相差约9分。“人文底蕴”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略高于“科学精神”和“学会学习”核心素养。

进一步分析发现,学生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如图5所示。学生在“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的发展情况差异最大,其中健全人格发展水平最低,为59.87分,珍爱生命发展水平最高,为81.81分,二者相差21.94分;“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差异最小,最高的为问题解决76.88分,最低的为劳动意识74.12分,二者相差2.76分。其余4个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均为10分左右。“人文底蕴”核心素养三个基本要点中,人文情怀的发展水平最高为78.80分,而审美情趣的发展水平最低为71.62分,二者相差近8分;“科学精神”核心素养三个基本要点中,勇于探究的发展水平最高为77.25,而理性思维和批判质疑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分别为71.82分和71.69分,比勇于探究的发展水平低约6分;“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中,乐学善学的发展水平最高78.0分,信息意识的发展水平最低,为68.00分,二者相差10分;“责任担当”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中,国家认同发展水平最高,为83.09分,国际理解的发展水平最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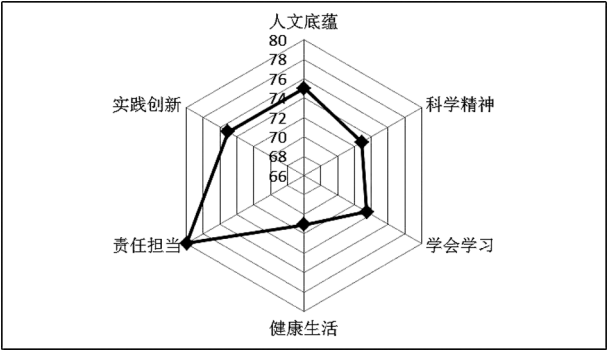


图4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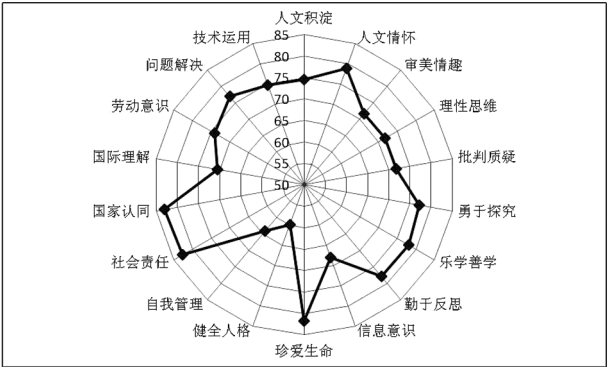


图5 学生在18个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雷达图

70.47分,二者相差12.62分。

这说明当前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优势素养项和劣势素养项并存,其中“责任担当”属于学生核心素养的优势素养项,而“健康生活”、“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等属于劣势素养。而各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中也有优势基本要点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比如“健全人格”和“自我管理”属于“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劣势基本要点项,而“珍爱生命”属于“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优势基本要点项。

在总体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又存在优势素养项和劣势素养项并存、优势基本要点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并存的情况,即各核心素养发展水平不均衡,各基本要点发展水平不均衡。这已然是当前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现实问题。要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整体协同发展,就必须全面系统考虑,既要推动暂时优势素养项和优势基本要点项的进一步发展,更要关注和强化劣势素养项和劣势基本要点项的更大程度的发展,最终实现学生核心素养和各基本要点的协同共进和全面提升。

4.3 中小學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整体随学段的不断增长不断提升

对不同学段学生样本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个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析显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这5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随着学段的不断增长而逐渐提升,即高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又好于小学生,并且各学段之间皆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是有结构、有层次、可培养的素养体系,通过适当的课程、教育、教学是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不断发展的。

进一步对不同学段学生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核心素养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均随着学段的不断增长而显著升高,包括:“人文底蕴”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人文积淀和审美情趣)、“科学精神”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勤于反思和信息意识)、“责任担当”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国际理解和国家认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劳动意识、问题解决、技术运用)。这说明,当前的中小学教学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及其基本要点的发展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分析也显示,在“健康生活”这一核心素养方面,却出现了反向变化趋势,即小学生的表现水平好于初中生,初中生的表现水平好于高中生,并且各学段之间皆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在其他学者的相近研究中也得到印证。^①而对核心要素基本要点的分析也显示有部分基本要点的发展水平随着学段的不断增长而降低,包括:“学会学习”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乐学善学)、“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要点(珍爱生命和自我管理)、“责任担当”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社会责任)。另外,“健康生活”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健全人格)随着年级的增长变化不大。

这说明当前中小学教学在发展学生这些核心素养和基本要点方面效果不好,甚至有一定的反作用。联系实际分析,这可能与学生进入初中和高中阶段后,学习压力逐渐增大有关。健康生活本应是学生学习的基础,但是在当前学习时间紧张,竞争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学生很难每天“早睡早起,作息规律”,也很少有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锻炼身体”。在各科教师各类有力的强化和训练中,学生自己似乎也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优势和缺点”,他们要变成各个

^①周晓琴等:《在校學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6期。

方面的“小超人”。相比之下,小学生似乎要轻松一些。这从访谈中也可以看出。当我们问一名高中生“平时是否会自主进行体育锻炼”时,该学生回答道:“哪有时间自己去锻炼?平时都是学校安排跟着跑个早操……”当我们问及学生的作息时间能否注意早睡早起时,小学生大都回答基本上可以做到,而初中生和高中生更多的回答:“早起是肯定的,早睡绝对不行!”

分析发现,学生在“健全人格”方面的表现水平是18个基本要点中最低的,仅为59.87分,是唯一不足60分的基本要点,且随着学段的增长几乎没有发展。这说明,学生在“具有积极的心理品质,自信自爱,坚韧乐观;有自制力,能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具有抗挫折能力等”方面表现不容乐观。^①这一点在教师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教师在评价学生表现比较弱的核心素养基本要点时,有不少老师提出学生在“健全人格”这一基本要点的表现相对更弱一些:“现在的孩子抗挫折能力非常低,都不敢批评几句!”“很多孩子没有自制力,很难抵制住各种诱惑,比如老控制不住玩手机……”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健全人格”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格上的小缺陷很容易引发一系列大事故,比如因为一件小事想不开就自杀等。诚然,家庭也有对孩子进行健全人格教育的责任,但是学校教育在学生健康心理方面亦有重要影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②因此在后续教学中,我们必须在各个学段采取恰当的措施,改变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建设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③,加强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和锻炼。

4.4 男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表现各有优势项

根据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小学男生和女生在6大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各有优势。男生在“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大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比女生高,其中“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进一步分析男生在“科学精神”核心素养的三个基本要点——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表现水平均高于女生,其中在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两个基本要点的表现显著高于女生。另外,男生在“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一个基本要点——技术运用的表现显著好于女生。同时,男生在“健康生活”核心要素的一个基本要点——健全人格的表现也显著好于女生。

男生相对女生发展的这些优势项,是可以理解的。从各核心素养及其基本要点的内涵来看,科学精神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三个基本要点,其中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的主要表现描述包括:“具有问题意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做出选择和决定;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能不畏困难,有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能大胆尝试,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确实更适合男生的个性发展特点。男生通常也比女生热爱和更多地参加体育运动,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各类运动,“掌握适合自身的运动方法和技能”;另外,男生相对来说更宽容、乐观、积极,能够“自信自爱,坚韧乐观”,并且比女生具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另外,男生比女生更“具有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其“工程思维”和聚合思维也较强^④,更擅长“将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或对已有物品进行改进与优化等”。

①Kerns & S. E.U., et al. Child Welfare and Mental Health: Facilitators of and Barriers to Connecting Children and Youths in Out-of-home Care with Effectiveness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4, (46).

②Catherine P. & Bradshaw. The Impact of School Wide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s PBIS on the Organizational Health of Elementary School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8, (23).

③俞国良、侯瑞鹤:《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及其体系建设》,《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

④沈汪兵等:《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8期。

当然分析结果还显示女生在核心素养的发展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项。女生在“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心素养的表现水平显著比男生高。另外,女生在劳动意识这一基本要点的表现水平显著好于男生。这些方面也确实更适合女生的个性发展特点。如女生的阅读和语言表达能力一般相对男生较高,并且女生比男生更安静,更愿意坐下来阅读和仔细体会阅读内容的“人文思想”,因此其对“古今中外人文领域基本知识和成果的积累”比男生要多一些。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敏锐和细腻,她们在“顾及同学或老师的面子”等方面比男生做得更好一些。同时,在劳动方面,女生比男生具有更加积极的“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劳动习惯”,大都愿意“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主动参加家务劳动”等。

这种情况出现在有针对性的培养之前,说明科学精神、健康生活和实践创新这三类核心素养属于男生的优势素养项,而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和责任担当这三类核心素养属于女生的优势素养项。在教学中,我们应该考虑性别差异,充分认识、了解和尊重男生和女生各自的优势项和发展潜质,进一步推动男生和女生各自优势项的发展,同时更应该加大力度,选择合适的方法和策略,推动男生和女生各自劣势项的发展,从而有针对性地促进男女学生各类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re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iang Yanxia¹, Lu Wei², Bi Hualin¹, Lu Shanshan¹

(1.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nese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161806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level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both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not hig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either is not balanced;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five big categories develops with the lengthening of the study period, while that of healthy life declines with the lengthening of study period. Boys and girls both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in their core literacy performance.

Key words: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责任编辑:时晓红

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①}

兰希秀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 结合其具体诗词作品来看,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可以概括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表现”既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与方法,又指向诗(艺术)审美境界的创构,具有本体意义。“生命”并不是指物质的生命肉体,而指向一种生命精神,方东美称之为“普遍生命”。“普遍生命”的实质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绵延不息于宇宙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即是它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广生”、“继生”、“新生”、“恒生”五种功能。

关键词: 诗学;表现;生命;普遍生命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105-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1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国内学界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展开,被方克立等人列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的思想逐渐为人所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方东美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论域涉及他的比较文化哲学、儒释道观、哲学体系与架构、哲学本体与功能、学术身份定位等问题,而对他的美学思想特别是文艺美学思想却鲜有关注。我们知道,方东美被海内外思想界誉为“诗哲”。这种称号的获得,不仅仅是因为方东美在哲学叙述上的诗化表达方式以及近千首诗词作品的创作实践,更因为方东美哲学与文学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诗学^②美学思想。但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实为遗憾。本文不避浅陋,在综研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与具体诗词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方东美的诗学本质论:诗(艺术)是生命的表现。

—

从思维方式上看,一般认为,西方重理性逻辑,中国重直觉感悟,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折射于文学艺术领域,则产生了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的创作方式的差异,其最终导致了西方在史诗、戏剧、小说、以写实为特征的油画等叙事文学艺术方面强大,而中国在诗、词、以写意为主的水墨画等抒情(言志)文学艺术方面发达。方东美,这个被钱钟书称为最后的“中国古典诗人”^③,显然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创作倾向于“表现”的理念,他在诗词

* 收稿日期:2017-10-05

作者简介: 兰希秀(1977—),男,山东青岛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美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2016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世纪皖籍美学家研究”(SK2016A0815)的阶段性成果。

② 本文对“诗学”作广义上的理解与使用,涵括文学、艺术等文化范围。

③ 方东美去世后,钱钟书说:“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32页。

创作实践中对这一理念贯彻始终,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一理念给予肯定并将之升华。

在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收录的近千首诗词作品中,无论抒情还是叙事、写景还是说理,其中无不传达出诗人强烈的“表现”欲。抒情诗《思京》:“独夜风兼雨,江声咽苦辛。频年万里客,肠断金陵春。”诗中黑夜、风、雨、江声、万里客(异客)五个意象,勾画出一幅动感的画面: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伴随着呜咽的江声,身寄异乡的诗人静坐室中,感叹世事艰辛,思念家乡的美好。这种寂寥而又悲凉的意境,完美地表现出了抗战时期方东美寄居巴渝、远离家所(南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状态。其中首联“独夜”二字,作为“诗眼”,甫一出现便为整首诗的意境定下了寂寞、苦恼、伤悲与凄凉的基调,神似于杜甫《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中“独夜”所传达出的旅人在外漂泊无依的孤寂之境。但是,艰苦的物质生存环境却没有阻挡方东美精神上的洒脱与超然。同一时期,在描写巴渝自然景观的一系列诗词中,方东美为我们展现了“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的理想价值观念以及艺术化生活态度。请看《嘉陵夜色》:“岸灯流影人垂泪,山月回光客沦心。寂历寒江东逝水,盈盈输梦不言深。”复看《歌乐山观云》:“云叠旧山川,巍峨纷在眼。恶风吹不坏,时作红蕖显。”再看《石门侵晓》:“云衣雾褰旧时妆,翠羽明珠倚绿杨。吐纳春词身口意,晓风残月梦中香。”诗中,岸灯、倒影、月光、逝水、翠羽(小鸟)、露珠、山云、绿杨、晓风、残月等自然景色无不濡染人的情彩,与人的泪、心、梦、身、意直接关联一起,景摄含情,情契入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在生命层次上交感呼应、圆融无碍、合和一体。这正是方东美所要建立的自由艺术境界。在这种“天人一体”的大境界中,整个世界艺术化、生命化了,自然与人在生命层面上达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真正地实现了平等自由的交流,其所表征的是方东美在精神气质上对庄子式的逍遥与自由的无限追求。这也恰恰印证了方东美说的“在性情契合上我是道家”^①的身份定位。

抒情、写景都是为了“表现”主体,说理、叙事也是如此。说理诗《美感》:“长对花魂滋美感,更将美艳当花看。缢缦天地饶芳思,词境诗心著处宽。”诗的前两句打破主客二分的隔阂,将主观(美艳)与客观(花)融通;后两句进一步升华至天人关系上,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在文学艺术境界中的理想和谐关系。突破二元对立,实现主客合一,是方东美哲学努力的基本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是方东美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②。而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东美正是通过上述在艺术上创造的理想审美境界来实现的。可见,说理诗也是为了“表现”诗人之“志”(思想)的。继之看叙事诗《空军征倭不掷弹》:“千翼抟空蹶太清,苍茫云海肆长征。香风曳引霓裳舞,壮气砰訇寡寐惊。龙虎将军虚按剑,狐狸丑虏乱如螽。翱翔耻啄天狼肉,暂作蓬莱顶上行。”全诗对空军虚行事件本身轻描淡写,重在彰显空军鹰击长空、睥睨八荒的气势,渲染一种壮志凌云、行气如虹的劲健气氛,透现着诗人对空军霸气豪情的不吝赞美之情。《行营禁乘汽车往歌舞场》:“国破家屯夷乱华,千官犹自拥香车。凭君啼尽伤心泪,争敌后庭一曲花。”通过暗引“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千古名句,生动地描绘出抗战时期达官显贵们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状态,表达了诗人对黎民悲苦生活的关心,对达官贵人们的憎恶与愤恨,表露出诗人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所以,方东美的叙事诗明为叙事,实为达情(志),在叙述过程中往往蕴含着诗人对事件的评价(情与理)。可见,方东美的各类诗词均凸显了诗人的主体存在感。如何使主体在诗中立体地呈现出来,“表现”主体生

①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8页。

②李安泽:《生命理境与形而上学——方东美哲学的阐释与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命的情、意、理于读者,是方东美在诗词创作中的重要考量。

具体经验只有上升为理论才能产生普遍意义。到了中晚年,结合中国传统诗学创作理论,方东美将青年时期的创作方式(方东美百分之八十的诗词作品完成于抗战前及抗战时期^①)升华为“表现论”。在1956年完成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当谈到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时,方东美明确指出,“中国的艺术方法是真正的表现”^②,将“表现”看作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典型方式。但是,方东美眼中的“表现”仅仅是与我们常说的“再现”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或修辞方式吗?当然不是。“‘表现’乃是活泼泼的勾画一切美感对象,它把握了生命的黄金时刻,最擅于捕捉自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③显然,方东美将“表现”看作是一个“美感对象”——艺术本体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把握住了最能彰显艺术对象生命气象与盎然生意的时刻,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构造出种种毫无凿痕、浑然天成的艺术意象,完美地弥合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缝隙。所以,在方东美看来,“表现”是一个艺术创构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其所呈现出的主客体生命之间水乳交融、相互蕴涵的交互状态,以及营构出的虚实不分、圆融和谐的审美境界,直接关联到艺术本体的构成,是艺术本体的内在构成因素。

综上所述,方东美的“表现”论,有方法论和本体论两方面的意义。在艺术方法论层次上,“表现”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对此毋庸置疑亦无须赘言。但是,方东美所说的“表现”,并非仅仅是“诗言志”、“诗缘情”等传统诗论中所谓的情感宣泄,其更加着力于情感的最终薪向——审美境界的营构。对此,方东美指出,“表现”有似于中国艺术中的“传神”,其特点不重写实,而在造境。一方面,创作主体要化除滞碍,对物质性进行否定、超升;另一方面,则以直觉来把握物象,捕捉美的本质,透过“超越常情,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幻想”^④之“思”,创造出艺术审美境界。简言之,“表现”就是透过“艺术性的直观”^⑤,以审美的态度,驰情入幻,融理想于作品,美化现实苦难,表现出生活意趣,幻化出纯美的艺术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方东美所谓的“表现”,显示出艺术本体创构的价值,即“表现”不仅仅是一种与“再现”相对的艺术表达方式,而成为艺术创造审美境界的一个实践过程,直指艺术本质。可见,“表现”即艺术,是方东美“表现”理论的内含之义。这表面上貌似于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观念,实则不同。克罗齐的“表现论”过于强调艺术创作的意识过程,而完全忽略了艺术创作的物态化阶段;方东美则深深地认识到,艺术的价值不只表现于艺术家神奇的构思与幻化境界的构想,更在于艺术家如何以艺术技巧将其示之于众。所以,方东美一方面强调艺术自然是想象和神思的产物,要在创造能够“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的“诗艺化境”;^⑥另一方面,方东美不忘艺术神思只有物化成真正的艺术品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就能泯化一切自然……人类受此感召,更能奋然有兴,振作生命劲气,激发生命狂澜,一旦化为外在形式,即成艺术珍品”^⑦。总而言之,方东美的“表现”论,贯穿了艺术创作从“形之于心”的构思状态到“形之于手”的物化状态整个过程,成为了文艺生产活动的重要枢机,具有了艺术本体层面的价值。

①据笔者统计,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共录存诗词954首,其中作于抗战前有56首,抗战期间有715首,抗战后183首。具体请参阅拙文《方东美与坚白精舍诗集》,《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7页。

③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9页。

④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8页。

⑤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

⑥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

⑦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9页。

二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诗(文学、艺术)是一种“表现”。但是,“表现”总有某种意向性,即它归根结底要指向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那么,诗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诗表现什么,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方东美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让我们先看几首方东美的诗:

款款频相语,飘飘会列仙。碧添春浒涨,圆掬甲文钱。密荫莺声滑,清含旭泽妍。幽情舒缱绻,为舞绮窗前。(《风叶》)

青松老更狂,劲节一身藏。雪澡龙筋瘦,风培鹤骨昂。贞心常傲古,耿性自凝香。春色来天地,掀髯看世妆。(《松》)

冰雪神仙骨,芬氲梦寐姿。欢心披点点,妙相启时时。旭泽催微笑,和风衍静思。虚斋天地阔,缦客养新诗。(《瓶梅》)

朝雾同心者,披诚卫山川。山川欣所遇,含笑发真妍。(《晓》)

以上四首诗向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自然风景:或有风中婆婆之树叶,身姿绰约,如深情之恋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翩翩起舞;或有直入云霄之老松,那傲岸挺拔的身姿,耿介贞心的品性,长髯飘飘的逸态,如青年活力无限,老而弥坚;或有香气弥漫之瓶梅,以不屈的风骨、乐观的心态迎接寒冬的来临,倾说时序的交替变更;或有破晓前之朝雾,如朋友知己,同心无异,“诚”卫山川,宛若君子,破晓后之山川,如旧友再遇,欣喜相逢。通过这些诗,我们看到,整个自然界在诗人眼中是活跃的、积极的,生机盎然的。在这里,自然人格化、生命化了,万物都是生命的载体,一切都透出一种永恒不息的生命精神。在方东美看来,诗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流衍创进的生命精神。

方东美认为,在以美为追求的艺术创造活动中,充分地展露生命机趣,表现生命的盎然生意,是艺术的主要内容与目的。“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及其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①在艺术的世界里,生命的美好与活力得以完美展现,人生可以达所欲生,畅所欲为,苦难化为幸福,丑恶化为美好,生命亦变得丰富而理想。在此意义上,方东美说,“生命正是艺术,艺术富有生命。美的创造为人生根本意义之所在,离却艺术,人生即无以耀露它的自由。美感是生命的节奏,诗人是生命的明灯,艺术有起死回生之伟力”^②。这是方东美对生命与艺术关系的最直接表达。不难看出,方东美所谓“生命即艺术”也即生命与艺术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两者对美的价值共同追求的基础之上,美是生命对真善美价值世界的内在追求,艺术则是对生命在创造活动中所展现出的生命机趣与生香活意的外在形式表现。在这里,美、艺术、生命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理想的价值境界。此境界虽然指向精神,但却是真实的,是每个生命可以亲身体会领悟的,“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③。换言之,唯有亲身体验生命历程,才能获得艺术的、审美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与审美感受,并不是瞬间审美体验式的心理活动,而是一个长期的生命创进活动。因为在方东美看来,美与艺术的根源在于生命的流行变化与创造过程中,“宇宙之美寄予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④。

但是,用艺术表现生命,并不是对具体生命现象进行刻板地描绘,而是“以精神染色相,泯化

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2页。

②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8-149页。

③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1页。

④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5页。

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①。“大生机”指的是个体与宇宙普遍生命之间的水乳交融、交光相网的宏大生命气象,表现在艺术上是“天地大美”的最胜意境。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最早提到“天地大美”的应是管子。管子在《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是管子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构建的一种天人和谐的美好境界。但真正使“天地大美”境界广为人知并作为最高人生境界来追求的则是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基于天人关系与人格修养两个方面,庄子认为,圣人是通过“无为”、“不作”顺其自然的默观审美方式,洞察并欣赏到天地万物“不言”、“不议”、“不说”的无言之理与无言大美。历史上,从原始儒家到宋明新儒家,也都提出过相似于“天地大美”的人生境界,如“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无间”等表达的天人一体关系,实际上都是“天地大美”理想境界的不同表达。那么,“天地大美”的根源又源自哪里呢?显然,管子与庄子认为是建立在天与人的和谐关系(尽管两者在构成和谐关系的方式认知上并不相同)上,儒家则认为是建立在天人之间的先验一体关系上。而方东美在内化儒道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②在这里,方东美表达了两层意思:“天地之美”的载体是生命,并布濩于生命的普遍流行当中;“生命之美”的本质在于“创造”,并呈现在生生不息、创进不已的生命历程之中。很明显,方东美把生命的创进奔流看作是生命的本质精神,而这种生命精神的终极指向是完美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大美”的境界,因为“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直指完美”^③。可见,在方东美看来,美不是外在于生命的,而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这就是所谓的“寄于生命”的意思。作为以美为追求的诗和艺术,其价值正在于对生命盎然生意的呈现,对宇宙生命精神的全面颂扬。这是中国艺术的通性,也是中国艺术的价值理想。

进一步追问,艺术追求的“天地大美”源于生命的不断创进,这种观念是方东美的杜撰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诗学穷究“天地大美”的原因深深地埋藏于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方东美认为,中国艺术家们深通生命与宇宙的直透之法,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能够协和宇宙,参赞化育,人与自然浹而俱化,所以,他们的艺术才能表现宇宙生命的宣泄、生命机趣的表露以及大化流行的描绘。在原始儒家哲学中,方东美发现了宏大的生命气象,发掘出浓浓的生命趣味:老子将生蓄、长育、亨毒与养覆,当作“妙道”与“玄德”的表现,将“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作为道的特性,无不表现出创造性和生生不息之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与“一”作为万物本原有生育万物之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万物依恃“道”与“一”才具生生不已之势。孔子在《周易》中所谓的“万物资始,乃统天”,“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视天有大生之德,地有广生之德,承天地之德,万物才得化育,流衍不息。这些都是宇宙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方东美指出,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具形,化为外在形式,即成为艺术珍品。特别是儒家,其将宇宙人生视为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并将“善”、“美”作为人生的高级价值追求,最终形构成“美善并举”的诗学(艺术)理论。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生命与艺术的同气相求,是双方一

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8页。

②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6页。

③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7页。

体关系的表征。这一点在《礼记·乐记》中得到印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明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些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表明,艺术的兴起源于天地万物的流衍与同化,其中无不透露出宇宙生命的创进不息与生动气韵。据此,方东美认为,儒家对音乐和诗的重视,都是因为“其审美的主要意向都是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而与之合流同化,据以饮其太和,寄其同情”^①。在这个意义上,诗与生命是同一的,是“生命之诗”,也是“诗之生命”。^②

三

从“诗是生命的表现”这个命题中,我们看到了诗的表达对象(内容),但是这个对象——生命,究竟是什么?这个貌似多此一举的问题,实际却是理解方东美生命诗学的关键。

通常,我们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理解生命。从物质层面言,生命是宇宙中能够自我生长、繁衍、进化的一种自然现象,在生化本质上是能够自我复制的氨基酸结构,范围包括细菌、真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从精神层面言,生命是生命体所具有的情感、理性等心理意识。前者关乎物质世界,倾向于生命的物质性,而后者关乎意识世界,倾向于生命的精神性。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在共同认可(或明确或暗合)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的前提下,虽然不同人对生命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例如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牟宗三注重生命的“道德的主体性”,唐君毅关注生命的“道德理性”,徐复观则侧重生命的艺术精神,但是,他们在生命的精神性倾向上是相同的。方东美也是如此。

方东美对生命的精神性薪向首先从他的哲学观缘起。在其早期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方东美认为哲学是对“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境”是生命生存之环境(世界、宇宙),“情”是生命之情感、欲望与冲动,“就境的认识言,哲学须是穷物之理”,“就情的蕴发言,哲学须是尽人之性”。^③可以看出,方东美的哲学定义包含了宇宙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穷物之理”是对外在宇宙的追询,“尽人之性”是对内在人生的要求。方东美不仅把宇宙与人生结纳入同一个学科体系,而且还为它们构建了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建设哲学时,每提到生命之创进,便须连类及于世界;每一论及世界之色法,亦须归根于生命。”^④显然,在方东美看来,宇宙与人生是一体的,他称之为“情理的连续体”、“情理的集团”。^⑤那么,宇宙与生命如何能为一体?方东美给的答案是“情因色有”、“色为情生”。“情因色有”的根据,在于人的生存总要寄身于客观的环境,没有外在物质环境,恰如无皮之毛,无处安附;“色为情生”的根据,在于世界的价值正在于为人生,没有人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人生,假使没有你,知识(笔者按:知识是宇宙之理)又值得什么”^⑥。“情因色有”是铁的事实,“色为情生”则是方东美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审视生命对世界的意义。从这两方面我们看到,宇宙与人生、宇宙与生命是一体的,不可分的,也可以说,宇宙是有生命的。

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0页。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8页。

③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

④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页。

⑤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

⑥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页。

在哲学上将“生命”推广至整个宇宙,已经透出早期方东美在“生命”范畴上的精神性倾向。到了中晚期,方东美立于“万物有生论”的观念,将生命的精神化倾向更加明确化,“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①。在这里,方东美不是在物质实体层面来指称现象中藏着的生命,而是就宇宙中到处都充塞的生命气息或者生命精神而言“生命”。方东美将这种非实指的普泛生命精神名之为“普遍生命”：“中国人的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的活动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②在内容上,“普遍生命”涵盖宇宙有机界与无机界,是物质界与精神界的合一;“‘宇宙’,从我们看来,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毫无隔绝”^③。在实质上,“普遍生命”是宇宙万物机体所展现出的一种创进不息、生生不已的盎然生机与活意,“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广大生机,是一个普遍弥漫的生命活力,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无一处不在流动贯通”^④。

以上方东美对“普遍生命”概念的直接使用,使我们在感性层次上对其有了初步的认知。真正让我们对“普遍生命”有深刻理解的,是方东美基于原始儒道“生生”哲学与“大道”哲学基础上对“普遍生命”的进一步阐发。在1937年《哲学三慧》一文中,方东美用简洁至极的语言点出中国哲学的六大原理,其中“生之理”即“普遍生命”的主旨与五点“要义”：“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趣时显用,亦动亦静。生含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⑤这一原理在方东美晚期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深化。

第一,育种成性义。“育种成性”是指“普遍生命”具有创造生命的功能,可简称为“创生”义。具体而言,普遍生命虽然“无方无体”,但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机”^⑥,却与“大道”共同一体流衍化行,具有本体功能,成为生命的源泉。自微观方面,一草一木,一物一人,从种子、胚胎到出生、长成,从如日中天到夕阳暮年,生命由微及著,由小到大,赓续连绵,其中时时蕴含着盎然生意,勃勃生机,这是“普遍生命”的功能;自宏观方面,动物、植物、人类整个族类生命的繁衍生息,及至各种生命的演变进化,再推至整个宇宙的形成,这是“普遍生命”的流行。所以,无论大小与种态,在普遍生命精神的贯注中,各类生命都显示出一种本源式的生命创造力,并使宇宙万物都充满生气与生机,宋代大儒程颢所谓“天地生物气象”即是。

第二,开物成务义。所谓“开物成务”,指“普遍生命”把化育万物作为自己的使命与事业,孜孜不已,亹亹不穷。这可称为“普遍生命”的“广生”义。详言之,乾元坤元同属“大道”,乾元“资始”,主创造,坤元“资生”,主涵养,两者合之,则意味着生命的生成开展。生命淡化“大道”,从“大道”中汲取营养,获取永不枯竭之创造力与周济万物之化育力,不断拓展生命宽度,提升生命价值。即使生命在发展中遇到羁绊与阻碍,也可“返初复始,会归大道”^⑦,寻找到解决的办法,终归实现自我价值与意义。这是方东美所谓的“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

第三,创进不息义。“创进不息”,突出生命在时间之流中向前进展、一往无遏的绵延状态,

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页。

②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页。

③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5页。

④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页。

⑤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2页。

⑥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4页。

⑦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8页。

可称为“普遍生命”的“继生”义(“继”意为持续不断,《周易·离卦》有“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普遍生命弥漫于整个宇宙系统,一方面横向空间拓展,扩大生命种类,增加生命数量;另一方面纵向时间延伸,增益生命价值,提升生命质量。就时间向度而言,生命创造不息,前后相续,从不间断,构成无穷持续的时间序列。生命之流,原其始,可追根溯源到无穷的过去,要其终,则延展趋向无尽的未来;而终始之间,正是生命绵延不断的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从原始萌芽到成长壮大,从不完善趋于完善,“如是而新新不已,以迄一切摄归性海”^①。

第四,变化通几义。“变化通几”,意为在生命变化过程中不断萌发出新生命,强调生命流行的创新性,可简称为“普遍生命”的“新生”义。生命之流与时间之流合而为一,绵延无穷,不存在停滞的空间化瞬间即“影像化的时间”(柏格森),亦不存在暂停片刻的活的生命,一切存在都在持续的绵延中潜移默化,变变不停,恰如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言“变”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时,与时间合体的生命之流并不只是简单量的积累,而总是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在扬弃旧时自我的同时,拥获质变后的新生。如方东美所说:“盖万物后先递承,绵延不断,先往者,刹刹现于前,旋成历史之陈迹;后继者,亹亹出于后,不啻时间之新蕾。其营育成化,先后交奏,而生生不已;其进退得丧,更迭相酬,而新新不停。”^②但是,与时间系于一体的“普遍生命”,其变化呈现出多样性或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线性或平面单维的流动,而是弥贯万物、充塞天地的立体式蔓延,所以方东美才说普遍生命“无方无体”。同时,也正是因此,生命的创造才层出不穷,无限拓展,体现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伟大。

第五,绵延不朽义。“绵延不朽”,强调生命非静而动、生生不已的永恒情态,这是“普遍生命”的“恒生”义。首先,宇宙包罗万象、生机无限,无时不发育创造,无处不流动贯通,其中蕴藏的生命创造活力一往无前,除旧立新,总呈现出一种“未济”的动态。这是“不朽”的第一义。其次,生命的创进过程是现实可见的,存在于此世的生生创造之中,是“当下可成的”^③,并不在于彼岸世界的神性永恒。“当下可成”显示出了生命创进的现世性与现实性。这是“不朽”的第二义。再次,生命“不朽”的第三义,表现于生命价值的永恒,“生命之不朽,即价值之不朽”^④。这种“不朽”价值,来源于生命潜能被激发后喷薄而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神的恩典所赐”^⑤。一方面,人类激发生命潜能,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实现生命价值。另一方面,人生而具有神性,因为神性才成就了人性的伟大,方东美常说“to be human is to be divine”^⑥(译文:要做人,就要成就他的神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方东美所谓的神性并不是位格神,而是源自于“大道”的创生力量。“在中国哲学里,人源于神性,而此神性乃是无穷的创造力,它范围天地,而且是生生不息的。”^⑦可见,造物者通过生命表现其创造力,并在创造活动中完成不朽的价值,正是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以及“通往精神价值宝地的智慧之门”^⑧。

“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即其在时间进程中显示出的“创生”、“广生”、“继生”、“新生”、“恒生”五种功能,将“普遍生命”范畴的主要特征呈现了出来:本源性,创造性,创进性,价值性,精神

①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

②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

③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4页。

④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

⑤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页。

⑥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页。

⑦方东美:《生生之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4页。

⑧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页。

性,不朽性。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普遍生命是一种以实现生命理想价值为旨归,绵延不息于宇宙中的生命创造力和生命精神。

要之,方东美的“生命”范畴,在内容上,涵括了整个有机界和无机界;在实质上,“生命”更多是由“普遍生命”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与“生意”,是一种生命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命。把实体生命精神化、虚指化,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成为方东美生命哲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方东美用“艺术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观念不可分的。在构建中国人的艺术理想时,方东美指出:“中国人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必先是艺术家,我们对事情的观察,往往是直透美的本质。”^①因此,用审美、艺术的方式来透视宇宙与生命,在方东美看来是中国人认识宇宙与人生最重要的方式。据此,生命(普遍生命)精神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对此,同样主张“生命美学”的宗白华有着类似的诗学理论观点:“我以为文学底实际,本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流露喷射出的一种艺术工具,用以反映人类精神生命中真实的活动状态。简单言之,文学自体就是人类精神生命中一段的实现,用以表写世界人生全部的精神生命。所以诗人底文艺,当以诗人个性中真实的精神生命为出发点,以宇宙全部的精神生命为总对象。文学的实现,就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实现。文学的内容,就是以一种精神生活为内容。”^②

“诗(艺术)是生命(精神)的表现”这一命题的意义在于,把诗的表现内容(对象)从传统的情感(诗言情、诗缘情)推广到更具普遍性的“含情”且能“契理”的生命(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大大拓宽了诗的表现域,使诗在精神内涵上与哲学、宗教具有了共通性,并使整个文化在生命的基础上构成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系。

Poems Are the Expression of Life: a Study on the Poetic Thoughts of Fang Dongmei

Lan Xixiu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Fang Dongme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poems, this paper presents Fang's idea of poetics: poems are the expression of life. The expression is not only expressing itself, but also directing the poem itself; life is not the body, but a kind of spirit of life, which is called universal life by Fang Dongmei. The universal life, aiming at the ideal value of life, is essentially the continuously creative power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The five points of universal life are the five functions including creating life, enlarging life, continuing life, refreshing life, and enduring life.

Key words: poetics; expression; life; universal life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2页。

②《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山东疫苗案”为例^{*①}

张 贝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摘要: 我国传统媒体时代一元化的舆论引导模式,已逐步被多元化、全方位、多层级的舆论引导格局所取代,各舆论引导主体联系更为紧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格局。这一方面为新时期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全新路径;另一方面,主体间互动博弈升级给凝聚舆论引导合力带来新的挑战。因而,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提出破解舆论引导主体要素结构协同阻滞的对策,以期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

关键词: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114-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2

当前,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受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潜力,让数以亿计的“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表达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民间舆论场,建构了公共舆论监督中心,客观上推动了舆论引导方式的转变和舆论引导格局的变革。这一方面为党和政府执政理念、施政方针的向下传输与民意民情、热点焦点事件的向上传递提供了全新路径和渠道;另一方面,由于舆论引导主体对新格局的不适应和对差异化角色定位的模糊认识,各主体未能在实践层面实现层级化、多元化、系统性的有效引导,主体间协同不力带来的协同失序问题在客观上加深了舆论冲突的强度和广度,造成了舆论引导工作难以开展,给新时期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构建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的协同论视角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涉及要素复杂多元,其“效”的达成根植于诸要素的互动博弈和动态制衡。舆论引导主体作为系统动力机制的重要推动力,是构建和谐共生的舆论引导协同机制的核心力量,主体间要素和结构的协同程度是关系协同效能发挥的关键。协同论认为,在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子系统通过协作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通过序参数的引导机制推动系统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新的有序的转变^②,这为破解当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失序问题提供了理论遵循。协同论的核心问题是秩序,即研究秩序是如何通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作而建立的。而构建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正是研究优化子系统间的协同以实现系统效能最大化的问题。

作为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度量,序参数主宰着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对于舆论形成过程中

* 收稿日期:2017-10-20

作者简介:张贝(1986—),女,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广播影视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提升广播电视新闻宣传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研究”(GD1702)的阶段性成果。

②王贵友:《从混沌到有序——协同论简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5页。

的序参数,哈肯作了如下立论:“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数的作用,它支配着个人的意见,强制形成一种大体上是一致的舆论,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①通过演绎分析,他将舆论形成过程即意见改变过程中的序参数定义为“占主导地位的舆论”^②,并认为个人意见受到大众传播媒介和政府“子系统”的支配。对于媒体和舆论序参数的相互关系,哈肯强调指出,媒体起着序参数的作用,通过所表达的意见影响读者意见。

当前,我国多元化、层级化舆论引导格局已逐步形成。横向层面,覆盖党和政府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权力机关、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纵向层面,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格局初步确立。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大众传播媒介与序参数(占主导地位的舆论)之间的博弈演化为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四者与序参数的博弈,主体间存在竞合和制衡关系,四大主体与序参数也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作用关系更为复杂,动力机制更为多元。按照哈肯对于序参数的定义,舆论引导格局下序参数的产生和演化机制遵循如下路径: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主体中,子系统内部通过竞合产生“占主导地位的舆论”,随后各序参数通过互动博弈,最终产生整个舆论引导主体系统的序参数。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系统之“序”呈现出不同图景,表征为舆论引导主体差异化的演化机制和协同路径。

二、研究方法

突发事件中,各主体的报道框架是凝聚了集体智慧的选择。作为新闻文本的中心内容,框架通过选择、突出、重构、添加细节元素,彰显了鲜明的主体特色,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倾向。本文基于框架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各舆论引导主体在议题分布、关键词符号呈现以及信息源交叉引用情况,深入分析各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演化过程,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这一序参数在各主体间的互动作用下产生意见的特定分布情况。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山东疫苗案”为例,借助知微数据平台对“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18 省份”事件下的数据库进行提取分析。^③由于数据中的微博数据库基于用户注册信息已对用户类别和性质进行了初步分类,为事件的主体划分提供了一定基础,因此本文提取微博数据库作为研究对象。该数据库的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4 月 1 日(如图 1),其中,微博传播趋势和传播趋势(包括网媒、微信、微博数据)舆情走势基本吻合,对研究事件的整个舆情演变发展具有典型性意义。

通过数据提取,共获取微博数据样本数共计 7873 条。^④首先,在数据现有博主分类(政府、媒体、名人、达人、企业、团体、普通用户等)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合并、删减、分组、调整,剔除其余无关博主,将博主类型归纳为政府、媒体、意见领袖、社会组织四类,确定样本数为 6887 的基础数据库,四类主体的样本数分别为 780、3481、425、2174。随后,分别对其按照时间发布顺序进行编码分类,按照 10% 的抽样比例对数据进行抽样,获得包含 688 个样本的数据库,四类主体的样

①[德]赫尔曼·哈肯:《协同论: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第 130 页。

②[德]赫尔曼·哈肯:《协同论: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第 137 页。

③知微数据共享平台:《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18 省份》, [EB/OL] <http://ef.zhiweidata.com/#!/event/56ebdbbbe4b0f72862ccccf57/trend>.

④知微数据提供的微博数据来源并非微博平台全部样本,是知微平台通过粉丝数、能带来二次转发量等一系列指标定义后确定的“高影响力账号”发布内容的集合。

本数分别为 78、348、45、217。根据突发事件演化周期中各个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各阶段涌现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突发事件划分为潜伏期、引爆期、高涨期、消散期四个阶段,并依据各阶段舆论引导主体协同关系的变化,将事件划分为四个周期:协同识别期(2 月 2 日-3 月 18 日)、协同触发期(3 月 18-22 日)、协同深化期(3 月 22-28 日)、协同调整期:(3 月 28 日-4 月 1 日)。

(二) 议题划分

对各主体在参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过程中的报道轨迹作框架分析,是探究各主体协同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指示序参数生成、演化的有效方式。恩特曼认为,框架存在于传播过程的传者、文本、受者、文化四个环节之中,框架牵涉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即将事件中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解决万案。^① 塞米科和法尔肯堡通过对政治传播进行梳理,总结了欧美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五类框架,即冲突框架、情感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和经济影响框架。为明确勾勒出新闻文本的框架,坦卡特等研究者提出了涵盖新闻标题、图片、图片说明、导语、信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所属系列标识、数据图表和结论共 11 个指标的“框架列表”(list of frames)。^② 结合“山东疫苗案”的发展演变过程,本文在认真梳理阅读的基础上,将各主体新闻报道呈现的议题框架划分为案情进展、责任归因、情绪宣泄、医学科普、谣言澄清五类;通过数据统计,审视各主体在议题分布中的契合度和差异性。

三、媒体驱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通过对各舆论引导主体动态演化分析可知,媒体在主体协同的关键环节扮演了序参数的角色,推进了政府、社会组织、意见领袖对于事件的被动和主动参与,在协同演化的不同阶段通过序参数作用机制,有效弥合了主体间的分歧,形成了媒体驱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如图 2)。具体来看,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在议题和关键词分布中,与媒体呈现较为密切的相关性。而政府面对媒体强势的真相挖掘机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推动了线下问题的快速处理。通过对各主体在协同各个阶段消息来源的样本交叉统计可知,媒体自协同触发期,就成为第一消息来源,对其他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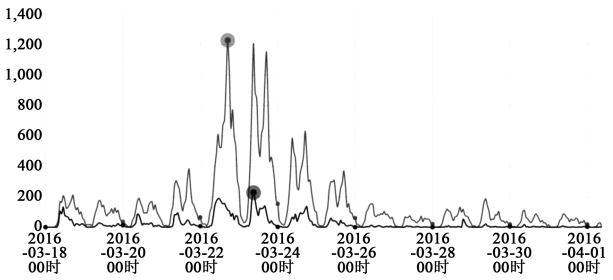


图 1 “山东疫苗案”舆情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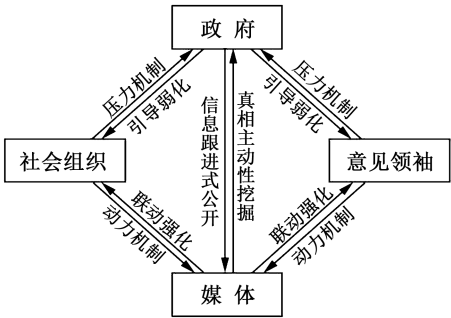


图 2 媒体驱动型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模型图

而政府面对媒体强势的真相挖掘机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推动了线下问题的快速处理。通过对各主体在协同各个阶段消息来源的样本交叉统计可知,媒体自协同触发期,就成为第一消息来源,对其他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表 1)。

^①Entman, R.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 51-58.
^②Tankard, Jr., J.W.. The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Framing, in Reese, S. D., Grandy, O., and Grant, Jr. A. E.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95-106

表 1 “山东疫苗案”消息来源交叉制表(计数)

	消息来源						合计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其他		
主体分类	政府	45	30	3	0	0	78
	媒体	27	312	1	2	6	348
	社会组织	1	5	29	4	6	45
	意见领袖	5	75	3	121	13	217
合计		78	422	36	127	25	688

(一)协同识别期(2月2日—3月18日):传统媒体报道提供协同线索

“山东疫苗案”是2015年4月由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药品犯罪案件。2016年2月2日,济南警方向媒体通报此案后,央广网以《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苗案,涉国内24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①为题最早进行报道。新闻发布后,新华网、环球网、中国青年网、凤凰网、搜狐、四川在线、大众网等上百家媒体予以关注,以原文转载方式进行报道。此外,315晚会曝光的多起食药监领域安全事件因涉及儿童弱势群体,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对舆情的迅速发酵起到一定的驱动作用。^②

(二)协同触发期(3月18-22日):主流媒体报道引发热议,序参数作用显现

在央广网发布报道后数日内,舆论经历了较为平静的协同识别期。3月18日,澎湃新闻新闻网刊发题为《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现已删除)的报道,将这一案件再次推送至公众视野。在语境重构的过程中,澎湃通过删除、添加、替换和重置要素顺序^③,实现了与原报道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具体而言,在报道题材上,选取曝光监督类批评性报道;在核心要素上,将专家引语“或影响人命”置入新闻标题;对涉案主体、疫苗存运、涉案地区、危害影响等核心要素通过“胆子很大”“这是在杀人”“超温存放,违规配送”等关键词予以串联叙述;对案件破获时间和处置情况弱化处理,赋予静态的典型案情通报类报道以动态性和感染力。澎湃新闻报道刊发后,旋即引发各大媒体、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的广泛转发。随后,澎湃新闻于12时、13时、21时三个时间点,连续发布系列报道,聚焦犯罪分子庞某,问责食药监和卫生防疫部门监管缺失问题,进一步助推了舆情的高涨。当日20时之前,对于事件的传播以“跟随式”转载为主,包括@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头条新闻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对该报道转发、推送,多数为原文直接转发。对于信息未加甄别和评论的“跟随式”转发,使这一有失客观公允的报道,通过媒体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遍在效果,深刻影响公众对意见气候的感知。政府主体层面,山东各相关部门陆续公开案件信息,为媒体报道提供第一手信源;省级层面的上海卫计委、江苏食药监局、浙江疾控中心,市级层面的深圳市疾控中心等通过地方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微先后予以回应,但由于预警机制不健全,缺乏区域联动和受众互动意识,单向度、自上而下告知式的“自我言说”舆论引导效果甚微。

据知微平台抽取的各主体微博数据在协同触发期的议题统计情况(如图3)显示,在协同触发期,媒体声量远大于其他主体,其议题分布主要集中于案情进展这一框架,启动了对于政府部

①央广网:《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苗案 涉国内24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EB/OL].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60202/t20160202_521306266.shtml. 2016-02-02/2017-10-22.

②杨长春、袁敏在《基于交互关系的突发事件热度预测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山东非法疫苗案与2010年的“山西疫苗事件”、2013年“乙肝疫苗致人死亡事件”以及315晚会曝光的义齿事件存在舆情交互现象。

③Wodak,R.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in EU-meetings about employment policies. 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185-206.

门的真相挖掘机制。

作为议题框架的具象体现,关键词的分布体现了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三方关注焦点的契合度(表 2)。对比可知,政府主体中出现的与“疾控”“警方”等词相关的既有经验报道和疾控中心处置动态在媒体等主体中较少涉及;而媒体中占比较高的“死亡”“儿童”等关键词在政府主体中较少被提及,相反,在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主体中位于相对靠前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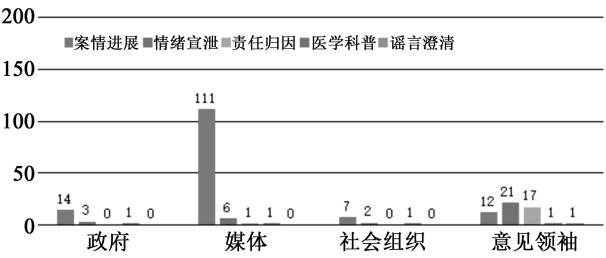


图 3 协同触发期各主体议题分布情况

表 2 协同触发期各主体关键词分布及词频统计①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疫苗	410	0.953	疫苗	685	0.563	疫苗	31	0.973	疫苗	1040	0.943
非法	81	0.433	冷链	227	0.187	冷链	8	0.602	流入	207	0.364
流入	80	0.428	流入	220	0.181	非法	7	0.541	死亡	117	0.206
疾控	61	0.326	非法	211	0.174	调查组	7	0.357	接种	111	0.195
问题	61	0.326	省市	210	0.173	案件	6	0.337	问题	107	0.188
接种	37	0.198	死亡	209	0.172	事件	5	0.306	涉及	97	0.170
警方	34	0.182	成人	190	0.156	成立	3	0.306	线索	85	0.149
涉案	33	0.176	涉案	189	0.155	卫生局	3	0.296	儿童	80	0.141
线索	33	0.176	儿童	183	0.150	流入	3	0.265	疾控	61	0.107
冷链	24	0.128	母女	170	0.140	骗子	3	0.265	冷链	57	0.100

(三)协同深化期(3月22-28日):理性声音卷入“沉默的螺旋”,序参数驱动力进一步增强
 在疫苗事件的第二阶段,社会争论主要围绕“疫苗之殇”展开。3月22日,一篇名为《疫苗之殇:你沉默,你就是帮凶》的文章在新媒体平台广泛转发,引发舆论的全面高涨,推进各主体进入协同深化期。报道将记者郭现中2013年撰写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②的部分文字、图片“嫁接”到“山东疫苗案”中,通过镜头特写大量展示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的悲惨境况,结合煽情化的表达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自危意识。在“点击即权力”的逻辑下,一系列类似“标题党”文章在微信平台大规模转发;与此同时,部分意见领袖从理性角度出发,澄清“疫苗之殇”与疫苗案之间的不当关联,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社会争论。

一方面,政府主体在序参数真相挖掘机制的作用下,逐步摆脱被动协同,以3月22日为转折点,国务院、最高检、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卫计委、公安部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省高检等中央和省级部门先后作出回应,与媒体积极联动开展主动议程设置。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公共卫生领域权威机构,于3月22、24、25日三次就疫苗安全问题公开信息,回应公众质疑和诉求,形成了对于疫苗不实报道的对冲,发挥了舆论纠偏作用。

另一方面,部分专业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激浊扬清,有效疏导非理性情绪。由于《疫苗之殇》涉及诸多儿童注射疫苗致残的案例,引发了受众对于疫苗接种的深度恐慌。部分明星大V,如@贾乃亮、@李冰冰也针对疫苗事件发声,但都为情绪化的呼吁,呼吁严惩倒卖疫苗者,认为犯

①关键词的统计运用“词频统计工具 V2.8”对知微的微博全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统计。
 ②郭现中:《疫苗之殇》,《南方都市报》2013 年 6 月 23 日。

罪分子“该死一百回不足惜”。极端的表达、激烈的言辞,进一步助推了恐慌、愤怒情绪和负面舆论的高涨。与此同时,部分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知识的意见领袖积极发声,对冲舆论场中的非理性声音,为消除公众尤其是家长的迷茫恐慌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知微平台抽取的各主体微博数据在协同触发期的议题(如图4)和关键词分布情况(如表3)显示,在协同深化期,媒体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其议题分布除涉及案情进展之外,更多转向责任归因深层次问题,同时积极发布医学科普相关文章,对冲网络空间的各类谣言。在意见领袖这一群体,情绪宣泄、责任归因成为主要议题,抵消了非理性情绪下对舆论的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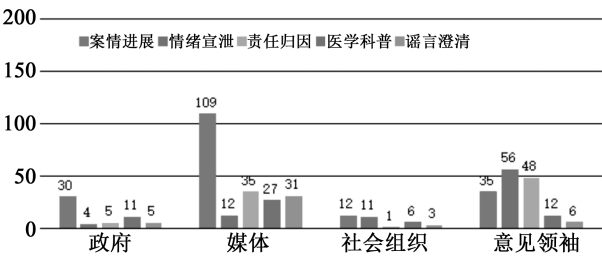


图4 协同深化期各主体议题分布情况

表3 协同深化期各主体关键词分布及词频统计

政府			媒体			社会组织			意见领袖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关键词	频次	频占比
疫苗	1375	0.975	疫苗	4417	0.983	疫苗	950	0.955	疫苗	1872	0.915
问题	507	0.876	非法	1491	0.686	问题	232	0.622	问题	400	0.257
非法	368	0.636	问题	1278	0.588	非法	227	0.609	非法	335	0.216
接种	226	0.390	涉案	878	0.404	孩子	111	0.298	严惩	272	0.175
回应	184	0.318	药品	676	0.311	接种	99	0.265	事件	247	0.159
关心	169	0.292	接种	555	0.255	事件	97	0.260	孩子	240	0.154
总局	148	0.256	流入	544	0.250	关注	82	0.220	接种	148	0.095
涉案	117	0.202	总局	483	0.222	流入	80	0.214	药品	126	0.081
流入	114	0.197	嫌疑人	378	0.174	涉案	62	0.166	流入	91	0.059
人员	102	0.176	人员	359	0.165	人员	47	0.126	涉案	90	0.058

结合协同深化期关键词的分布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对案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跟进,政府、媒体两大主体的议题关注和关键词分布趋向一致。在意见领袖主体中,由于“情绪宣泄”议题框架占比较高,相关关键词如“严惩”、“孩子”等反映了其对疫苗犯罪行为的愤怒和不满。

(四)协同调整期(3月28日-4月1日):政府媒体权威释疑推动舆论趋稳

3月28日,国务院成立“山东疫苗案”联合调查组和工作督查组,对调查工作进行全程督查指导,确保调查及督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在心理疏导方面,业内专家学者就疫苗安全性问题持续回答记者提问;@世界卫生组织自协同触发期发布48条疫苗信息,从鉴定到判断、从谣言到事实,逐一澄清;而对于网络谣言和不法分子,政府则给予严厉打击和警示。纵观整个事件相关部门的权威发声和中央媒体的权威释疑,对“疫苗之殇”的争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协同调整期各主体的议题和关键词分布显示,随着舆论声量逐步走低,各主体关注焦点转向对问题的全面反思和对政策制度创新的期盼,舆论场交锋逐步平息。

四、反思及建议

在“山东疫苗案”中,媒体报道将“山东疫苗案”推入公众视野,曝光了我国二类疫苗流通中的监管漏洞。公众对于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引发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和跟进,媒体驱动下的舆论合力作用于公共政策领域,仅历时26天就催生了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对我

国疫苗行业未来的规划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层面,媒体序参数驱动下的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推动了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的有效互动。具体来看,一方面,受制于媒体真相挖掘机制的驱动作用,政府密集发声,高层行动不断跟进,推进了问题的有效处理,缩短了这一公共卫生领域典型案例舆论引导的进程;另一方面,反观各舆论引导主体,由于主体差异化作用发挥受限,客观上阻滞了舆论引导合力的形成。

一件药品非法经营案逐步演化为国际性的疫苗安全事件,值得处于舆论引导格局中的各主体深思。而处理事件的经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训,也为完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转变思维模式,提升协同效能。以政府为首的舆论引导主体,应突破以“规范思维”为主导的静态固化理念,运用“关联思维”构建动态协同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发声,激发舆论引导主体的活力,全面提升主体间协同效能。其次,科学设置议题,畅通协同路径。突发事件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协同机制,是各主体围绕序参数形成的动态竞合机制,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抢占舆论引导主阵地,需在主体协同各时期,针对舆论发展的不同特点,科学合理设置差异化议题,深化全方位多角度报道,构建公众对于议题的深层次价值认知。再次,加强资源共享,拓展协同空间。提高舆论引导主体的交互意识,通过建立线上线下联动、跨行业跨部门互动、跨层级跨地区统筹,推进信息交互和资源共享。提升以政府为主导的舆论引导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

Synergy Mechanism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Major Contingencies

——Based on the Shandong Vaccine Case

Zhang Bei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the centralize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the era of traditional media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at of the diversified,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which the main bodi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r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nd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It, on one hand,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and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resolution of crises in major contingenc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brings difficulties and new challenges to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major contingencie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worth to make further research and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cop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ain bodi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to establish a more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synergy mechanism for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 words: major contingencies; main bodie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ynergy mechanism

责任编辑:孙昕光

“一言不合就 XY”从语法构式到 修辞构式的演变^{*①}

孟祥英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3)

摘要: 根据嵌入“一言不合就 XY”构式的成分的特点,可以把“一言不合就动手”类的称为语法构式,把 2016 年新兴的“一言不合就任性”类的称为修辞构式。“一言不合就 XY”在由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点:嵌入成分扩大,“一言不合”的语义泛化,事件参与主体由双向性到单向性转变、由指人名词拓展到指物名词。在具体运用中,修辞构式还采用连续使用、构式仿拟(仿出“二言不合就 XY”、“二话不说就 XY”)、嵌入项重叠(VVV 形式)等手段,来表达言说者的主观态度、主观情感。修辞构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爆炸方式扩散开来,与这一构式自身的表义特点密切相关,也与网民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化的心理有关。

关键词: “一言不合就 XY”构式;语法构式;修辞构式;承继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12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3

一、引言

“一言不合就 XY”是 2016 年的十大流行语之一。如:

(1) 一言不合就任性! 美国男子推 5 独轮车装 30 万枚硬币缴税(中国日报网, 20170114)

(2) 跳槽,在今天的职场中已是司空见惯。而作为职场生力军的 90 后,似乎更给人留下了一言不合就跳槽的印象。(中国经济网,20160902)

(3) 返乡过大年:亲戚聊天 一言不合就催二孩(半岛都市报,20170203)

(4) 老婆这样的脾气我真是醉了,一言不合就要出去逛街买东西。(腾讯视频, 20170303)

(5) 一言不合就时尚:SUGAR 糖果时尚手机(凤凰资讯,20160629)

(6) 今夏最后一天:惊天一雷,济南一言不合就大雨(凤凰资讯,20160806)

从形式上来看,这一构式由固定项“一言不合就”和嵌入项“XY”构成,属于后嵌式构式。作为流行性框填的一种,它具有短时性、高频性和能产性等特点。通过搜索百度网、搜狐网、凤凰网、中国知网等,得到 218 个具体示例。我们发现,无论是搭配对象还是构式义,新兴构式与传统

* 收稿日期:2017-05-01

作者简介:孟祥英(1975—),女,山东肥城人,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当代汉语新兴语法构式研究”(J17RA031)的阶段性成果。

的构式(如“一言不合就动手、一言不合就打架、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等)都有明显不同。本文将对这一构式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过程、修辞构式表达主观性的手段以及修辞构式的流行动因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二、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

根据 Goldberg(1995)的构式语法理论,构式指的是语言中固定的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①刘大为(2010)将构式分为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具有可推导性的是语法构式,当新的表达动因作为构式义加在语法构式上时破坏了构式的推导性而形成的具有不可推导性的是修辞构式。”^②基于以上定义,我们把“一言不合就动手”类的构式称之为语法构式,将新兴的“一言不合就任性”类的称为修辞构式。

(一)作为语法构式的“一言不合就XY”

传统的“一言不合就XY”构式是一个语法构式,因为“一言不合”和“就XY”之间语义明晰,结构关系松散,具有可推导性,其中嵌入的多是表示冲突性事件(尤其是暴力性事件)的词语。如:

(7)为什么土耳其一言不合就搞“军事政变”? (网易财经,20160716)

(8)一言不合就被砍? 我们的差评权谁来保障? (央视新闻,20170717)

通过检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我们发现,这一构式在古代汉语中初见雏形。在得到的48条语料中:“一言不合”以逗号的形式与后接小句间隔开来的居多,有40条,而“一言不合就(便)XY”仅8条。“一言不合”最早出现在唐代李颀的诗歌——《别梁锜》中:“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弃。”含有“一言不合”的语法构式在古代汉语部分的具体分布如下:唐代1条,宋代3条,明代3条,其余的41条出现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如:

(9)王珙……为政苛暴,多猜忌,残忍好杀,不以生命为意,内至妻孥宗属,外则宾幕将吏,一言不合,则五毒将施,鞭笞剗断,无日无之。(宋《旧五代史》)

(10)时八郡骚扰,陈参政方事兴复,光总藩幕,独寥寥持正,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岂贪禄者哉!”(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11)杨仁先自不语,后来便说:“要我依顺,也须好好相劝,怎么一言不合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清·无垢道人《八仙得道》)

现代汉语继承了古代汉语的用法,在31条语料中,有29条描写的是冲突性事件。如:

(12)好莱坞明星们的婚姻十分随便,兴之所至就可以结为夫妇,恩恩爱爱;一言不合就立即分手,形同陌路。(《人民政协报》)

(13)萧军身上有种绿林好汉的“血气之勇”,有时一言不合便可能拍案而怒,不畏惧什么权威。(邢富君《毛泽东与文坛名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汉语中有2例,与新兴用法相关。如:

(14)那个姓陶的,不看风使舵,白有他的理想,一言不合就拍拍屁股辞职,结果呢?(梁凤仪《金融大风暴》)

(15)偏偏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的就

①[美]Adele E. Goldberg:《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②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期。

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白先勇《孽子》)

例(14)中,“一言不合就拍拍屁股辞职”,描写的不是冲突性事件,其主语不涉及事件参与双方,仅涉及一个主体(“那个姓陶的”);例(15)亦如此。在此,新兴构式初见端倪,但嵌入的成分具有单一性,只有动词性成分,而无其他。

在语法构式中,固定项“一言不合”的意义比较实在。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对客观世界的折射。依据惯常思维,“一言不合就”后多跟的是“动手、打架、拔刀相向”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短时性]等特征。既然是冲突,就必然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参与者;而一个事件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几个环节。因此,这一事件基本的框架模式是:双方(或多方)交谈——话不投机——大打出手。事件爆发的突然性、动作性突出,“一言不合”和其后的嵌入项具有先后性,在时间上紧密相接,语义关系清晰,多为条件复句、假设复句或因果复句,“只要一言不合就 XY”、“如果一言不合就 XY”或者“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 XY”。

作为语法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XY”与传统的“一 X 就 Y”构式存在着语义上的继承性,王弘宇(2001)指出,“一……就……”格式内部两项之间具有紧随关系和倚变关系。^①如:

(16)她一进门就哭了起来。(引自王弘宇)

(17)绿色的丛林底下,仙人掌疯狂地生长,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荆棘的陷阱。(同上)

例(16)中“进门”和“哭了起来”两个动作是紧接着发生的,两个动作只有先后关系,没有其他关系;例(17)中,只要“不小心”,就必然会紧随着出现“掉进荆棘的陷阱”的结果,两项之间是倚变关系。我们认为,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XY”是对“一 X 就 Y”倚变关系的一种继承。如:

(18)关于他的汇报几乎就像新闻联播一般;必有更新,且内容充实。比如:和同学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一生气就把凳子砸烂。(廖美华《区分观察与评论,走好沟通第一步》,《中小学德育》2014年11期)

(19)枣庄:“一言不合”就放火烧房 滕州这俩少妇火气真大(凤凰资讯,20160909)

在例(18)中,“一言不合”和“大打出手”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和逻辑上的倚变性,“只要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或者“如果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前为条件复句,后为假设复句,表示事情还未发生;在例(19)中,因为“一言不合”导致“放火烧房”,事情已经发生,是因果复句,具有评价义,具体地说明“俩少妇火气真大”。

综上所述,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XY”具备如下特性:第一,句子的主语是施事性强的指人名词;第二,XY是具有强动作性的自主动词,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短时性;第三,构式有一种强结果义,即在具体事件中,“一言不合”后必然地会产生一个结果 XY。因此,这一构式只有肯定形式,而没有否定形式,这一特点也被新兴的修辞构式所继承。如:

一言不合就动手 *一言不合就不动手

一言不合就跳舞 *一言不合就不跳舞

一言不合就下雨 *一言不合就没下雨

很显然,加*的短语是不成立的。

(二)作为修辞构式的“一言不合就 XY”

在当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言不合就 XY”是一类修辞构式,其构式义无法从其构成成分“一言不合”和“XY”自身的意义上推知,因此它具有不可推导性。陈文博(2016)指出:“语法构式变

^①王弘宇:《说“一 A 就 C”》,《中国语文》2001年第2期。

为修辞构式是一种句式的语法化,是一种因语义结构或语义关系的衍生而由实(表具体、实在语义的句子)到虚(表抽象概括义的句子)的过程,是由表示指称客观事物与逻辑关系的句子变为表达某种特定语用效果和特定语义关系的句子。”^①作为修辞构式的“一言不合就XY”,与语法构式比较,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嵌入成分扩大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修辞构式的嵌入成分更加多样,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出言说者思维的灵活性和言语的创新性。

第一,从词性来看,语法构式中嵌入的仅是动词性成分,结构上都较为简单;而修辞构式除了能嵌动词性成分,还可以嵌入形容词和名词等其他成分。

A. 一言不合就+动词性成分。其中,动词以双音节动词为主;动词性短语的形式比较多样,既有主谓短语、动宾短语、状中短语、联合短语等一般短语,也有结构上更为复杂的连谓短语、兼语短语等。如:

(20) 盛夏到了……大家都是一言不合就健身,恨不得马上把脂肪摄入量减到零。(中国质量新闻网,20160826)

(21) 父母为孩子主动做出积极的榜样示范,供他观察和学习。坏家庭一言不合就怒气弥漫,父母通常霸道强势,说一不二,把孩子逼进死胡同,教育效果事倍功半。(全球加盟网,20170309)

(22) 张继科,一个一言不合就写诗的美男子(华西都市报,20160821)

(23) 一言不合就摆 POSE,白浅和夜华要气死导演了!(橘子娱乐,20170219)

(24) 来伊贝诗保湿节 网红一言不合就和闺蜜拼了(新浪时尚,20161110)

(25) 由于拥有最多的群众基础,她有时跟其他演出者会一言不合就走下舞台取消演出,有时高音唱不上去竟然挥手耍乐。(汪燕《永恒的歌剧女神》,《书城》1999年10期)

(26) 素有“中国打女”之称的青年演员魏璐在片中饰演性感女杀手“莎莎”,一言不合就令郭德纲“神秘失踪”。(腾讯新闻,20170407)

以上例句的嵌入项中,“健身”是动词,“怒气弥漫”是主谓短语,“写诗、摆 POSE”是动宾短语,“和闺蜜拼了”是状中短语,“走下舞台取消演出”是连谓短语,“令郭德纲‘神秘失踪’”是兼语短语。其他的例子再如:“一言不合就卖萌、一言不合就创业、一言不合就 KISS”,“一言不合就送 MONEY、一言不合就亲子疏离、一言不合就唱起歌跳起舞、一言不合就回 18 岁、一言不合就给员工买房、一言不合就请客吃饭”,等等。

B. 一言不合就+形容词

(27) 公开骂渣男,一言不合就耿直的李小冉很美!(凤凰时尚,20161118)

(28) 高考毕业生:说好的致青春旅行,一言不合就黄了(青年人网,20160726)

(29) 一言不合就蓝、蓝、蓝,威海上半年霸屏的就是 TA 啦!(未来网,20160722)

其他再如“一言不合就任性、一言不合就时尚、一言不合就白了”等。

C. 一言不合就+名词

(30) 一言不合就素颜!周冬雨眯眼拍照自黑成瘾(凤凰资讯,20160622)

(31) 一言不合就地王!南昌今现 2 地王 朝阳楼面价 9200(传媒狐,20170117)

^①陈文博:《现代汉语新型构式的语义认知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第242—243页。

其他再如“一言不合就套路、一言不合就国产、一言不合就毒舌、一言不合就汪峰、一言不合就雾霾、一言不合就高温、一言不合就RAP、一言不合就CP”等。

按照常规认知,“一言不合”是一个动词性短语,其后经常性搭配的对象也是动词性的。而在当代的新兴构式中,形容词、名词等成分也试图进入构式充当了XY,形容词和名词与原型构式中的动词在句法意义上不相匹配,与整个构式的意义不协调,这就涉及到构式对词项的压制作用。进入新构式的形容词、名词等被整个构式动词化了。如“高考毕业生:说好的致青春旅行,一言不合就黄了”中,“黄”是形容词,其后加上动态助词“了”,表示动作已经实现;在“一言不合就地王”中,“地王”前可以添加上存现动词“出现”。

第二,从语义上来看,语法构式的嵌入项在语义上具有冲突性,而新兴的修辞构式则突破了这一限制。

A.语义上具有不如意性的事件。如:

(32)小孩子一言不合就闹出国,家长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网易财经,20160827)

(33)艺术留学的语言关:“一言不合就挂科”的讲座,数十名观众入场参与。(凤凰资讯,20160806)

(34)航班一言不合就晚点?其实也有“套路”。(新浪新闻,20160720)

“闹出国、挂科、晚点”等事件,对于言者来说,均为不如意的或者不期待发生的事件。

B.语义上具有日常性的事件。如:

(35)一言不合就吃火锅 这个冬天怎能少了它(男人窝,20161212)

(36)贾乃亮遇甜馨变迷弟网友:一言不合就晒娃(华东在线,20161201)

(37)美少女涛也是一言不合就扎起半丸子头,搭配那一抹羞涩的笑容,以及耳边缓缓垂下的碎发,少女感爆棚!(新浪时尚,20170330)

“吃火锅、晒娃、扎起半丸子头”等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紧密相关的事情。

C.语义上具有如意性的事件。如:

(38)一言不合就发红包!见者有份,就等你来!(南阳事网,20160707)

(39)一言不合就秀录取通知书。(中国青年网,20160804)

(40)“任性!”是近期沈阳楼市的主基调,一言不合就降价,一言不合就送礼,一言不合就发钱!(沈阳房天下,20160620)

“发红包、秀录取通知书、降价、发钱”等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具有如意性特点。

2.“一言不合”的意义虚化

在语法构式中,“一言不合”的意义是实实在在的;而在修辞构式中,“一言不合”的意义发生了虚化,“XY”的出现或发生与“言”、“不合”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认为,固定项意义的虚化与嵌入项的语义是紧密关联的。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发展过程中,“XY”的[+冲突性]语义特征经历了一个“强——弱——消失”的过程,冲突义逐渐减弱,而调侃性、自娱性逐步增强。“一言不合”和后面的“XY”失去了语义上的逻辑联系,整个构式表示“突然”“动不动”的意义。试比较:

(41)一言不合就拔刀 男子街头借火点烟聊天被刺死(四川新闻网,20161123)

(42)一言不合就体罚的“教育”该管管了(长城网,20171017)

(43)帕托自己的心情看上去也完全没受影响,短暂的假期里他在北京、天津转了转,看什么都新鲜,一言不合就发微博,坐回电动车要配图配说明“这是我的新车”。(新浪体育,20170318)

(44)一言不合就中奖 石柱彩民揽双色球大奖776万。(网易新闻,20160929)

例(41)中“一言不合就拔刀”,事件的冲突性是最强的,描写的是暴力流血性事件;例(42)中,老师动不动就体罚学生,这是师生之间发生的一般的冲突性事件;而在后两例中,“一言不合就发微博”、“一言不合就中奖”,冲突义完全消失,调侃的、幽默风趣的意义浮现出来。

3.事件参与主体由双向性到单向性转变,由指人名词拓展到指物名词

成向阳(2016)认为,“‘一言不合’关涉的必须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也即某人与某人或某些人言语意见不合,而这种不合引发的结果也必须是重大且具有破坏力的后果。而在网络流行中……‘一言不合’背后那颗本该炸响的地雷在流行中竟像被拔掉了撞针,一股烟雾之后落地的尽是鸡毛蒜皮,无论吃麻辣烫还是买本书,其实都是自己单个的行为,与其他人根本没有关联”^①。可见,在语法构式中,事件参与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而在修辞构式中,事件参与者是单一的主体。而且这单一的主体既可以是指人名词,多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还可以是具有客观性和低意志性的“非生命体”。如:

(45)当下社会,作为独生子女的90后们,自主意识强,个性十分鲜明,一言不合就懒得理你,用沉默来代替抗议。(王慧娟《你得过“失语症”吗》)

(46)大学生“一言不合”就退出学生社团,不能简单归咎于新生不够。(人民网,20161102)

(47)网红是我国当今社会的“高能群体”,“一言不合”就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洪荒之力”。(沈霄《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网红的现状、问题及其治理》,《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

以上几句中的主语均为指人的名词性成分,“作为独生子女的90后们”、“大学生”和“网红”,它们在语义上具有主观性和强施事性。

(48)济南:一言不合就来个蓝天加白云迷醉你!(网易财经,20160826)

(49)最近上海的商场都怎么了?一言不合就炫酷卖萌(新华网,20170222)

(50)法国有条公路一天只出现两次 一言不合就消失(腾讯网,20160923)

以上句子中的主语“济南”、“上海的商场”、“公路”都是非人名词,无施事性。基于隐喻思维,这些主语被具体语境赋予了生命性,言说者“以无生作有生看”、“以非人作人看”^②(钱钟书1986),将其拟人化,表达上具有生动性、新颖性和娱乐性等修辞效果。

综上所述,修辞构式“一言不合就XY”具备如下特性:第一,搭配对象扩大,嵌入项可以是具有强动作性的动词,还可以是弱动作性的形容词和名词;与语法构式只能嵌入描写冲突性事件的词语不同,修辞构式扩大到可以嵌入一般性事件,还可以嵌入如意性事件;第二,“一言不合”的意义虚化,与XY之间无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三,修辞构式的主语可以是具有主观性和高意志性的指人名词,还可以是具有客观性和低意志性的指物名词。

三、修辞构式的主观增量手段

“主观性”和“主观化”是当前语言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主观性指的是“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而“主观化”指的是“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③(沈家煊2001)。应该说,新兴修辞构式

①成向阳:《网络流行语的滥用与汉语的命运》,《语文教学通讯》2016年第10期。

②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

③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一言不合就 XY”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主观性,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在具体的语用中,言说者还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构式连用、构式仿用、嵌入项重叠等来传达更为强烈的情感,使得表达具有了更为突出的主观增量义。具体来说:

(一) 构式连用

就是由这一构式组构出的几个短语以排比的方式在句子中连续使用或间隔使用,起到列举解释、增强语势的作用,让人印象深刻。如:

(51) 继上一次戴尔旗舰型 XPS 系列与吴亦凡的合作大获成功后,更加深谙粉丝之道的戴尔,时隔不到三个月,在新推出的二合一变形本家族系列传播中,继续牵手吴亦凡,并将粉丝营销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一言不合就向粉丝扔了一张电影票,一言不合就给粉丝包场看电影,一言不合就把爱豆双手奉上……(搜狐财经,20160829)

(52) 一言不合就告白,一言不合就飙车,一言不合就分手,在这个一言不合就爆发的年代,你的生活也可以一言不合很任性。比如住进【伟星公园大道壹号】,3大公园之间,一言不合就能邂逅最健康的清新生活。(行业新闻,20160807)

例(51)是一个句群,前后两个句子之间是解说关系。第二个句子中,三个“一言不合就+状中短语”构式连续使用,形式整齐,对第一句中“将粉丝营销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进行了细节列举,将营销手段花样翻新的方式密集地展示出来,具体形象。例(52)中,构式是连续使用和间隔使用并存。

(二) 构式仿用

在“一言不合就 XY”的基础上,言说者对这一构式进行仿造使用,这种仿用具有新鲜活泼、幽默风趣的修辞效果。具体有两种情形:

1. “一言不合”和“二话不说”对举使用,形成“一言不合就 XY”和“二话不说就 XY”这一扩展构式,追求对称的表达效果,描写性特征突出。如:

(53) 原来宝莱坞是这么拍动作戏的,印度人是这般撩妹的,一言不合就跳舞,二话不说就开挂,风吹秀发耍耍酷。(凤凰资讯,20160729)

(54) 一言不合就开学,二话不说就报到(经典网,20160826)

以上句子中,嵌入的成分之间是联合关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某一个事件进行说明。有时,嵌入的成分之间还可以是顺承关系的。如:

(55) 一言不合就下雨,二话不说就看海(经典网,20160719)

“下雨”之后“看海”,两个动作先后出现,属顺承复句。

有时,“一言不合”和“二话不说”连用,或者用逗号隔开,然后共同接后续成分“就 XY”。

(56) 一言不合二话不说就翻跟头 看着都头晕(资讯社会,20160707)

(57) 一言不合,二话不说,就要唱歌!(赛客说,20161030)

2. 在“一言不合就 XY”的基础上,仿造出“二言不合就 XY”、“三言不合就 XY”等。

(58) 现在的年轻人呐,太不像话!真是一言不合就发广告,二言不合就秀恩爱,满满的都是套路!(今日头条,20160711)

(59) 一言不合就减价,二言不合送墨镜,三言不合就包邮,就是这么任性。(网络论坛,20160727)

(3) 嵌入项重叠

这里指的是嵌入的单音节动词进行三次重叠,形成“一言不合就 VVV”构式。如:

(60) 一言不合就送送送!陆地港各种网红进口商品满减乱卖啦!(龙岩网,20161013)

(61)爱喝酒的人,做梦都想交一个李白这样的朋友,一言不合喝喝喝,酒楼里面喝喝喝,自己家里喝喝喝,宫廷里面喝喝喝,妓院里面喝喝喝。(杭州网,20160812)

(62)最近广州的天气,真是一言不合就晒晒晒,烤烤烤,热热热啊!(广州日报大洋网,20160621)

一般来说,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多是“VV”形式,如“说说、看看、想想”,仅限于表示具有持续性的动作动词,在语义上表示“时量短或动量小”^①(朱德熙 1982),第二个音节读为轻声。而在“一言不合就 XY”构式中,嵌入项是单音节动词的三次重叠。我们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语音的和谐,“一言不合”、“就 VVV”,前后形成“4+4”的韵律模式,满足了大众“以偶为佳”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VV”形式表示量小或量减,而在该构式中,“一言不合就”后面跟的是具有强结果义的成分,该构式要求嵌入的是具有量大或量增的成分,而“VVV”形式是有主观增量义的,而且重叠后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重音。因此,可以说“一言不合就喝喝喝”,而不能说“一言不合就喝喝”,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就 XY”与“喝喝”这类表示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在语义上是不相容的。

四、修辞构式的流行动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兴“一言不合就 XY”构式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爆炸方式扩散开来,与这一构式自身的表义特点密切相关,也与网民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化的心理相关。

(一)“一言不合就 XY”构式适宜于描写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包孕性顷刻”。在绘画、摄影、雕塑等造型艺术中,艺术家会选取高潮前那个“次高潮”的时刻,而极力避免选择高潮(或顶点)时刻,因为一达到顶点,事情的发展就到了尽头,不能再“生发”了,这是钱钟书(1962)在《读〈拉奥孔〉》里所指出的“莱辛讲的富于包孕的时刻”^②,这一时刻包含着从前又蕴蓄着以后,是最能激起人的期待、启发人的想象的。

从语义上来说,“一言不合就 XY”就是描写了这样一个“包孕性顷刻”。对一个事件过程的描述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言不合就 XY”构式截取了一个事件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即“发展”和“高潮”部分。这两个部分是构成一个冲突事件的最显著的要素,“一言不合”是发展部分,是起因,是一个触发点,是矛盾产生和积聚的那一刻,是要爆发而尚未爆发、即将爆发的顷刻,而当矛盾和冲突达到饱和,达到顶点,就会产生后面的“XY”,即高潮。“一言不合就 XY”描写了一个事件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而这一事件是怎样开始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则是留白,期待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联想来填补这一事件框架。“语言表达往往‘以点带面’,一个词、一个句子往往触发的是一个或多个概念框架或系统。”^③(束定芳 2008)可以说,这一构式的流行,与所提供的富有张力的想象空间是紧密相关的。

语法构式“一言不合就 XY”描写的是冲突性事件。依据 Hopper Thompson(1980)对动词及物性的研究^④,“一言不合”和“XY”前后两个动词性成分均具有较强的及物性。如在“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中,动作的参与者至少在两个以上,参与者个性突出,有“易冲动、脾气暴躁、非理

①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7页。

②钱钟书:《读〈拉奥孔〉》,《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③束定芳:《认知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75页。

④Hopper Thompson 认为动词的及物性强度由以下的特征束来定义:(1)动作的参与者在两个以上;(2)动词表示动作(过程)而不是状态;(3)动作是瞬间完成而不是持续的;(4)动作是人为的、有意愿的;(5)动作是现实的而非虚拟的;(6)施事对受事有很强的支配力;(7)参与者有很强的个体性。

性”等联想义,“一言不合”和“大打出手”这两个动作是相互发生的,具有倚变关系,而且它们不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词短语及物性很强。因此说,这个构式是组合性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是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描述,这就使得嵌入成分受到很大限制,整个构式能产性较弱。

而新兴的修辞构式大大地拓展了语法构式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可以描写一般的冲突性事件、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如意性事件,其暴力性、冲突性大大减弱甚至削弱为无,整个构式具有了[+动不动]、[+任性]等构式义,表示很容易产生某种行动或情况,“调侃性、戏谑性”的主观义也随之浮现出来,如“一言不合就跳舞”、“一言不合就中奖”。在人们的惯性认知中,“一言不合”之后必然是一场矛盾冲突达到顶点的剑拔弩张的冲突性事件,而在新兴构式中,吸引人眼球的冲突性事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与大众的吃穿住行等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事件或者如意性事件,前后两个行为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听说者原有期待落空,这种“雷声大”而“雨点小”的表达方式营造出幽默、风趣的语用效果。如束定芳(2008)所言“各种不同的幽默最通常的一个成分就是突然的框架替换”^①。

(二)满足了网民们追求语言时尚和表达主观情绪的需要。在这个“一言不合就飙流行语”的时代,修辞构式满足了言说者反崇高、反严肃的心理,如徐默凡(2012)所言:“现代人试图消解崇高、庄重、高雅这些沉重的东西,而代之以‘藐视一切’的世俗娱乐态度。”^②360度百科是这样介绍这一新兴构式的来源的:“2015年末举行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由于大赛主办方的态度极其粗疏,引起观众的强烈不满。一些网民在百度贴吧中贴出低俗内容以示愤怒,导致贴吧被封。”在这一事件中出现了一言不合就开车的表达。这里的“开车”非“驾驶车辆”的短语义,而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指“在网络上传播低俗内容的行为”。这一新闻事件引发了网友热议,作为最早实例的“一言不合就开车”,在短时间内被网友大量仿用,类似的表达迅速积聚,由量变而质变,从而被提炼出“一言不合就XY”这一框架结构。由于这一热点新闻事件的触发,“一言不合就XY”在搭配上突破了原来保守的、中规中矩的组合方式,新兴构式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新颖性的超常规搭配方式一下子点燃了网民的仿用热情,星星之火迅速成燎原之势。辛仪烨(2010)认为:“网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使用它,一旦发现适合它的场景,就会迫不及待地用上去。”^③这种语言狂欢一发而不可收,使得该构式爆发出前有未有的活力和强劲的生命力。新兴构式的大量使用满足了广大网民追求语言时尚、追求个性的需要,也满足了彰显自我、宣泄情绪的心理需要。

1. 抱怨心理。如:

(63)上班开会下班做事,永远是上班时间开会,开到下班然后把一天的工作压在下班时间里。一言不合就要开个会碰一下。(大不六文章网,20170127)

(64)房屋产权都不是永久的,还要征收房地产税,老百姓还房贷已经很辛苦了,这是要闹哪样儿?真是的,一言不合就收税!(中国网,20160726)

在以上语境中,“开会”、“收税”,对言说者来说是比较闹心的不如意事件,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通过这一构式表达对“动不动就开会”、“动不动就收税”的不满情绪,抒发一下无奈的、抱怨的心理。

2. 赞美心理。如:

(65)北京大妈讲网银:一言不合就飙英文(乐视视频,20161018)

①束定芳:《认知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75页。

②徐默凡:《流行语的游戏心态和游戏成分——以无关指称为例》,《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1期。

③辛仪烨:《流行语的扩散:从泛化到框填》,《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2期。

(66)一言不合就变文艺范儿的购物中心,你不可不来(经典网,20160722)

例(65)中,在我们的认知中,“飙英文”是特有文化、特别精英的一个行为,在此句中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北京大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与“北京大妈”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买菜、跳广场舞等日常行为,因此,“北京大妈一言不合就飙英文”,含有极度褒奖的、夸赞的主观情感;例(66)是表达对购物中心“特别文艺”的一种喜爱和赞美。

3.戏谑心理。如:

(67)霸道总裁一言不合就发钱,郭台铭拿出22亿股票分红奖励员工(艾瑞网,20161130)

(68)一言不合就吃吃吃,二言不合就拍拍拍(微博)

当代汉语中,很多新词语具有明显的戏谑色彩,这满足了网民追求轻松闲适的审美需求。例(67)中,“一言不合就发钱”以开玩笑的方式凸显了“总裁”的有钱和任性;例(68)中,“一言不合就吃吃吃”则是对自己作为一个吃货的自我调侃,显示出生活的轻松和随意。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 XY”: from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Rhetoric Structure

Meng Xiang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2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the embedded part of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XY”, the sentence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they fight” can be regarded as a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 new expression, like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it is self-willed”, is regarded as a rhetoric structure. The following ar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 XY” during its development from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rhetoric structure: the embedded parts becoming expanded; the phrase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having a generalized meaning; the participant subject transformed from two-way to one-way and from a noun of persons to a noun of things. The rhetoric structure has some ways to express a speaker’s attitude and emotion, such as being used continuously, creating similar structures (such as “As soon as a second disagreement + XY”, “XY without demur”, etc.), and overlapping the embedded part (VVV form).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reason why the rhetoric structure has become so popular in such a short time is that the structur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eature of having its own meaning and it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netizens’ psychology of chasing after language fashions and subjectivization of expressions.

Key words: “As soon as a disagreement+ XY”; grammatical structure; rhetoric structure; relation of inheriting

责任编辑:孙昕光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孙书平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颜光敏为清初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是清初曲阜颜氏家族勃兴的代表人物。由于文献稀见等原因,其生平与诗文考证还很不充分。现以其子颜肇维所撰《颜修来先生年谱》为基础,结合颜光敏个人日记四种及其诗文体内容,兼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人物文献互证,对颜光敏生平作一较为详尽的考证,同时对其所作诗文进行系年笺证。对于史料不足以支撑考证的文章暂付阙如,以俟后考。

关键词: 颜光敏;年谱;诗文;系年;笺证

中图分类号: K82-64.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7)06-0131-2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6.014

清初山东曲阜颜氏家族崛起。该家族中颜光敏、颜光猷、颜光敦兄弟先后中进士,“一母三进士”一时传为美谈;其祖父亦进士及第,明末以身殉国,父颜伯璟守节不仕,父忠子孝,舆论归之。其后代虽无显官名宦,但也能诗文传家,前后绵延十余世。而该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则是颜光敏。颜光敏(1640-1686),字逊甫,号德园,一字修来,颜回66代孙,于康熙六年中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历礼、吏二部,立朝侃侃不阿;暇则游山览水,诗文纪之。好交友,善接纳,一生友朋遍天下,有《颜氏家藏尺牍》近八百封信函可征。善书,郑簠谓之“知书”。诗文俱擅,位列“燕台十子”之冠,誉为雅音,有《乐圃集》传世。时时称述祖训,陈忠孝以勉后学,著《颜氏家诫》四卷,世比黄门《家训》。其他著作还有《旧雨堂诗》《未信稿》《未信堂时艺》《德园日历》《京师日历》《南游日历》《历下纪游》《音正》《音变》《文释》诸种。

由于诸种原因,现在对于颜光敏的研究极不充分。诗文整理仅有赵传仁等人的《颜光敏诗文集笺注》,所收诗文颇不完备,笺注部分亦有讹误。其人其诗研究仅有两篇硕士论文和数篇单篇论文,其中所引文献都未涉及《颜氏家藏尺牍》与颜光敏的四种日记,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现以颜光敏子颜肇维所撰《颜修来先生年谱》^①(以下简称《年谱》)为基础,结合作者诗文作品和四种稿本日记^②、家藏尺牍^③等稀见文献资料,兼与涉及到的相关历史人物文献相互印证,对颜光敏的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对其作品作出系年考证。囿于史料不完备,部分诗文创作时间无法具体确证,只得暂付阙如,以俟后考。

* 收稿日期:2017-09-10

作者简介: 孙书平(1976—),男,山东肥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①《颜修来先生年谱》载于颜光敏孙颜懋偁辑《霞城日记》,今人赵传仁等据以整理,附录于《颜修来诗文笺注》,间有讹误,引用时一并改正。

②颜光敏传世日记有四种,即《德园日历》《南游日历》《历下纪游》《京师日历》,皆稿本,楷法工整,现存南开大学图书馆。

③主要是指《颜氏家藏尺牍》。该文献由颜光敏曾孙颜崇桢收辑、桂馥装池,主要收录了亲友写给颜光敏及其家人的书信,计284人,790函。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 1岁

历史大事:

明北方地区爆发大面积灾荒,山东尤甚。《明史·五行志三》卷35载:“北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瘞鬻以食。”《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徵典》卷111载:“崇祯十三年,(山东)自六月不雨,至八月蝗,大饥,群盗蜂起,人相食,草根木皮俱尽。益都、沂水、临淄、昌乐、蒙阴斗粟二千文,奇荒连岁,斗米万钱。土寇蜂起,路无行人,男女不生育,尤为奇变,泗水县全属……大饥,赤地千里,土寇四起。”

本事/家事:

正月初七日寅时,颜光敏生。

是年,祖父颜胤绍任邯郸令,御敌救荒有方,名震畿辅。却为督师太监所劾,被逮下狱。

明崇祯十四年辛巳,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 2岁

历史大事:

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杀福王;九月,于项城歼明军数万人,杀陕西总督傅宗龙。

二月,张献忠部出川,克襄阳,杀襄王。

春,清军对锦州实行包围;八月,明清两军决战松锦,明军大败,主力部队大部被歼。

家事/本事:

直隶抚军屡奏邯郸冤抑状,祖父颜胤绍得从薄谴。旋以真定司马讨西山巨盗,降其众,遂知河间府。父颜伯璟预感不祥,寓书亟谏,恳请祖父颜胤绍不要奉诏。颜胤绍不听,毅然赴任。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 3岁

历史大事:

二月,清兵下松山,蓟辽总督洪承畴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降清。清军第5次入关,破河间、兖州。《崇祯实录》载:崇祯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五月,阿巴泰率清军从黄崖口出击,进犯蓟州、河间、景州、临清、兖州、莱州、登州、青州府、莒州、沂州、德州……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降城六。

家事/本事:

十月,清军攻河间,祖父颜胤绍力战;城破,集家人六口俱自焚。十二月,清军破兖州。是时,父颜伯璟伤足被掳,义不受辱,获释后回曲阜;母朱氏虽受刃,数日后苏醒,亦脱兵燹,归曲阜;颜光敏与兄颜光猷为仲父救护,并为两乳母护持返回曲阜——一家幸得完聚。兖州城破时,仲父死于乱军中。季父颜伯珣得仆人吕有年救护免死,流落当地民间。事详载于《颜氏家诫》^①“承家”篇。

明崇祯十六年癸未,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 4岁

历史大事:

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

三月,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在襄阳建立政权。

五月,清军出塞去。五月,张献忠部克武昌,杀楚王,建立“大西”政权。

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病故,幼子福临继位。

家事/本事:

^①《颜氏家诫》为颜光敏在父亲去世后回乡丁忧守制时所作。现有顾炎武校改的抄本和阮元巡抚浙江时受颜光敏曾孙颜崇榘所托的刻本传世。

是年，颜光敏患疡。父颜伯璟赴河间求祖父颜胤绍及家人骸骨，并上书请恤。祖父颜胤绍被追赠为光禄寺卿。颜伯璟又于当地民间求得季弟颜伯珣，扶河间公柩与俱归。事详载于《颜氏家诫》“承家”篇。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 5岁

历史大事：

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

三月，大顺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杀；是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

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五月，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

十月，清朝定都北京，改年号为顺治，是年为顺治元年。

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家事/本事：

与伯兄颜光猷及季父颜伯珣共食寝，无稚气，能诵诗，对客琅琅数百言无难色。

孙在丰生。孙在丰（1644-1689），字屹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进士第，殿试第二名。颜光敏为其座师，故二人有师生之谊，交往密切。授编修，值起居注，充日讲官，累迁工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 6岁

历史大事：

二月，清朝定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于大成殿奉祀孔子。

四月，清兵破扬州，督师史可法殉难。

五月，清兵进攻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迎降。南明福王政权倾覆。

六月，清军下苏杭。闰六月，鲁王在绍兴监国，唐王在福州建立政权。夏，李自成被害。清军占领南京后，下令各省十日内剃发，违抗者被视为“逆命之寇”，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相威胁；江南抗清义军纷起。

家事/本事：

父颜伯璟延师李奉禄于家塾教育子弟。颜光敏尚年幼，却请求与兄长叔父同入学。《家谱》载：颜光敏对父言：“叔父仅长三岁，伯兄长二岁，儿独何耶？”颜伯璟喜，使入学，日有考记，不好弄。

是年，洪升生。洪升（1645-1701），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人，有《稗畦集》《稗畦续集》等，以《长生殿》名世，与孔尚任齐名，有“南洪北孔”之称。颜光敏与之交往密切。

顺治三年丙戌，公元1646年 7岁

历史大事：

三月，清廷变明朝进士授官制度：新进士除一甲外，二甲前五十名选部属，后二十名选评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选评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名选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七名选推官，其余尽选为知县。

四月，清廷举行开国后第一次殿试，傅以渐被取为首科状元。

家事/本事：

在家塾习《四书》《孝经》《毛诗》《周易》，俱成诵，一字不忘。父颜伯璟又教以步履进退，使无诳语，与人共食必让匙箸。

潘耒（1646-1708）生，未有《遂初堂集》。颜光敏与之交往颇密。

顺治四年丁亥公元,1647年 8岁

历史大事:

三月,赐吕宫等进士及第有差。是年,在京畿大规模圈地。

家事/本事:

颜光敏强记善问,塾师李奉禄不能难,告颜伯璟曰:“此子业已胜我。”辞去。

顺治五年戊子,公元1648年 9岁

历史大事:

七月,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八月,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

家事/本事:

从孔秀岩先生读于龙湾,学为举业,不苟同于人。尝侍父寝,颜伯璟梦中讲“天命之谓性章”,多前人之所未发,颜光敏时已默识心通。

孔尚任(1648-1718)生。孔尚任有《湖海集》《桃花扇》传世。颜光敏与孔尚任相交甚契,共同切磋学问,整理文献。颜光敏亡故后,为作《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颜公墓表》。

顺治六年己丑,公元1649年 10岁

历史大事:

正月,河北蔚州饥民啸聚起事。

家事/本事:

父颜伯璟命省耘,与二西瓜,颜光敏自去其蒂。母朱氏问:“何为去其蒂?”颜光敏答曰:“儿道远,持其蒂必脱,瓜且裂矣。”

施闰章(1618-1683)中进士,有《学余堂集》,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称。顺治十三年秋,施闰章任山东学政,奉使督学山东,院试拔颜光敏第一。后与颜光敏交往密切,并主持颜光敏首倡的“十子”诗略出版事宜。

顺治七年庚寅,公元1650年 11岁

历史大事:

冬,摄政王多尔袞死于塞北狩猎途中。

家事/本事:

学书。

顺治八年辛卯,公元1651年 12岁

历史大事:

正月十二日,顺治帝亲政。

四月,遣官祭祀岳镇海渚、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

家事/本事:

应郡邑童子试,皆冠其偶。祖姑母值丧乱后依赠公以居,仆婢事之小不谨,颜光敏必呵责之,饮食起居必问焉。祖姑母叹曰:“是儿加人数等矣。”

顺治九年壬辰,公元1652年 13岁

历史大事:

三月,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九月,顺治帝幸太学释奠。

家事/本事:

学行草书。

诗文系年：

作《仲秋泗河泛舟赋》。《家谱》载：是年作《仲秋泗河泛舟赋》，未传世。

顺治十年癸巳，公元 1653 年 14 岁

家事/本事：

颜光敏与叔父、伯兄唱和，得诗文各百余首。有醉吏啸于门，父颜伯璟启颜光敏说：“汝亦闻山有猛虎，藜藿为之不采乎？”颜光敏对曰：“窃谓猛虎不如麒麟。”颜伯璟曰：“此吾志也。”事载《年谱》中。

顺治十一年甲午，公元 1654 年 15 岁

历史大事：

三月，皇三子玄烨生。

家事/本事：

应童子试，学使戴京曾激赏之，拔置第一，入四氏学。

顺治十二年乙未，公元 1655 年 16 岁

家事/本事：

是年，曲阜有均田之役，邑人多不解勾股法。颜光敏夜见陈征君惺存，学之，一夕而精。越陌度阡，十月竣役。县令叹以为神。

十二月，娶孔氏。

诗文系年：

是年，作《月蚀歌》《玉蝶词》一卷。事载《年谱》，未传世。

顺治十三年丙申，公元 1656 年 17 岁

历史大事：

十月 施闰章出任山东学政，督学山东。

家事/本事：

参加童生院试，学使施闰章拔置第一，食饩。《年谱》载：颜光敏参加童生院试与食饩在上一年，然《施尚白年谱》记载施闰章视学山东在是年，姑将本事系于是年。

顺治十四年丁酉，公元 1657 年 18 岁

家事/本事：

从邑先达孔方训学。诸生五十余人，颜光敏七试皆第一。

是秋，参加乡试，中试六十九名，主考官为户部给事严沆、兵部郎中李世治，房考官为泰安知州张知恽。放榜日，以非孔氏，改置副车第四名。按明天启元年间台臣议，初定宗生圣裔中式名额，四氏始有“耳”字号。但凭文优取中，原未定一人，亦不拘定孔氏。故崇祯庚午科，祖父颜胤绍与颜伯鞅叔侄同榜。嗣后宗生圣裔，不副其选，仅能中氏一名。至清顺治二年，礼部尚书郎丘条陈科场事宜，不知四氏旧额原系不拘一人、不拘何姓，但凭文艺取中之例。遽称山东孔裔，旧用“耳”字编号，中式一人，则当如旧遵行，冒昧题请。以致嗣后历科中式仅孔氏一人，而颜、曾、孟三氏编号虽同，不得与焉。是科颜光敏得而复失，亦无愠容，人服其雅量。场后，巡按缪正心具题，请复旧额。部议四氏子孙不拘何姓，以文高者取中二名，自此始。其后遂有颜光敏、颜光散、颜光敦先后进士及第、“一母三进士”的故事。

十月初六日，长女颜小来生。

诗文系年：

作《望岳》。是诗《颜光敏诗文笺注》系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依据是《历下纪游》“三月初二日过南义望徂徕、泰山,顶皆积雪”。然《历下纪游》初十日还记载:“至朝阳洞,忆丁酉岁八月侍先大人憩此,过尚翠峰先生,叙世讲订交。距今二十有五年矣。”但该诗最早见于“十子诗略”本《乐圃集》。而《南游日历》则明确记载康熙二十年庚申《乐圃集》已刻成。故将该诗系于康熙二十一年当非。最大可能是顺治十四年丁酉颜光敏陪父亲颜伯璟登泰山而未果时所作。诗中末句“何时陟峻峨,目尽扶桑东”亦可证诗人未登临泰山。而《历下纪游》则完整地记录了颜光敏登泰山的全过程。

顺治十五年戊戌,公元1658年 19岁

家事/本事:

赴太学,暇时倡谈棋弈,时无与敌者。旋戒之,还曲阜龙湾,键户读书。

王曰高中进士。王曰高(?-1678),字兹鉴,号北山,山东茌平人。是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历官礼科都给事中,有《槐轩集》。颜光敏有《王北山邀同升六子纶饮西郊花下》纪之。

顺治十六年己亥,公元1659年 20岁

家事/本事:

读书园中,亲自种菊。早晚桔槔浇畦蔬,园官止之,颜光敏答曰:“吾欲习劳耳。”

诗文系年:

作《菊叹》。《年谱》记载:“十五年游太学,十六年,读书家园中,亲自种菊,慨叹与菊同命运,故有‘主人与尔同风霜’之句。”《颜修来诗文笺注》认为该诗作于顺治十四年,当非。因《年谱》明言“十六年,读书家园中,亲自种菊”。

顺治十七年庚子,公元1660年 21岁

家事/本事:

再次参加乡试,下第。从父颜伯璟学琴。《南游日历》载:康熙己未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先大人(颜伯璟)学琴于都门儒士赵天玉,天玉学琴于扬州曹杏田。”

诗文系年:

作《旧雨堂诗》。《年谱》载:是年“与云间吴六益和,著《旧雨堂诗》一卷”。未传世。

顺治十八年辛丑,公元1661年 22岁,

历史大事:

正月,顺治帝卒,子玄烨嗣位。

十月,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家事/本事:

与顾炎武定交。后顾氏以事系狱,颜光敏已宦京师,全力救助。其在《送朱锡鬯之济南三首(在抚军署)》(《年谱》题名为《送朱竹垞入东抚幕》))有“讼庭尚有南冠客(时亭林以诏狱在济南),莫向燕台思故人”之句。

三月,生女曰丙。

诗文系年:

作《喜荆璞伯父归里》。颜伯瓚,字荆璞,颜光敏堂伯父。岁贡生,顺治十四年任鱼台教谕,十八年辞官归里(事载《鱼台县志》与《颜氏家谱》)。诗中云:“三年浮海嗟为吏,五十还家还弄孙。”亦可证之。

赋《行路难》9篇。《年谱》载:“江南顾炎武宁人,耳府君名,过访,定交。同赋《行路难》九篇。”未传世。

康熙元年壬寅，公元 1662 年 23 岁

历史大事：

改年号为康熙，是年为康熙元年。

四月，吴三桂弑永历帝，明永历王朝告终。

五月 郑成功卒，子郑经嗣主台湾。

康熙二年癸卯，公元 1663 年 24 岁

历史大事：

五月，《明史》狱兴。

八月，礼部遵旨议复乡会试，停八股文，以次年甲辰科为始。

家事/本事：

秋，第三次参加乡试，中第二十六名。受知礼部郎中张应瑞、刑部给事张维赤，郯城县令金煜为其座师，同门五人。孔族诸无赖，闻颜光敏中式，哗于门，扯去报帖，盖忿其妨孔氏中式额也。颜光敏不与较，其人至暮惭而归。

冬游邹、郯、沂间。

诗文系年：

作《游邹峰山八首》。据相关资料知，是年前颜光敏出游仅两次，一是顺治十三年陪父亲颜伯璟登泰山，二是是年冬天游邹、郯、沂。其后游历主要为京师、河北、河南、关中与江南诸地。故该诗当作于是年。

作《过郯城赋呈会稽子藏金夫子八韵》。金煜（1641-1694），字子藏，浙江会稽人。顺治十五年戊戌进士，康熙二年至七年任山东郯城县知县，康熙庚戌年罢官。康熙二年（1663）山东乡试，金煜为同考官，荐颜光敏卷得中式。金煜与颜光敏有师生之谊，故颜光敏称其郡望、尊之为夫子。《年谱》载：康熙二年“冬游邹、郯、沂间”。此诗当应作于是年。

康熙三年甲辰，公元 1664 年 25 岁

家事/本事：

二月，参加会试，下第。

冬，母朱氏病，侍母疾，衣不解带。女丙殇，不以告，亦无戚容。

是年，曹贞吉、田雯、曹禾成进士。曹贞吉（1634-1698），字升六，山东安丘人，历官礼部郎中，清初著名诗人、词人。田雯（1635-1704），字子纶，山东德州人，累官至户部侍郎，有《古欢堂集》。曹禾（1637-1699），字颂嘉，号峨嵋，一号未庵，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以事罢归。诗文皆有名，有《未庵诗文集》《峨嵋集》等。三人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子”。颜光敏有《王北山邀同升六子纶饮西郊花下》《同曹升六郊行二首》《送曹颂嘉假归》等纪之。

诗文系年：

作《吕律集说》。事载《年谱》，未传世。

作《同黄子厚途中作》。黄珀，字子厚，山东即墨人，明进士黄宗祥子。康熙二年举人，与颜光敏为举人同年。此诗为二人是年赴京参加会试下第后返途的唱和之作。诗中云：“二月长安柳色新，故乡相忆泪沾巾。遥怜蓟北莺花少，不道春光闹杀人。”可证也。

康熙四年乙巳，公元 1665 年 26 岁

家事/本事：

夏五月，次女生。

讲究书法宿原。尝曰:“学行楷书,当取资于商周秦汉;而以晋为法,唐则矩矱森然。初学者宜于此求其笔径,宋以后勿寓目可也。”或曰:“晋、唐则然矣,汉以前所传何书?”曰:“篆、隶、行、楷,本同一源,所贵能书者敛精神,姿态变化无方,而不失其天然位置,是谓得之。”

康熙五年丙午,公元1666年 27岁

家事/本事:

是年西游,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与关中名士游。《年谱》载:(是年)“之秦。代太宗世翰募修祖庙。偕邑人孔君次宽,止临洺关,访河间公缚虎、去碓处。……陕西方伯与府君同姓名,相见甚欢。凡所遗,比归,悉以奉父母,分诸兄弟,囊无私蓄。十二月偕计吏北上,赠公及叔及伯兄送于沙河别业,同为联句,有‘咸京五月寒,腊日向长安’之句记其事。”

诗文系年:

是年作《过邯郸作》(先祖自邯郸令历守河间,敏生三年,竟未获见)《邯郸行》《次卫辉》《苏季子故里》《张桓侯祠》《广平城外》《渡漳河》《铜雀台》《邺城》《次卫辉》《覃怀》《渡河》《望汴城》《洛阳》《张茅》《登灵宝阁》《吊韩淮阴》《潼关》《潼关道中》《望华山》《骊山》《杂感三首》《再望华山》《洛关》《登太华山九首》《游伊阙二首》《山荪亭》《峪口》《桃林坪》《毛女峰》《希夷峡》《莎萝坪》《送客》《已发洛关却寄房梅嶠》《丙午三月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韩马河联句为别》诸诗。

从颜光敏西游的目的来看,是代颜氏大宗户世袭翰林院博士募捐修颜子庙。由《丙午三月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韩马河联句为别》诗题即可知其西游的具体路线:先赴河北河间,凭吊祖父颜胤绍事迹和遗迹,后南下,取道河南西行,入关中。游历中凭吊历史人物、观览山河,并以诗文纪之。《年谱》亦记载:“康熙丙午(1666),府君年二十七,之秦,登华山,与秦中名士李天生、王无异游,有诗数十篇。”亦可证之。

在河北,作《过邯郸作》(先祖自邯郸令历守河间,敏生三年,竟未获见)《邯郸行》《广平城外》《张桓侯祠》诸诗。在河南作《次卫辉》《苏季子故里》《渡漳河》《铜雀台》《邺城》《覃怀》《渡河》《望汴城》《洛阳》《张茅》《登灵宝阁》《吊韩淮阴》诸诗。在陕西作《潼关》《潼关道中》《望华山》《骊山》《再望华山》《洛关》《登太华山九首》《游伊阙二首》《山荪亭》《峪口》《桃林坪》《毛女峰》《希夷峡》《莎萝坪》诸诗。颜光敏毕生出山东游历地区仅三个,一是宦游京师时的京畿地区,一是是年游历中原与关陕地区,三是丁父忧服除后游历江南地区。上述诸诗由诗题即可知作于是年。

《丙午三月出游历邯郸洛阳入秦中十月乃还十二月十三日以计偕北上府君季父伯兄同行至韩马河联句为别》。从诗题即可知是诗作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

作《西征日记》,事载《年谱》。未传世。

康熙六年丁未,公元1667年 28岁

历史大事:

七月,康熙帝玄烨亲政。

家事/本事:

二月,参加礼部会试,中第七十四名,总裁官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王弘祚、礼部尚书梁清标、内秘书院学士刘芳躅、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冯溥,同考官兵部职方司主事蔡兆丰。

三月,参加殿试,中缪彤榜二甲第十三名。

五月,有旨许进士考授中书,赴考,名列第六,授国史院中书舍人,偕沈胤范、张鹏、张鸿猷、张衡、田雯、申穉、朱射斗、李回、梁联馨、纪愈、孙百藩十二人署办事。

诗文系年:

作《丁未八月支俸米寄里中因题长句》。丁未，即康熙六年。颜光敏于康熙丁未年中进士，同年五月官中书舍人。

作《奉送大宗伯真定公归里》。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苍岩，河北真定（正定）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历官户部、礼部、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康熙六年以礼部尚书（古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为会试正主考官，是年光敏中进士，梁颜有师生之谊，故称其职官郡望而不称名。康熙六年，鳌拜专权，梁被革职归里。《康熙实录》载：康熙五年，“九月丁亥，转兵部尚书梁清标为礼部尚书”。六年“二月辛亥，以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尚书梁清标为会试正考官。吏部侍郎冯溥、内院学士刘芳躅为副考官”。“三月辛巳，京察各部院自陈官员。吏部尚书明安达礼、礼部尚书祁彻白俱原品解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俱革职。”八年八月，“辛巳，吏部遵谕查覆原任礼部尚书梁清标、刑部左侍郎石申均系京察无故被革。应复还原职。从之。”此后，梁清标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大学士，未再任礼部。故该诗当作于是年梁清标被鳌拜革职后返里之时。诗中“皇躬迟黻冕（时上未亲政），臣分合樵渔”的小注“时上未亲政”亦可佐证之。

作《荷兰贡马恭纪》。《康熙实录》载：康熙六年，“五月庚申，荷兰国噶喽吧王油烦吗绥极差陪臣进贡方物：刀剑八枚，皆可屈伸，萦绕如带；马四匹，凤膺鹤胫，日行千里。宴赉如例。”

康熙七年戊申，公元1668年 29岁

家事/本事：

薇省多暇日，益稽古学，与同志数人，细论得失，皆一时名流。彼置身清要，声名赫奕，思附片席以自文其陋，竟不可得。相传田雯酒间漫骂，张鹏典试（典试山东）见侮，一时内翰词林俨若冰炭。故申穉吟曰：“书生薄命还同妾，丞相怜才不论官。”田雯答云：“失路嗟何益，痴怀老渐平。”盖是科同甲辰科一样，废八股，考策论。故应试者少，所取进士不被士人看重。事载《年谱》。

诗文系年：

作《戊申六月十七日齐鲁地大地震歌以纪之》。康熙七年（1668）山东郯城地震，震级八级。

康熙八年己酉，公元1669年 30岁

历史大事：

四月，玄烨赴国子监祭拜孔子。《年谱》载：“四月，上幸国子监。加恩孔、孟、颜、曾四氏子孙之仕于朝者，以示尊孔崇儒。”

八月，康熙剪除鳌拜集团，亲政。

家事/本事：

二月二十六日，长子颜肇维生于京邸。因三月康熙临雍，故名之“雍”，后改名“维”，以示思亲。是年，加恩圣贤子孙之陪祀观礼者。

九月，升礼部仪制司主事。伯兄颜光猷乡试中举。

冬，上《籍田秉耒议》。

诗文系年：

作《躬侍临雍有作》。《清史稿·圣祖本纪一》载：“康熙八年四月丁丑，上幸太学，祭拜先世孔子，讲《周易》《尚书》。”

康熙九年庚戌，公元1670年 31岁

家事/本事：

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分校《易经》，得士十八人：白梦鼎、张烈、张为焕、孙在丰、崔瀛、李次莲、梁楠、黄承箕、万嵩、冯遵祖、李超、屠又良、余雪祚、辛乐舜、李谊、吴瑾、王元臣、郭昂，皆一时名士。

三月,出监龙江关税。

五月,以覃恩授承德郎。

有族人绍灼,改革时失其母。后知为旗人所掠,灼贫,其主人索价甚高,已无可奈何。颜光敏闻之,为捐百金赎回,俾得完聚。

诗文系年:

作《益都公晋大司寇喜赋》。《康熙实录》载:康熙九年,“三月辛酉,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溥为刑部尚书。”冯溥(1609-1691),字孔博,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康熙六年为会试副主考官,是年颜光敏成进士,二人有师生之谊,故颜光敏称其郡望。大司寇为刑部尚书敬称。

作《奉使将及里门作》。《年谱》载:康熙九年(1670)三月,颜光敏奉旨出监龙江关税,是年“五月过鲁省亲”,作此诗。

作《题龙江楼》。龙江,此指龙江关,在江苏省江宁城仪凤门外。明清时设户部钞关于此,专理粟帛杂用之税。据《年谱》知是年颜光敏以礼部仪制司主事出监龙江关税。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 32岁

家事/本事:

榷关一载,爬搜诸蠹,务从宽大,商旅德之。役毕,至假金为途资以还。季冬,奉母朱氏入都。覆命后,上书宗伯,更定衣服等威仪,格不行。

诗文系年:

作《蹋鞠行》。《年谱》载:“康熙十年(1671)榷关一载,役毕,过鲁省亲,时时与亲串话,言畴昔。蹋鞠较射,道傍观者,殊不知为仕宦也。”此诗当作于是年。

作《卖船行为宣城先生作》。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虞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十三年为山东提学使。《年谱》载:是年“科考,置第一,食飨”。施闰章与颜因此有师生之谊,故颜光敏称其为先生。有学者考证:施闰章官江西湖西道,有政声,康熙六年因湖西道裁并,罢归返宣城。御史赠以船,过鄱阳湖,乏食,卖船以归,有《卖船行》诗记其事。后居家十年,期间出游广陵、金陵、徐州苏门山、嵩山、黄山、惠山、虎丘、雁荡、瓯江孤屿江心寺等处。^①施闰章序《颜修来诗集》云:“岁之辛亥(康熙十年),颜子修来相值于金陵,是时修来以仪部郎榷关龙江。”^②由此可知,颜光敏虽与施闰章相识于顺治十三年,密切交往当始于康熙十年,故《卖船行为宣城先生作》最早可能作于是年,故暂系于此。

作《将去金陵漫成七首》。《家谱》载:康熙九年三月至十年三月,颜光敏榷龙江关税一年。役毕,将去金陵,作此诗以纪之。其中第七首首联云:“近有西湖信,兼怀越水谣(时家叔游武林)。”施闰章序《乐圃集》时云:“岁之辛亥,颜子修来相值于金陵……偕从季父。”可知颜光敏榷龙江时与季父颜伯珣偕游。颜光敏共两次集中游历金陵,其一为是年,其一为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江南游历。《南游日历》中并无颜伯珣从游的记录。据此可知,该组诗系作于是年。

作《送王考功西樵归里》。王士禄(1626-1673),字子底,号西樵,山东新城人,王士禎兄。顺治九年进士,官吏部考功员外郎,有《西樵集》《十笏山房集》等。《王士禎年谱·王考功年谱》记载:康熙九年九月,王士禄时年四十五岁,居家八载,始得以母命还官,补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十

①冒怀辛:《施闰章的生平与学术思想》,《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

②赵传仁等:《颜光敏诗文笺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13页。

年十一月，以遵旨一并详察议奏事都察院议，王士禄竟降二级。后王士禄返里，很快病故。^①康熙九年，颜光敏赴龙江关榷关税，十年五月离任返京。二人交集当在此年，此诗亦为颜光敏送王士禄返乡所作。诗中云：“忽晚苍生肺肝热，银瓶欲上丝绳断。古来贤达皆转蓬，尼山片席何曾暖。绞人泪迸明月珠，可怜弃掷沉泥涂。海水直下深万里，谁施铁网求珊瑚。”对王士禄因无私荐贤及因言获罪被罢官深表同情。

康熙十一年壬子，公元1672年 33岁

家事/本事：

康熙命学臣选拔诸生以实成均，县学例一人，府学二人。力言于当事，故至今四氏学贡额得比于府。又请复录科以收人才，制曰“可”。科闱北场多蜚语，磨勘日，诸公瞻徇不前，读韩荻卷，皆搔首咋舌，不解何语。独击节叹赏曰：“主持风气，赖有斯人。”谤始止。

张贞拔贡。张贞（1636-1712），字起元，号杞园，山东安丘人。是年拔贡，官翰林院孔目。有《杞纪》《潜州集》等。颜光敏有《赠张杞园》纪之。

诗文系年：

作《躬侍籍田有作》。《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十一年二月丙辰，上亲耕籍田。”

作《南苑扈从八首》《南苑》。《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一年八月，“壬子，上幸南苑行围。”颜光敏于上一年结束龙关任返京，当于是年扈从康熙进行登基后的首次大规模围猎。施闰章对该组诗评价甚高：“《南苑扈从八首》，则粹然古人，功悉到。难在应制体，不寒俭，又字字新警。颂美之中曲寓讽谏，油然忠孝之意盘郁言外，于此道三折肱矣。”

作《送宋观察荔裳之蜀》。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进士。其诗明丽如花，温润如玉，同施闰章有“南施北宋”之称。康熙十一年（1672），授四川按察使。该诗当作于是年。

作《十二砚歌赠汪蛟门》。汪懋麟《十二砚斋记》：“壬子（康熙十一年）秋九月，余清羸卧疾，梦入广廷，四面列大几，几上古砚多不可以数计。墨光滢滢，爱取其十二出。……觉，于枕上赋诗纪梦，喜而名其斋。噫！亦幻且怪矣。而四方贤士之与余友者，不以为幻且怪，多乐为传道，兼为作记与诗，遂若真有是砚与斋者。”

作《送高少司寇念东予假归》。高珩（1612-1697），字葱佩，号念东，山东淄川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授检讨，官至刑部左侍郎。少司寇即刑部侍郎的别称。高珩于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病告归里，并言“不作出山矣”。其后，于康熙十八年短暂起复后，即于第二年致仕。^②而康熙十八年颜光敏居家守制，第二年秋即告假南游。故该诗当作于是年。

康熙十二年癸丑，公元1673年 34岁

历史大事：

十一月，吴三桂于云南举兵反清，三藩之乱始。

家事/本事：

买宅西城宣武坊。

二月，伯兄颜光猷试礼闱，引疾避之，不与闱事。三月，颜光猷进士及第；八月，选庶吉士。

八月，母朱氏东归，扳輿送至芦沟桥，涕泗交颐，都人见者，俱为感动。

九月，奉命考试善书画者，充两殿书办官。应募者二百余人，录何湛、周京等九十人，后去取

①程轶：《清初诗人王士禄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7页。

②王秀文：《高珩与〈栖云阁诗〉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4页。

有差。旧例,江南贡表监司每岁二人,自分两藩后,遂需四员,驰驱无宁日,职务多旷。请兼贡,许之。又奏礼部官专用进士,更定试卷磨勘例。议烈妇余氏旌表,氏遇强暴自缢,金欲不准,力争始定。贞烈并旌,自此始。

冬,闻滇警,常蹋鞠骑射以习劳。

是年京察考语:“明、敏、勤、练,称职。”

诗文系年:

作《送程周量之桂林》。程可则(?-1673),字周量,广东南海人,顺治九年会元,以磨勘停殿试。十七年始应阁试,授中书舍人,升兵部郎中,出知桂林府。清初著名剧作家,诗文亦有名,为“岭南七子”之一。著有《海日楼诗文集》《遥集楼诗草》《萍花草》等。《清史稿》有传。《国朝诗人征略》载:“1673年,以兵部职方郎中出知桂林府……寻卒于官。”^①

是年两次作诗赠徐乾学。《德国日历》载:康熙癸丑年,“九月二十二日,为诗送原一。”“十月初十日,和送原一诗韵二首。”惜未传世。

康熙十三年甲寅,公元1674年 35岁

家事/本事:

下值多弹琴。编辑会典,及颁诏仪注,定朝仪。

秋,以长女适曲阜孔兴焯。

诗文系年:

辑《礼制新书》。《年谱》记载:是年,“编辑会典,检前朝实录,集《礼制新书》,删改礼律繁重蒙累之处。”未传世。

作《送井丹文之任洛阳》。井洛如,字丹文,山东东平人,康熙六年与颜光敏为同榜进士。《德国日历》载: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二十七日余招饮井丹文——洛阳令。”“六月十一日为诗送丹文。”

作《秦以御应武科不第歌以送之》。秦定远,字以御,江苏泰州人。康熙二年武科举人,会试屡不第,后绝意仕途。奉母孝。事载《泰州志·孝义传》。《德国日历》载:康熙十三年甲寅,“四月二十五日,至慈仁寺晤秦定远。”“九月二十六日,邀秦以御饮。”

康熙十四年乙卯,公元1675年 36岁

家事/本事:

退食之暇,从宣城施闰章、新城王士禛论诗。同游者有田雯、曹禾、王又旦、曹贞吉、汪懋麟、谢重辉、宋荦、林尧英、叶封,世传都门十子。倡刻《十子诗略》。

八月,改吏部稽勋司主事。

十二月,以建储,诰封奉政大夫。四女生。

诗文系年:

作《送赵玉藻典试广东》。赵文熹,字玉藻,号铁源,山东胶州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有《粤游草》。《德国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传广东考官宣旨(赵文熹、卫远扬)。”“闰五月初三日,为诗送铁源。”

作《送刘价人》。刘始恢,字价人,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刘昌言次子,康熙九年进士。历官大理寺右评事,吏部考功司郎中、文选司郎中等,致仕归。诗中首联云:“五年魂梦逐江云,却忆骊歌手易分。”末联云:“此去争传山吏部,闭关休拟醉参军。”联系《送赵玉藻典试广东》,可推测

^①(清)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该年为地方乡试年,该诗为康熙十四年刘始恢以吏部官员出任江南某考职时颜光敏的临行赠作。

作《王隐臣至都赋赠》(王善琴,尤工《耕歌》《关雎》二曲)。王隐臣:苏州人,著名琴师,与颜光敏、光敏、孔尚任等有交往。《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十月二十日,苏州王隐臣忽来,促膝鸣弦,宛如畴昔,计别十七年矣。”

作《送屠尹和任扶沟》。屠又良,字尹和,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康熙二年解元,九年进士,颜光敏为其座师,二人有师生之谊。十四年任河南扶沟知县。《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五日,尹和除扶沟令。”“五月十八日饯尹和。”

作《献岁三日同年集饮和沈康臣韵二首》。沈胤范(?-1675),字康臣,浙江山阴人,康熙六年进士,与颜光敏为同榜进士,故诗题中称“同年”。历官刑部郎中,有《采山堂集》。《德园日历》载:康熙十四年乙卯,“正月初三日至会馆团拜,至者三十四人。……十七日和康臣韵二律。”《乐圃集》另有《沈康臣见过同作》五言律诗一首,不知作于何年,但从内容看二人关系密切,交往频繁。

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 1676 年 37 岁

家事/本事:

在万柳塘同冯溥等二十余人放生会。

冬,迎养母朱氏于邸第。子颜肇维同来京师,令就学,口授《同蒙》《急就》诸篇,不令出门嬉戏。

十二月二十一日,父颜伯璟逝世。二十三日,顾炎武来夜宿。事载《年谱》。

诗文系年:

作《送曹颂嘉假归》。曹禾,字颂嘉,号峨眉山,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科,授检讨,官至国子监祭酒,罢归。工诗,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子”。有《峨眉山集》行于世。《德园日历》记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十日,为诗送峨眉。”

作《送孙杞瞻假归》。孙在丰(1644-1689),字杞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进士,授编修,直起居住,充日讲官,进讲屡称旨。累迁工部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七月初七日,孙杞瞻辞行。……初十日,往送孙杞瞻,未遇。”

作《为梁予培题嘉庄农隐图(方吉偶画)》。梁予培:事迹不详。方吉偶:即方亨咸,字吉偶,小字哥哥,号邵村,安徽桐城人。顺治四年进士,官御史,能文善画,精于小楷。画作《深林垂纶图》现存日本。《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初一日,题梁予培嘉庄农隐图。”

作《放鲤行》。《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八月初八日,至万柳堂,同冯益都、姚司寇等二十人为放生会。”

作《送魏子相庶常归养》。魏子相:即魏希徵,字子相,山东郅城人。康熙五年解元,十五年(167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仕讲、东宫日讲官。《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十五日,王北山、田子纶同往饯魏子相。”

作《陪李少司马望石花下饮戏赠》。李赞元(1623-1678),字望石,山东海阳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十三年授山东道御史,后奉命巡视京师,巡按湖北,巡视两淮盐政。康熙元年以镇压于七起义深受康熙帝重视,康熙八年授兵部督捕理事。十二年擢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故称少司马。《京师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四月初八日,同李望石丰台观芍药,过祖氏园亭藤花下豪饮。”

作《喜李天生至都赋赠》。李因笃(1632-1692),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庠生,博学强记,精通经术。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宏词,授检讨,母病归养,不再出仕。著《诗说》,顾炎武称之。《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二十二日,闻李天生至,访之未遇。”“七月初六日,邀天生饮,夜大雨。”

作《九月十日子纶邀同人泛舟东河醉歌》。田雯(1635-1704),字子纶,亦作紫纶,山东德州人,康熙三年进士,由内阁中书历官户部侍郎。善诗,为“金台十子”之一。有《古欢堂集》。《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十日,晴。子纶邀至东便门泛舟,过庆丰闸,登土城眺,抵暮归。”《田雯行状》载:是年,(田雯)奉旨监督大通桥漕运,作五言古诗一篇,勒石官廨,召集同人,泛舟通济河,绘图题七言歌行一篇,和者众多。此诗当作于此时。

作《送谢方山赍诏江西》。谢重辉(1644-1711),字千仞,号方山,山东德州人。吏部尚书谢升子,以父荫起家,历任刑部郎中。博雅好古,工诗,为王士禛所推重,与颜光敏俱列“金台十子”。有《杏村诗集》七卷。《德园日历》载: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朔日,为诗送谢方山颁诏江西”。

康熙十六年丁巳,公元 1677 年 38 岁

家事/本事:

正月,父亡故讣告至,京师故旧及四方挟策之士,咸来观礼。

成服后行,二月抵里,与邑人孔尚任酌议丧仪,殡虞卒哭,一如古礼。

十一月,葬父颜伯璟于城东侍郎之林。

是年,王士禛选宋琬、王又旦、颜光敏、叶封、曹贞吉、谢重辉、于炜、曹禾、汪懋麟、田雯之诗为《十子诗略》,编定刻之,世称“金台十子”。

康熙十七年戊午,公元 1678 年 39 岁

家事/本事:

析产,以母在不敢从。母朱氏曰:“汝与兄俱宦京师,余暮年老妇,就养之日方多。诸弟不习稼穡艰难,他日何以自立?其勉应命。”始取瘠土蔽器,曰:“存此以养旧德耳。”良田广宅悉让诸兄弟。时时称述祖训,陈忠孝以勉后学,著《家诫》四卷,世比黄门《家训》。

康熙十八年己未,公元 1679 年 40 岁

历史大事:

七月,北京发生大地震。

家事/本事:

辑父颜伯璟手书,凡片牍只字,俱装成帙。四月服除。

九月,出游吴、越。历泉林、蒙山之境,遵郟、沂而南。小史挟褚墨后从,日有记,是为《南游日历》。

诗文系年:

作《蒙山》。《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乙未,“九月二十八日,(蒙山)巨石欹滑,从者皆股栗,乃造绝巔……日已曛黑,遂宿僧寮。”

作《郟城》。《年谱》载: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始南游,(十月)“初三日,行六十里至倾盖亭,为夫子过程子处。亭北有祠,北为白马河。六十里至郟城县,余尝两至其地,故交尚多。”该谱还前面记载:“(九月)二十七日,出东郭有仲子庙。四十五里至卞桥,为卞庄子旧邑。又五里为泗水源,乱泉潏洄可数十亩。……余于癸卯岁两至其地,竟不能悉其支脉也。”则可知最早游郟城则在康熙二年癸卯,是年乡试中举,座师为郟城令金煜。中举后拜访座师时进行的游历则见于《过郟城赋呈会稽子藏金夫子八韵》,欣喜、感激之情冲溢其中。而该诗中首联即云:“去国今何许,乡关泪眼中。”尾联为:“相看饶笑乐,不敢怨途穷。”诗中去国怀乡、日暮途穷的悲凉心的情感力透纸背,与中举后欣喜拜师的氛围不相符。从友人与颜光敏的信函可知,康熙十五年颜光敏兄因父亲颜伯璟去世而回乡丁忧守制,服除后起补暂时无望,故决计南游。诗中末联“途穷”之叹

即可证也。

作《别徐原一赞善》。《康熙实录》载:“康熙乙卯,升徐乾学在春坊左赞善。《德国日历》载:康熙丙辰,“十二月初四日,晤顾宁人,吊原一、公肃。”“十一日,为原一兄弟知客。”盖徐乾学母于康熙丙辰年去世。颜光敏父亦于同年腊日去世,二人先后回乡守制。《南海日历》载:康熙己未,“十月初八日,缘堤行。……遇徐健菴舟行,登舟与语良久。”是年二人先后服徐,一还京起复,一告假南游。诗中首联云:“芜城南望旅魂惊,太史邮签促水程。”末联云:“两地登临余感慨,含凄不独故乡情。”生动体现二人不一样的境遇与心情。故该诗当作于是是在是时。

作《将至扬州怀王阮亭》。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次年任扬州推官,历官至刑部尚书。有《阮亭诗抄》《渔洋山人精华录》等传世。由前文知,颜光敏与王士禛相识于康熙十五年,并从其论诗。后颜光敏倡刻《十子诗略》,为王士禛激赏。王士禛任扬州推官时,主持江南文场,为士子雅望,一时蔚然从之。颜光敏释服请假南游,当得到王士禛的支持,故有此诗。颜光敏初到扬州,即受到当地文人雅士的欢迎。《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己未,“初九日,……至扬州”。“二十日,寒。穆倩、吴棣香苑、汪扶晨徵远微、程山尊谦、江颖上湘右、李□□世栋、程象六之謨、黄自光元治来。至秋岳寓,同园次、穆倩辈,步至问花期酒亭,釀金欢饮。凡四十三人:嘉兴曹秋岳溶、赣州鲁青藜燦、辽东席允叔居中、河南崔兔床干城、山西高森万肇奎、湖州茅天石麀、闽湘人南仲、吴江吴闻伟鏞、吴小修之纪、顾樵水樵、顾起东正阳、休宁查二瞻士标、王叔定耀麟、蒋前民易,系瓜州人、太仓邹乾一震谦、涂子山西,系江西人、山阴金远水灏、江宁宗鹤问观、山阳黄大宗之翰、黟县黄自先元治、江都萧灵曦晨、宗定九元鼎、凌又蕙畹、吴园次绮、程穆倩邃、程未能必大、江梁雪澧、曹子石云、吴鹿园苑、吴石叶参成、孙汲山继登、王仔园宾、毕右万三复、闵宾连麟嗣、闵义行弈仕、江郢上湘、程葛川洪、汪上诺若、江右李□□世栋、吴叔子度、汪肃然起敬。补诗未到席,凡八人:吴县邓孝威汉仪、四川余生生嘉、番禺屈翁山大均、金坛周东会而衍、于方曼倩、竟陵黄大木楚樟、陕西孙豹人枝蔚、晋江林天一贞。”此前在扬州十余日,亦是招饮不断。足可证也。

作《集席允叔斋得江字》。《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十三日,席允叔招饮。”席居中,字允叔,辽东人,辑有《昭代诗存》十四卷(康熙十八年刻本)。

作《己未除夕寓学山园八首》。《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乙未,“十二月二十日,寓学山园。”“十二月二十九日,至夜为五言诗八首。”《颜修来诗文笺注》题为《庚申寓学山园八首》,当误。“十子诗略本”《乐圃集》亦题作《己未除夕寓学山园八首》。另据《南游日历》载,颜光敏庚申除夕是在田雯句容署中度过的,时田雯任江南通省学政按察使司剑金事。其中第二首首联云:“连夜于岑岑,溪山一倍深。”涔涔:久雨不止貌。《南游日历》载: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雨竟日,二十八日晚雨。二十九日稍晴旋雨”。

作《伏读上谕因地震修省成十四韵》。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三河、平谷大地震。《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壬戌,召廷臣谕曰:‘朕躬不德,政治不协,致兹地震示警。’”时颜光敏正值南游,得谕而作,当是在是年。诗中云:“三载辞京辇,层霄望独悲。”从颜光敏康熙十五年离返里丁父忧,至是已满三年之制,故云“三载辞京辇”。

康熙十九年庚申,公元 1680 年 41 岁

历史大事:

是年,三藩之乱基本平定。

家事/本事:

《年谱》载:是年,“客南中逾年,以山水朋友为性命,甘置一官,不思莅任。春游峰泖,下松陵

禾中,居武林半载,无日不与山色湖光相往复。观潮钱塘,溯桐江三衢。东访禹陵,遍历云门、显圣诸寺,与高僧数辈作方外游。登临所惬,辄呼好手,泼墨为图。”

诗文系年:

作《元夕松江竹枝词》。《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抵松江府”,“十五日甚暖……作《竹枝词》。”

作《张梅岩斋燕集得岑字》。《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十六日,诸公集张梅岩家,招饮凡二十人,剧饮分韵得岑字。”

作《游小昆山天晚归棹不及登陈徵君眉公读书台》。陈继儒(1558-1639),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仲醇,号眉公。绝意仕途,隐居小昆山,屡征不出,专心著述。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有风致。工书,法苏、米,亦间画山水梅竹。著有《眉公全集》。《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二十七日,游小昆山。”二月十九日再游,“往游婉娈草堂,中有眉公木榻,其东石壁镌‘读书台’三大字,眉公书,二陆(晋陆机、陆云)读书处也。”

作《同鲁太守谦庵超再游横云山》。鲁超,字文远,号谦庵,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顺治十七年副贡生,历官松江知府,广东惠潮道,广东布政使,所至皆有惠政。《浙江通志》有传。据《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二十七日,游横云山。”“二月十九日,再游恒云山。”

作《集张带三斋得浓字》。张若羲,字带三,青浦(今上海市)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初三日,张带三招同屈翁山饮”,“初四日,同翁山分韵为诗”。

作《小昆山宝奎阁观世祖皇帝御书恭赋》。《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十九日,和尚邀登御书楼,楼藏世祖章皇帝御笔大小字十余幅。”

作《徐方虎邀同黄伯和吴赤一孙杞瞻泛舟西湖得莼字二首》。徐倬(1624-1713),字方虎,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授编修,擢礼部侍郎。著有《道贵堂类稿》《萃林集》等,辑《全唐诗录》。黄士坝,字伯和,浙江石门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吴瓚,字赤一。《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七日,徐方虎邀同孙杞瞻、黄伯和、吴赤一泛舟西湖,回舟见鬻莼菜,笔之为羹,味清脆。因以‘莼’字限韵为诗。”

作《李毅可王印周邀泛西湖》。李士桢,字毅可,山东都昌(今青州市)人,官至广东巡抚。王日藻,字印周,松江(今属上海市)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历官户部尚书。《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四月初四日,李毅可、王印周邀登湖舫,至湖心亭饭毕,放舟湖中。”“初六日,作泛湖诗。”

作《赠张杞园》。张贞(1636-1712),字起元,号杞园,山东安丘人,康熙十一年拔贡生,官翰林院孔目。尝游施闰章之门,与王士禛交往密切。事母孝。间岁出游吴越,与高士名僧邂逅山水间,觞咏为乐,购书千百卷以归。晚居杞城故园,故号杞园。著有《杞纪》《潜州集》等。《南游日历》载: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二十八日,至杭州。”“四月二十六日,张杞园贞自青州至,谈竟日。”此诗应是此时作。

作《御制诗颂(代李制台邳园)》《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记(代李制台邳园)》。李之芳(1622-1694),字邳园,山东武定人,顺治四年进士,授金华府推官。历官至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六月庚子,以吏部右侍郎李之芳为浙江总督。”制台,是明清时期对总督的敬称。《御制诗颂(代李制台邳园)》云:“臣某向叨侍从,……今管理织造内刑部郎中臣遇知,恭奉上赐御制诗及御书‘敬慎’,又唐诗一首。”《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记(代李制台邳园)》中云:“余奉命督吴越军,移镇于衢,于今七年矣。”《南游日历》载:“庚申六月十二日,晴,泗柯来。邳园招饮。……十五日,邳园招饮,深谈,嘱作《御制颂诗》。……十七日,邳园招饮,夜归。嘱致

文士,《康亲王凯旋诗》《仙霞关关侯庙天雨庵记》。……十八日,邨园、泗柯来舟中别。复往晤邨园,话别。……七月二九日,李邨园先生书至。……八月初四日,复邨园书。……初八日,遣人之衡州荐吴庆百、林鹿庵、徐大文。……二十七日,李邨园先生遣人致书。”《颜氏家藏尺牍》收藏李之芳给颜光敏信札四封。其一云:“日承枉顾柯阳,得领警颔……台旌东指,当在何时?率此奉候。所烦大作及物色诸名人,想荷留神,统祈即示。”其二云:“鞅掌戎旌,屡逢虚度,然疲役,自叹劳生……承示大诗文,典赡风华,俾弟攘美,感何如之!诸友皆属名下,弟愿见有怀,亦非朝夕,希老年翁代为道意。湖上胜事如何……便中容再致之。别教当俟酌夺另报。”其四云:“前承翰教,勿次附复。……前所云林生,恐江干舟楫维艰,今特专人奉迓,烦老年翁转致,幸即俾发。日有碑版文字数首,欲藉图商,久已悬榻待之矣。淳安留代,已即批行。”其三云:“班师北旋……顷接翰教,得谗近履。……承谕当为留意。必须来谒而后酌定也。林生抵衢,自是端谨之士。余俱悉之。”颜光敏在《李制台邨园寿序》中云:“方公长西台时,凛凛如泰山乔岳。及功高望崇,乃益觉冲穆谦退,恂恂如不欲出诸口者。余尝屡叩平乱始末,言之甚觉平易,无一激词。其功若彼,其德若此,何一非遐龄之验载。余于公为同里,又素荷推爱,谊不可以谀辞进,止纪所闻如止。”

作《寿李制台启》《李制台邨园寿序》。《李制台邨园寿序》云:“岁在庚申,今上龙飞之十有九载,天子以闽浙既平,始行庆赉,……是时,总督尚书李公坐镇三衢,绝口不言劳者七年矣。八月,余在武林,见其士民童叟薰香于衢,诣佛寺神丛再拜祝颂。”《康熙实录》载:“康熙十六年七月甲午,加浙江总督李之芳兵部尚书衔。”康熙于1661年即位,至是年在位19年。故《寿序》称“今上龙飞19年”。

作《赠浙闽总制李邨园二首》。第二首诗颈联云:“早聆南国歌廉叔,得近中台御李君。”

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1681年 42岁

家事/本事:

《年谱》记载:是年再过金陵,追念旧游,遍牛首、栖霞、九华、三茅诸胜。入皖舒,复下邗江,乱京口,还吴下。倦游思归,渡江,途经凤阳,询祖父颜胤绍宰凤阳政绩及家泰屏太守骂贼时事。

十月,返里。于宅西边买石筑山,穿池引水。慕姑苏清嘉坊朱氏之乐圃,即以名其园,更号乐圃主人,吟啸其中。与孔尚任考订礼乐,阐天命之微,欣然有得。时督诸弟读书,追述先德,悲不自胜,诸弟咸感泣力学。

是年,田雯届期考核,取两江大小衙门印结,给人下石之机(田需《田雯行状》)。颜光敏与江宁巡抚余国柱友善,从中斡旋。据《南游日历》载,田雯与颜光敏往复交流,并多次彻夜长谈。《日历》中提及田雯者58次,为《日历》最。《尺牍》中藏有田雯与颜光敏信札28通,数量仅次于王世禎(31通)、顾炎武(29通),其中多封信札请颜光敏倾力救助。

诗文系年:

作《京口》。《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十二日,登北固山……西见楼观参差为金山;东望烟树迷离,为焦山。”诗中首联即云:“十里荒烟接岸青,金焦疑对两浮萍。”可证也。

作《游燕子矶》。《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初十日,回舟登燕子矶,登石道,造绝巔,有亭。青山四望,夕霏转深。北下如鹿颈,尽处怪石巉岩,江水吞噬其根。”

作《重登牛首山》。牛首山:在南京西南。《年谱》载:“康熙辛酉,府君年四十岁,再过金陵,追念旧游,遍牛首、栖霞、九华、三茅诸胜。”《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正月二十七日,暮抵牛首,入弘觉寺。”

作《江阁》。《南游日历》载: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十日登观音阁,架木数丈,下临江渚,以铁索系石壁,岌岌动摇。”

作《湖上》。康熙二十年辛酉八月二十六日,光敏游历江南已二年,将返,自昆山至苏州,经阳澄湖而作此诗。

作《送徐方虎假旋兼寄孙杞瞻》。《徐倬〈全唐诗录〉研究》载:“康熙二十二年,(徐倬)服阙赴京,转司业。”^①康熙十九年颜光敏与徐倬、孙在丰同游西湖。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元1682年,43岁

家事/本事:

三月,登岱,游历下湖山。事载《历下纪游》。

四月,制府于成龙与江宁巡抚余国柱合奏“公明尤著”考语,田雯得归。颜光敏与有力焉。

七月,假旋,赴京。

九月,补吏部验封司主事。

冬,迎养母朱氏于京邸。

诗文系年:

作《张夏道中》。《历下纪游》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七日宿张夏。”张夏在泰山北麓,今属济南长清县。

作《送汪舟次使琉球》。汪楫,字舟次,号悔斋,安徽休宁人,侨居扬州,为王士禛门人。举康熙十八年“博学宏词”科,授检讨,充册封琉球正使,官至福州布政使。著有《悔斋集》。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国王请求封爵,汪奉使前往聘问。

作《未信编》一卷。事载《年谱》,未传世。

作《与张进士论格致书》《再与张进士书》。《年谱》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至都,与及门张烈论《大学》‘格致’,反复辩论累数千言。”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元1683年 44岁

历史大事:

家事/本事:

正月,迁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署考功司事。见子颜肇维羸质,教以守身之道:“为人子者,居则慎疾,出则慎交,君子无犯刑,胜于五鼎之养也。”时当计吏,门馆肃清。俸钱所入,结蕴阁于邸第之南,读书其中。

六月,侧室徐氏歿。

冬十月,为子颜肇维娶黄氏妇。

诗文系年:

作《送孙予立使安南》。孙卓,字予立,号如斋,安徽宣城人,官翰林编修。《大清会典》载:康熙二十二年复遣翰林官二员册封黎维正为安南王,给以镀金银印,并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初一日,孙予立辞行使安南。”

作《送周星公使安南》。周灿,字绀林,号星公,陕西临潼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四川提学使。有《愿学堂集》。安南:旧国名,今称越南,其自秦汉以后,即为我国藩属,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交州(今河内)。《大清会典》载:康熙十三年,安南王黎维禧卒,嗣王黎维正具疏告丧,二十一年遣使朝贡。二十二年命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使安南赐恤、致祭安南故王。

作《奠侧室徐氏文》。《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月三十日,徐氏妾病笃。”“六

^①徐一丹:《徐倬〈全唐诗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年。

月初五日酉时，徐氏妾歿。”“二十九送徐氏妾柩于育婴堂之东。”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元 1684 年 45 岁

历史大事：

十一月十七日，康熙至曲阜，亲书“万世师表”四大字。

家事/本事：

三月，升吏部验封司郎中。是月以次女嫁李昭。

五月，次女亡，为文以祭，哭之痛。

初，康熙甲辰会试废八股时文，改为二场，初场策五，次场经书论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乙酉复三场旧制，时有曰颜光敏射策成进士者。乃日课时文一篇，庄雅钜丽，出入六籍，在制义中自成一家之言。

秋八月，季弟颜光敦参加乡试，中举。

时康熙欲东巡，命议典礼。谓宜仿古巡守礼，经泰山用祀五岳礼，经阙里用本处丁祭礼，用之。

九月，以覃恩诰授奉政大夫。

诗文系年：

作《思悲翁》。《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三年，颜光敏次女丧，哭之恸，详见《祭二女文》。故该诗当作于是年。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颜敏（1617-1684），字乃来，别号澹叟，河北宛平（今北京市）人。顺治二年（1645）举人，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十五年郑成功大举反攻，大江南北各县纷纷响应，但不久败走。清兴大狱，敏典江南司，多所平反。事已，出为安徽池州知府，为官三年，政绩第一，遂迁湖北按察司副使守上荆南道，不久迁布政司参政，分守下荆南道。补贵州按察使摄布政使，不久迁广西右布政使，改陕西左布政使。康熙十九年（1680）为广西布政使，二十三年卒于官。生平见毛奇龄《颜君墓志铭》。颜敏是光敏之父辈，故称宗丈。《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十四日，广西方伯卒于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四年乙丑，“五月二十五日至西直门迎方伯丧。六月十六日至净土庵祭方伯。”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初五日送方伯宗丈于净土庵傍。”

作《祭二女文》。《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女病笃。”“二十七日，申时亡，亥时殓。”“六月初三日，为文祭亡女。”“二十七日，出永定门送亡女殡于张氏庄。”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元 1685 年 46 岁

历史大事：

是年，康熙命将所书“万世师表”四字刻石，颁至全国府州县学悬挂。

家事/本事：

弟光敦试礼部不中，督责严切。比归，限以家居日课，故光敦卒成进士。

衍圣公《幸鲁谢恩疏》牵引葛某，黜其名。又疏内只称孔族，驳改为“孔氏等族”，一时清议快之。

先是，颜氏之居曲阜者，其田租较他姓独重，谓之寄户。白之抚军张鹏，奏请减租，例比孔氏，宗党至今感恩不衰。

下值，日读书不辍学。子颜肇维以节劳请。答曰：“吾自乐之，殊不苦也。”

诗文系年：

作《祭编修张武承文》。《京师日历》载：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十三日，武承歿。”“十四日，奠武承。”“十九日，为文奠武承。”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京师日历》载：二十四年乙丑，“五月二十五日，至西直门迎

方伯丧。”“六月十六日,至净土庵祭方伯。”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元1686年 47岁

家事/本事:

四月,充《一统志》纂修官。刊《未信堂制义》八十篇,皆比年自公之暇所成者。徐乾学目为体大思深,方之前辈唐襄公文。韩茨读之,谓为知本之儒。

五月,母朱氏年七十,与兄光猷宦京师,叔父诸弟咸在,为之寿。内而名公巨卿,外而岩穴知名之士,莫不仰朱氏之节,重颜光敏之品,制为诗歌,跻堂拜母,于时宾客称极盛。朱氏顾而色喜曰:“昔兖州城破之时,岂料家口得相聚。汝与兄今托先人福庇,得从翰铨之末,回想四十年前,何如景象?今门庭若此,尔辈俱当勉之!”家庆之后,留季弟光敦读书邸第,每陈经共治为乐。

八月,寝疾。

九月晦日,卒于京师宣武门私第。田雯曰:“已矣!吾山东又失一才人矣。”哭之逾时而悲。次年丁卯,子颜肇维扶榇归里,腊月十七日葬于曲阜城东侍郎之林。

卒后,相交廿年的好友朱彝尊为写《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颜君墓志铭》,多名言,世多不易见。葬后二十三年,桑梓至交孔尚任为写《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颜公墓表》,以生与同时为幸。

诗文系年:

作《祭广西方伯乃来宗丈文》。《京师日历》载: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初五日,送方伯宗丈于净土庵傍。”

On the Chronicle of Yan Guangmin's Life and the Creative Years of His Poems and Articles

Sun Shuping

(Institute of Qilu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Yan Guangmin is not only a famous poet and social activist but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Yan family in Qufu rising suddenly in the early part of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rarity of the literature concerned, the research on his life and poems is inadequate. Based on *Chronicle of Yan Xiulai's Life* written by his son Yan Zhaowei and his four personal diaries and his poems and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n Yan Guangmin's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commentaries on the creative years of his poems and articles. However, owing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historical data, articles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are temporarily lacking, and we are expecting more valuable articles to come out.

Key words: Yan Guangmin; chronicle of life; poems and articles; the creative year of poem and article; commentary

责任编辑:孙昕光

2017 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总目录

第一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下去”与“上去”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张先飞(1)

体制认同与前期《诗刊》的发展 蒋登科(14)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 姜智芹(24)

□ 美学研究

中国当代人格美学思想的建构思路 周 波(37)

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陈宗花(50)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罗 静(61)

□ 马克思主义研究

科学利用文化资源 推进中华文明发展

——研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思考 …………… 周向军(69)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光辉永存

—列宁最后口授文献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高继文 赵纪梅(76)

□ 哲学研究

斯宾诺莎的“身体”概念

—兼论其“身—心同一”理论..... 崔若楠 崔永杰(87)

☐ 教育学研究

服务功能视角下大学资源与社会共享研究 范晓婷 张茂聪(97)

发展性学生评价:内涵、范式与参照标准 王焕霞(105)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闲暇时间研究 田 甜 王友国(111)

☐ 历史学研究

汉代臣子承天变之责的理论基础与转折事件 陈敏学(122)

□ 经济学研究

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与启示 王 昶 章锦河(131)

文化差异视角下的经济管理绩效研究 车 瑞 余祖伟 (140)

☐ 影视学研究

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大片战略的风险 邱章红(146)

第二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舍下论学:关于文学	孔范今(1)
论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意义建构与文学性表征	王寰鹏(15)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述评与反思	陈夫龙(31)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钱基博的古典文学研究	周远斌(46)
------------------	---------

□ 中共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	刘 斌(54)
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的思考	乔仁桂 张荣华(68)

□ 历史学研究

墨子的丧祭思想	
——基于《墨子》一书的考察	何 丹(80)
荀子的“孔子问题”初论	李福建(90)

□ 教育学研究

教育何以是一项现代化事业	
——基于启蒙现代性视角的阐释	陈 仁 杨兆山(98)
回顾与反思:我国幼儿阅读研究三十年	苏 敏 魏 薇(107)

□ 影视学研究

论近几年国产电视剧的自然主义症候	和 磊(119)
------------------------	----------

□ 语言学研究

日本明治时代《玉篇》类字典的版本与价值	王 平 李 凡(126)
略论《聊斋俚曲》语言的形式美	刘太杰(141)

第三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张中良(1)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

——以“山师学派”为例 魏 建(13)

抗战时期老舍对传统“忠”观念的改造利用

——以京剧为媒介 刘亚美(22)

□ 马克思主义研究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历史合力论的逻辑关系探析 高兴成(39)

□ 社会学研究

基于全民健身的养老服务品牌研究 葛书林(48)

论大学生创业教育长效机制构建 赵 健(57)

□ 历史学研究

回顾、反思与前瞻

——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 高 旭(65)

“伊斯兰国”兴起的多因性探析 赵文亮 贾龙阳(87)

□ 教育学研究

国内学生沉默研究的元分析

——基于 2002-2016 年的文献 时广军(98)

山东省地区高等教育产学研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涛(106)

□ 心理学研究

结果与过程:时间折扣模型与随机动态模型之比较

..... 王大伟 郝垒垒 胡艺馨 时 勤(117)

□ 影视学研究

新世纪性别意识下文学的电影化传播 魏李梅(127)

□ 法学研究

行政诉讼证据失权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完善 李 傲 上官腾飞(136)

□ 语言学研究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郑炜明(145)

第四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朱德发(1)

吴伯箫年谱

——家世、早年求学与东北办学 张 欣(14)

□ 外国文学研究

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 李光贞(38)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韩 琛(52)

□ 经济学研究

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 王亚平 任建兰 程 钰(68)

土地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评述 吕玉霞(77)

□ 文化研究

道安所创檀溪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谭 洁(88)

□ 哲学研究

尊道而贵德

——老子德之思想论析 韩云忠(96)

□ 美学研究

书法艺术之人文与生命美学精神初探 蔺 若 李天道(105)

□ 心理学研究

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 董会芹(115)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基于 2011-2015 年《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刊载文章的分析

..... 刘桂荣 张景焕(123)

□ 教育学研究

中小学特色办学:内涵、误区与路径 李 鹰(133)

“需求-目标-激励”一体化学校管理策略研究 张 亮(139)

□ 影视学研究

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叙事时空 杨 舒(147)

第五期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总体估价问题 王卫平(1)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孙俊杰 张学军(11)

新生代小说家游戏性历史叙事研究 张琴凤(21)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强制与偏移:《水浒传》文本阐释的问题与反思 俞武松(31)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及启示 孙天蕾(46)

□ 政治理想教育研究

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部分高校学生党员择业观调研 神彦飞(56)

□ 新闻学研究

试论媒介偏见的经济效益转化

——以半岛电视台为例 常 庆(67)

□ 经济学研究

山东省劳动力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研究 包玉香(73)

□ 历史学研究

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 田海林 王 芳(86)

□ 教育学研究

优良品格的形成及德育镜鉴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视角 李国祥 于洪波(96)

老子“道知”性质探微

——兼论其对学科教学的启示 王康宁(104)

教师实践智慧:缘起、内涵与养成 曹珺玮(113)

□ 编辑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学术建设述略 翟德耀(121)

第六期

☐ 本刊特稿：十九大精神阐释

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学习十九大报告的几点体会 马永庆(1)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诘问历史：《死水微澜》为什么会被漠视？ 宋剑华(9)

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 董 燕 郑家建(21)

☐ 文艺学研究

王阳明：开启中国文艺复兴大门的思想家 李衍柱(31)

☐ 历史学研究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季桂起(49)

汉代列侯爵溯源考 秦铁柱(57)

☐ 经济学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日本的应对 中村宗悦著 李光贞译(68)

基于《时事新报》初期社论看福泽谕吉的中国贸易观 堀 和孝著 孙守峰译(79)

☐ 心理学研究

积极情绪和服刑青少年心理症状的关系：人际协助的中介作用

..... 张 莉 赵景欣 张文新(87)

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姜言霞 卢 巍 毕华林 卢姗姗(94)

☐ 美学研究

诗是生命的表现

——方东美诗学美学思想探微 兰希秀(105)

☐ 传播学研究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以“山东疫苗案”为例 张 贝(114)

☐ 语言学研究

“一言不合就 XY”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 孟祥英(121)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颜光敏年谱与诗文系年 孙书平(131)

“第五届日本学高端论坛 ——东亚视域下中日经济的合作与展望”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与会代表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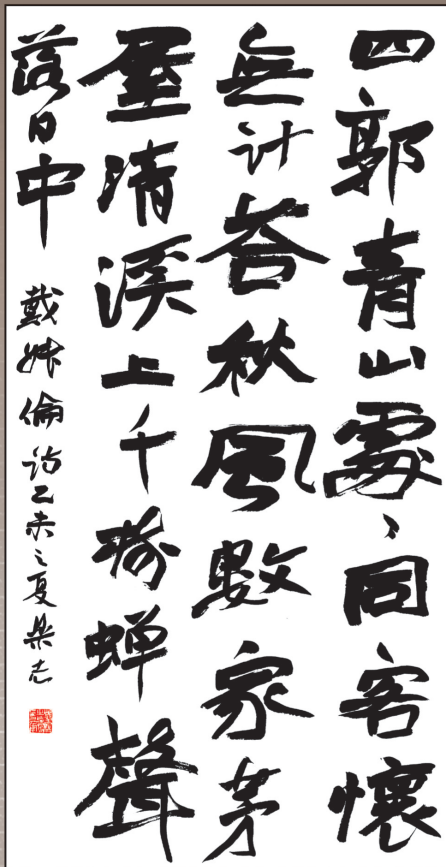
2017年9月16日，“第五届日本学高端论坛——东亚视域下中日经济的合作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召开。山东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姚东方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大东文化大学中村宗悦教授、北京大学王新生教授先后致辞。来自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佐贺大学、早稻田大学、千叶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明治大学、新泻大学、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秀明大学、帝京大学、鹿儿岛国际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济南大学、聊城大学、山东女子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我校部分师生也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岳希亮主持。

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东亚视域下的中日经济思想史回顾与展望。帝京大学的藤井隆至教授、北京大学王新生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小室正纪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李光贞教授先后作主旨演讲。

藤井隆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经世济民的经济思想——日本经济思想史的一侧面”，他主要以柳田国男的《都市和农村》的经济思想作为切入点，对1920年代日本所存在的农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现代日本与《都市和农村》的异同点。王新生教授作了题为“有泽广巳·倾斜生产方式·日本模式”的主旨演讲，主要对该项政策基于什么样的经济思想而提出、执行的结果如何以及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上的地位展开深入探讨。小室正纪教授则作了题为《日本儒学和近代化》的主旨演讲，主要从日本儒学普及方式的独有特色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进行分析。李光贞教授的主旨演讲题为《“一带一路”相关经济词汇的日语表达探析》，主要依据相关资料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词汇的日语表达进行对比考察，认为各阶段对相关用语的不同翻译方法折射出中国话语权不断提升。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山东分会、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山东省日本学研究中心、济南中日交流之窗协办。该论坛从2013年以来已举办四届，这是第二次在我校举办日本学高端论坛，也是山东师范大学与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的首次合作。

（撰稿人：李光贞）



山东大学 蒋乐志 书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2卷 第6期(总第275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 山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Vol.62 No.6(Serial No.275)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 Jinan 250014, 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782, 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v.edu.cn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3700004000210

刊号: ISSN 1001-5973
CN 37-1066/C

定价: 15.00元